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钟阳胜致《张汉青文集》首发座谈会的贺信

汉青同志：

您好！

读罢您的大作，得益良多。只因省委有会，不能应邀出席大作首发座谈会，深感歉疚。谨此特致函祝贺，并向老领导表示歉意。

文如其人。读您的大作，就如您和我们谈学习、谈思想、谈工作、谈人生。大作不仅收进了您半个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通讯、杂文、散文、随笔、评论、诗词，而且收进了您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理论文稿。透过大作的字里行间，使人感受到的是您的智慧和心血，以及您的心路历程，体现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大作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文风朴实。所有这些都如您为人做事一样，堪称楷模。大作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和文风，都值得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

再一次向您表示祝贺！

致

敬礼！

钟阳胜敬

2002年 5月9日

# 伟大实践的智慧

## ——邓小平理论的几点哲学启示

李德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认为, 虽然邓小平著述中很少直接使用专门的哲学术语, 但它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哲学启示, 却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本文对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很少被强调但却十分重要的几个观点, 阐述了作者的理解和看法。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哲学启示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05-0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这一实践理论的卓越代表, 它集中了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坚定信念、巨大勇气和高度智慧, 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文化内涵。虽然邓小平著述中很少直接使用专门的哲学术语, 但它所包含的哲学意蕴、哲学启示, 却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

本文试就其中很少被强调但却十分重要的几个观点, 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新高度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先进的、从而必然胜利的社会制度?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在过去的理解、论证和推行方式中, 我们曾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的科学结论、一个必须确立的坚定的信念, 而缺少必要的、与时俱进的反思和创新。例如人们往往突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方法上看, 这是贯彻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为基础的科学真理性原则的体现。历史已经证明, 这是合理性论证的一个方面, 但不是全部。合理性证明的另一方面, 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利益基础的论证及其实践体现, 即贯彻以价值选择为动力的“价值性原则”。对后一方面的淡

化或漠视, 即将“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要求和实践彼此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是导致现实中社会主义遭受种种失败和挫折的内部思想原因。这一重大理论上的缺陷, 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坚决的纠正。

在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之间, 由于理论定位而决定的社会主义历史形态, 至今可以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 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一些具有崇高情感和献身精神的人, 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丑恶, 向往并坚信: 凭借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 就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 不是因为它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 而是因为它的理想脱离了现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空想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现实, 但在它看来, 现实社会“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 而不是同时也孕育着消除弊病的要求和条件, 因此他们在揭露问题时可以直面现实, 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 却以为可以不从现实出发; 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案只是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的产物, 来自“思维的理性”, 却与现实的条件无关; 他们只从抽象的人性、道德、幸福、自由等方



面构想和实施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注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寻找改造社会的合理方式;等等,总之是只有主观的价值追求,没有历史的客观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sup>①</sup>

2.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和美好前途的一切崇高理想信念,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富有献身于人类解放的牺牲精神。但它绝对不同于后者之处,则在于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而找到了历史的客观真理。这就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sup>②</sup>“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sup>③</sup>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愿望和想象,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的实现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活动代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和主流,是相应历史任务的执行者;等等。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单纯的价值观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主体力量问题,意味着它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观上升成为一种现实具体的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便成为价值和真理统一的、完整的、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辟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代。

3. 100多年来的正反面经验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何通过实践充分体现出来,仍然要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后来的实践者能否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始终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人民群众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把科学思想变成切实有效的行动,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基础。

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能不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

差的可能;使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在现实中失败和挫折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根源。以往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代之以极其狭隘的某些眼前的、局部的甚至是宗派主义的价值原则,从而必然地引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失败和挫折。不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往往片面地强调走向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意愿和业已出现的革命形势,却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左”的僵化教条主义则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而忽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性和过程性,并同样忽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实际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仅仅靠外部力量(如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从而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二者都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同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价值取向割裂和对立起来。其中后一种“左”的僵化倾向,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时期表现得尤其严重而顽固,其危害也是巨大的。应该看到,这正是导致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特色也最具冲击力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或者不如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观。邓小平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针对已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而是还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有利”标准,是否能够使全体人

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实质性贡献。

## 二、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什么是”与“如何建”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完整内容时，不应该忽视他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创新。

例如在传统习惯的思考中，人们往往按照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作是“两个”问题。他们习惯于这样理解和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定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说的是形式和过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先有“什么是”，后有“如何建”，二者不能混淆，顺序不能颠倒；并且进一步宣布，前一个“什么是”的问题，至少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一直是清楚、明白、确定的，只有后一个“如何建”的问题，才可能有时不大清楚，需要摸索……。

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曾表现于一个长期流行的提法——“蓝图”之中。“蓝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恩早就给我们研究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纸蓝图：我们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要按图建成大厦，把梦想变成现实。这种思维方式中所包含的坚定信念和忠诚，是非常宝贵的，它是激励了几代人为之英勇献身从而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源泉。但是，理性地思考“蓝图”这个比喻，特别是结合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科学上反思其中的深层意识，则会发现有不少理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特别是当“蓝图”被作为一套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标准来理解贯彻时，其中恰恰缺少某些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比如：

“蓝图”本身只是一个结果或目的性的设计，它不能离开一定环境和条件的前提。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决不是无条件的。就像建造高层大楼的蓝图，要在具备相应的需要、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条件的时候，才能拿来实施。如果忘记了前提，在需要准备条件的时候不是致力于创造条件，而是把未来的目标当作现在的目标，犹如在还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就去建造高层大厦，就叫“超越阶段”。我们已往犯过不少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多少与那种简单化的“蓝图”意识有关。

“蓝图”本身的质量只由它的决策和设计者负责，图纸一旦确定，它对施工者就具有指令性和规范性，“图”与人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单向关系。当我们仅仅把马、恩的结论当作蓝图的时候，无意中就使自己进入“施工队”的角色。顾名思义，“施工队”的任务只是按图施工，保证质量，不能按自己的情况去增减图纸上的东西；“施工队”至多可以有自己的技师和工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监工和安全员之类，而不需要战略上的思想家、理论家、发明家和设计师等。这些都是施工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于是，在过于强化的“蓝图”意识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反而失去了某些主动性和创造性。

建筑蓝图代表着检验工程的标准。有了图纸就有了具体详细的标准，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等都一清二楚。把马、恩的理论和构想当作蓝图时，往往也意味着使它们成为一套现成而详尽的标准，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等，都得拿来对照检验，凡事也都可以问个清楚明白。这样一来，在现实中就往往导致“图纸(本本)”本身成为关注和无穷无尽争论的焦点，使“熟悉图纸”而不是“了解实际”成为最大的本钱，使“掌握对图纸的解释权”而不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尺……，由此下去的结果，最终不能不使“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段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当我们回首社会主义的历程来理解邓小平提出问题的背景时，确实有必要对“蓝图说”及它所体

现的思维方式加以反思。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蓝图。它作为建筑工程的环节,在许多场合是绝对必要的。问题在于思考的对象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功能,主要在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吗?或者它描绘的是哪一阶段的蓝图,是否可以不分历史阶段地一样实施?进一步说,用原本带有机性质质的“蓝图”来比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这本身是否合适?它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教条”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归根到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否能够用机械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把握?社会主义是可以像盖楼那样完全按照一套预定的方案来实现的吗?等等。这个问题既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现过程,也涉及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演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

不能不看到,在实践中,简单化的“蓝图意识”往往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狭隘僵化的一个思想根源。而邓小平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邓小平总是把“什么是、怎样建”作为一个而不是两个问题提出来,提问方式本身就包含或者说预示了新的思考方向:“什么是”与“怎样建”实际上不可分隔,共为一体,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样建”;然而不从实际出发解决究竟“怎样建”的问题,同样也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所以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过程。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sup>④</sup>因此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是以实践的、动态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这些论述非常清晰地透露出一种新的思维特征,就是着眼于“什么是”与“怎样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统一。

如果也用一个比喻来反映这个思想,那么应该说,也许“生命的成长”远比“蓝图”更合理、更贴切。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它们的存在形态(究竟

“是什么”)与它们的存在方式(怎样发生发展即“如何是”)之间,是明显地时空一体、不能分割的。生命现象就是如此,愈是有生命的东西就愈是如此。生命的成长,是生命体在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由自身内在条件决定的自我选择和发展过程。虽说生命也有类似“蓝图”的东西(遗传基因),但这“蓝图”本身也是内在的、有生命的、动态的、通过生命体的一生不断显现着的,而不像建筑蓝图那样只是个外在的、一次性的、终了的目标形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生命的成长是按照“蓝图”实现的,就像没有哪一个子女的生命和生活会完全重复、照搬父母一样。社会是有无数个人构成和参与的最复杂的生命有机体。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是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人和社会有机体的“生命成长过程”。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机体生命发展的一种形态、一定阶段、一个可以预见的前途。它既是必然的,又只能产生于本质上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之外。因此,以“生命成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程性,更注重从自己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出发,更注重人的具体选择和创造性实践,总之要有一种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著名论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是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sup>⑤</sup>就是说,人和社会的现实形态如何,是以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为标志的;人们在各个时期做什么和怎样做,当然不是随意的,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这一切实际上取决于人和社会自身的实际状态和发展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如何,以及人们自觉把握的程度如何。比如,要明白现实的社会主义应该和能够是怎样的,更要看我们应该和能够“怎样做”得更好些。

“怎样做”常常比“做什么”更深刻、更关键、更有力、更能说明问题。很多事我们做别人也做,社会主义做资本主义也做,而区别则在于怎样做、为什么做。因此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断创造出能够更好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才能显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离开了现实中“怎样做得更好”的不断摸索和创造，同样也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不能懂得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是从何而来。

总之，以“生命成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就是要放弃既定不变的教条，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去探索和创造。我们不仅要有历史的眼光，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的意义，而且要有切切实实的体验，充分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其中的权利和责任，学会把弄清“什么是”与“如何建”当作一个不可分离的现实过程，清醒而积极地推进现实的历史进程，勇于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

从普遍的意义上说，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是20世纪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成果。从中国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创造力源泉。

### 三、社会主义的主体定位：“初级阶段”与三个标准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定位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规定，集中地表现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贯彻以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主体定位及其标准系统。

从哲学上看，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使全部思想和决策立足于一个科学的可靠的基点上，并不只是一个了解和尊重“外部”现实的问题，更是一个主体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如果不了解、不重视自己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有什么样的条件、能力和切实需要等等，就不会真正懂得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就叫“主体自我定位不准”。如果主体自我定位不准，那么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路线和方针也必然发生实质性的偏差和失误。

例如：我们似乎从来就知道“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贫穷落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是在过去一度把它仅仅当成有待改变的“外部”对象，而没有把它同主体自身的切实需要和条件“民情”联系

在一起，没有把它们同时也看作是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情况。相反却以为，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是可以身在其外、超乎其上的“上帝”一样的人，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于是就忙于“改天换地”，搞“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结果恰恰是：越是这样强调“国情”，就越是脱离国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是最大的脱离国情实际；越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加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就越是改变得慢，——不是使我们离理想目标更近了，而是使我们离理想目标更远了。

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是在重新校正了自己的定位，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了目标和措施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看似“后退”的定位，却能够焕发起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并且步步推进，使中国的面貌有了历史性的改变。与以前相比，这显然使我们向着自己的理想目标更加前进了。可见，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国情”，但是结论和效果却不一样。为什么？区别就在于理论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特别是在关于主体和起点定位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

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要求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这是由邓小平提出、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得出的论断，“十五大”的报告又重申并充分肯定了它的重大意义。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描述：

“经过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并以动态的方式描述和展望了初级阶段“是”怎样的，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一连用了9个“是”字，根本思想就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改变不

发达面貌走向高级阶段的伟大进程,这是把“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这两个判断内在联系在一起、统一起来的根本方式。<sup>⑥</sup>这表明,经过几十年的经历,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程的理解,对于社会发展现阶段特征的把握更加准确、完整、深刻,主体自我意识也趋于自觉和成熟。这个结果得来不易。

主体的定位意味着标准的定位。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统一的思想,是我国党和人民创造性地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概括总结。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层“标准”之间是高度一致的,它们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内在统一的内容和导向。

“标准”是指人们判断是非得失、决定选择取舍的根据和尺度。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包括体现它们的方针政策等在内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正确有效,都必须由其所面对的实践来回答,这是依据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而得出的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但人类思想认识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人们实践的形式范围也是无限多样的。实践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意味着在检验和被检验之间要有确切的对应关系。那么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使用什么样的实践来检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秘密,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依据这一科学认识来回答,结论必然是:最终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是检验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和思想之真理性和价值的最根本、最权威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就必然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正如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行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sup>⑦</sup>我们党在革命年代结合当时的条件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标准,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可见,生产力标准是上升到历史观高度或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在客观上适用于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把握它。当然,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并且我们事实上也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恢复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将其进一步丰富具体化,从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当然首先也是实践标准,就是说,是否“有利于”是指在实践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论证;“三个有利于”标准继续坚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增加的内容并不是无关的,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特征,既坚持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条件的原则,同时又有针对性地突出了根本标准的价值导向,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更加完整、全面地统一起来。实践已经证明,能否很好地坚持贯彻这种统一,特别是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根本所在。参照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刻现实意义。

坚持上述标准的一个共同前提,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历史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和观念是否符合客观(具有真理性)和是否有益有效(判定其价值),不能单凭感觉和意愿,也不能停留于必要的理性分析和逻辑证明,最终只能到实践中去,用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来检验。但实践标准不是抽象的,它有自己的现实化、操作化乃至人格化的表现。世界上的具体实践各种各样,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始终是最普遍、最持久、最大量、最客观的基本实践,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体现着人类实(下转第28页)

# 论邓小平理论的凝聚力

刘学谦<sup>1</sup> 崔彩文<sup>2</sup> 姚冰<sup>3</sup>

1. 中共唐山市委政研室主任、研究员, 河北 唐山 063005  
( 2. 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河北 唐山 063000 )  
3. 河北理工学院团委, 河北 唐山 063005

[摘 要] 邓小平理论凝聚力是在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整合过程中形成并强大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在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 也继承了它的凝聚力; 邓小平同志的人格影响力是其理论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凝聚力 整合 继承 人格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2) 05- 0011- 05

纵观世界历史, 任何一个伟大的政党和民族, 要凝聚起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为实现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都需要有一个政党或民族信仰的理论来凝聚党心、民心, 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夺取政权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样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来凝聚党心、民心。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这个理论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今天, 这个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有了这面旗帜, 我们就有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当代中国才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

一、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整合作用

一种理论对人们思想的凝聚, 是以该理论对人们思想的整合程度为前提的。理论凝聚作用的大小首先取决于整合作用的大小。一种理论对人们社会思想的强大整合作用至少由以下三个条件所决定:

最高的时代价值性。时代价值是指对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的所发挥的作用。最高的时代价值是指在同时代, 没有任何别的理论能超过该理论对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一种理论具

有最高的时代价值, 一般必然具备三大构成要素:

A. 对本时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正确的揭示和预测; B. 能够指导本时代人民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C. 对解决本国本时代的基本矛盾提出了科学的论断。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时代价值性全面地体现了上述三大构成要素。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 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邓小平理论提出要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 不断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 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 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 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 进行正确的分析, 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特别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

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有这一切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时代价值是公认无疑的。

时代政治信仰的主导性。在同一时代，政治理论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差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就是在相同的社会形态中也存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理论。这种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多元化政治理论是客观必然的。因此，一种政治理论在多种政治理论中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特别是自觉选择的信仰对象，就必须具有时代政治信仰的主导性。这种主导在社会生活中又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群体的政治信仰主导层面；一个是普通人民群众政治信仰的主导层面。这两个层面的政治信仰主导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既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支持，又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对立；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制约。这些现象在任何社会形态都能找得到。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信仰主导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信仰主导往往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这种矛盾和对立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主导，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政治信仰的主导，两者之间只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而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信仰的理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信仰的理论，它既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也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指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的这种党性和人民性的科学统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共有特性，也是能够凝聚起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的根本。

实践检验结果的真理性。一种革命理论对人们思想的整合作用，不仅要能够付诸实践，而且要在实践的检验中证明其具有真理性。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真理性的最重要体现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其理论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得到了巨大实惠，我们用不到 10

年时间，完成了美国用 50 年，日本用 33 年才实现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认可邓小平理论真理性的实践基础。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历了多次思想整合，而每次整合的最后都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通过思想整合，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实践中看到了邓小平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使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如围绕“两个凡是”开展的思想整合，通过在全国上下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统一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上来，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围绕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的思想整合，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科学论断上来了。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抓大放小，股份制是“公”是“私”等所有制问题展开的思想整合，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一贯倡导的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认识上来了。

从对人们思想的整合到对人们思想的凝聚，是思想理论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对人们产生凝聚力的必然过程。人们在思想整合中认识理论的价值，在不断的比较，甚至是斗争中，逐步确立起对理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凝聚，是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整合过程才实现的。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也是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整合才实现的。邓小平理论经过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整合，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政治信仰，是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必然的。

## 二、邓小平理论凝聚力的理论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理论作为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使得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必然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继承下来，通过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使上述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大。

首先，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毛泽东将马、恩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贯穿其思想和实践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sup>③</sup>通俗的语言中折射出邓小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能丢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邓小平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其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和继承。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置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列宁领导着经济落后的俄国走上社会主义后，也强调发展现代化大工业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邓小平紧紧围绕着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④</sup>这一概述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的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第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到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按成熟程度不同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将共产主义

社会具体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将社会主义社会用“不发达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等概念来区分。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从而使各项方针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具有实效性。第四，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马、恩以及列宁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基础虽有很大差异，但对于社会主义建立后面临的根本任务认识却是一致的，即“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⑤</sup>“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sup>⑥</sup>“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sup>⑦</sup>“就无法实现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邓小平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sup>⑧</sup>“由此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五，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原理，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现状，得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正确结论，认为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来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最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社会根本不需要商品生产和交换。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的实际情况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列宁根据俄国、苏联当时的实际，提出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仍需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大胆而又科学的创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他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一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唯一正确道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完全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sup>⑦</sup>正是这种相承或继承的关系,使长期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能够信仰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正是这种相承和继承的关系,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的凝聚力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大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凝聚力。邓小平理论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期,指导着中国党和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取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走向的科学预测,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强大中国。同时,由于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及解决方式对其他国家有重大借鉴作用,从而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理论的影响力、凝聚力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增强和扩大。

### 三、邓小平理论凝聚力的人格影响力基础

社会凝聚力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凝聚力的产生不仅来自其科学内容,同时与理论创造者本身的人格又有重大关系。一方面,理论创立者高尚的人格会渗透到其理论当中去,实现高尚人格理论化。由高尚人格具有者创建的理论往往更能体现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更受人们的欢迎,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理论创立者会因其人格伟大而在言行中表现出人民群众崇尚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和行为,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在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形成巨大的感召力。群众对他的尊敬感佩服感会发展成为信任感。而这种信任感又是认可其思想理论观点的心理基础。因此理论创立者的人格魅力无形中就转化成其理论的凝聚力。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能够在全

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形成强大凝聚力,主要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科学真理。同时,邓小平的伟大人格力量,也在其理论凝聚力的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人格中最为突出最具魅力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其理论形成凝聚力影响最大的因素。邓小平曾说过:“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sup>⑧</sup>邓小平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实事求是的风格,并为此付出过巨大的自我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全国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虽然由此被“左”倾领导者撤职,但无怨无悔,终未屈服。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全面调整,力争恢复“八大”的正确路线。“文革”结束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两个凡是”仍束缚全党思想的情况下,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倡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我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之后,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排众议,对神化了的毛泽东进行了科学评价,既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在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同当今世界发展的最新变化结合起来,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第二,时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人民高兴拥护为工作的出发点,这是邓小平作为党的领袖最具吸引力的高尚人格。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sup>⑨</sup>邓小平革命的一生就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历经无数枪林弹雨,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屡屡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还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都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地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始终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每一项政策都渗透着邓小平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人民利益的关注。改革开放对国家人民有利，邓小平就将其定为国策；发展生产力可以富国富民，邓小平就将其作为根本任务来抓；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邓小平就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第三，在勇敢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表现出的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形成邓小平最令人民群众佩服的崇高品格。邓小平善抓机遇，大胆果断，敢破常规，勇于探索，总能在关系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重大决策。“文革”刚刚结束，许多人还没有从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就果敢地否定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全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来。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转入正轨以后，邓小平不怕众人非议，一改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建设模式，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要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

第四，邓小平在“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广胸怀，大大提高了邓小平理论在人民心目

中的地位。邓小平在一生中三次被打倒后仍毫不气馁，以惊人的毅力又三次站起来，表现了邓小平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处逆境不消沉的顽强意志。让人民感觉到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贞，对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计名利地位，不计个人荣辱进退的高风亮节。

邓小平作为邓小平理论创立者，以其高尚的人格创立出了更能体现中国国情民意的科学理论，使这一理论深受人民欢迎。中国人民也正是从邓小平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伟大的人格风范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邓小平一心为国为民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谛，从而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规划课题)

①②⑥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73、63、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9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⑦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13页。

主要参考文献：

刘学谦主编《当代中国凝聚力大典》，红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罗 苹

# 试论我们党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与实践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几点体会

韩东才

(广东教育学院副院长,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 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我们党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与实践。一是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 二是我们党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性实践; 三是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 江泽民“七一”讲话 制度创新 思想 实践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16-04

灾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旧中国能告别历史屈辱而最终“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强起来”,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 50 年来的制度创新理论探索与实践。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并高度评价了我们党在过去 80 年来的制度创新实践, 阐述了制度创新的战略意义和制度创新的目的。因此, 要深刻领会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其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实质, 是至关重要的。

## 一、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

制度包括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管理制度。制度创新, 是指制度安排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或超前的积极变化。古今中外, 制度创新的形成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而制度创新的结果又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中国古代, 秦始皇把“封建制”改为“郡县制”,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组织体系, 并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在西方近代,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标志着人类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专制社会走向现代的民主社会。当代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过程, 实质上主要是党和政府

不断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 是新制度被构建、旧制度被取代的过程, 其社会影响力更是难以估量。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是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许多论述都蕴含着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关于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sup>①</sup>“三个创新”同时并举,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2. 强调制度建设应置于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的地位, 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创新的战略性思想。

制度建设是一切建设的根本与归宿, 是其它建设有效与持续开展的前提。江总书记在《讲话》中认为, “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sup>②</sup>因而, 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sup>③</sup>继往开来, 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

力、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

3. 主张制度建设要先行,这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制度创新的前瞻性。

制度建设与其它建设相比,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因而在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制度建设必须先行。江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sup>④</sup>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建设先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国后,我国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必然结果,是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sup>⑤</sup>作为经济制度的“三大改造”,目的“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sup>⑥</sup>事实也证明,“三大改造”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极大地提高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同样是制度先行的结果。“十年动乱”使我国社会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正是“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最高概括,重新焕发古老中华的生机与活力,使文明古国再一次成为世人眼中的焦点。正如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进步发生巨大变化。”<sup>⑦</sup>

4. 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论述,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创新的多方位性和可操作性的思想。

广义的制度包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体系,及其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因此,制度创新并不限于企业或经济领域,它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不断发展进步的关键。每一次重大的社会

变革,都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体系变化,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基本制度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深化各项改革,不断开拓创新。他提出的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政策,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多样性和可操作性。例如经济上,“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sup>⑧</sup>开展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政治上,“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sup>⑨</sup>党建方面,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的先进的纯洁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政党。关于党内民主建设,要“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sup>⑩</sup>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提高工作效率”。<sup>⑪</sup>文化上,发展先进文化,就“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文化”。<sup>⑫</sup>在人事方面,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sup>⑬</sup>“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与他们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sup>⑭</sup>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制度创新与西方制度学派所讲的制度创新的不同性质与目标。

## 二、我们党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性实践

江泽民同志关于制度创新的重要思想是基于我们党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性实践的科学总结。

### 1.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迈出了制度创新的关键一步

近代,在西方坚船利炮肆虐下,中华民族不得不用饱蘸血与泪的笔端书写屈辱与抗争的近代历史,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但是无论是康梁所设想的君主立宪制,还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都未能令中国走向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壮大之路。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在制度模式选择上有所突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正把中国带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美好的明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 52 年前的制度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创新。

## 2. 在曲折中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制度创新的可贵探索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sup>⑥</sup>然而，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敌视、封锁新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边倒”向前苏联，加上我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经验，建立的是“苏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但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不少的负面效果。

在此历史关头，一贯主张独立自主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当机立断，重新审视苏联模式，“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进行了一连串的制度创新探索。如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反对官僚主义、推行“双百”、“两用”方针等。基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估计，导致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制度受到破坏，制度创新不能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的进展。但这种探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重大制度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作了重要铺垫。

## 3. 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取得制度创新的丰硕成果

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国内外新情况，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突破原来带有深刻的“苏式”社会主义烙印的制度模式而推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当然，要从制度上考察一个社会的创新，还必要从一切制度的制度——宪法的层面来洞悉制度创新的方方面面。

1982 年，新中国产生了第四部宪法。其后 20 年间几经修宪，以立法形式确认制度创新成果：经济方面，确立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确认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政治方面，在治国方略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结构上，“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原则。”从根本大法中确认的制度安排中可以管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乃是突破原有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大胆的制度创新。

## 三、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大家知道，制度创新是由 L·戴维斯和 B·诺斯提出来的。他们的制度创新理论，解释了历史上制度变更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发生制度变革的时间性等，这些对我们有不少参考价值。但任何一种制度以及制度创新理论都有一个社会属性、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规定性问题，因而我们党关于制度创新的思想与实践不可与资本主义制度理论相提并论、划等号。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革和创新的社会。当今中国必须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实践，使制度创新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孕育先进的文化。

## 1. 制度创新必须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基础,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sup>①</sup>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重要标准。生产力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落后生产力阻碍社会进步。因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才是有效的制度创新,反之,则是失败的制度创新。

2. 制度创新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基所在。制度创新是我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活动,是增进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手段,因此制度创新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体现党的宗旨,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参与。只有如此,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才能永葆制度创新的活力与动力。制度创新,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sup>②</sup>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配,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以增进人民根本利益为目的,否则,难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而任何实践,一旦缺乏人民的参与,则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毕竟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制度结构不对大部分人的利益实现形成激励时,制度创新便无法具备民意基础,社会经济增长便会陷于停滞。

3. 以先进文化指导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巩固先进文化。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烙上文化的烙

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是文化的一扇窗,是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文化是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在这一定义上,文化包括语言、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禁忌、法规、制度、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仪式及其他有关成分。文化的发展依人类学习知识和将知识一代代传下去的能力而定。”<sup>③</sup>因而,制度与文化互为表里,制度是一种外在表象,而文化则是内在深层次的。先进制度需要先进文化孕育、催生。事实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在落后中国建立起来,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被中国有识之士,被平民阶层广为接受、推崇,先有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后有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制度又是维系、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先进制度确立后,以其硬、软约束力来巩固先进的并与先进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教育、文化、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制度,都承担延展其文化之功能。一种先进文化要在一个社会中生根、发芽、成长、更新,制度的配套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国的制度创新必须牢牢把握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①⑦ “七一”讲话单行本,第13、2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13、15、13、14、15、17、17、33、34、20、36、37、5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⑰ 《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韦 前

# “三个解放出来”分析

段华明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本文对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 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当前的表现作了较全面的概括, 有助于深入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解放出来”的论述。

[关键词] 江泽民 “三个解放出来” “七一”重要讲话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20-05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中解放出来, 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出来”为我们进一步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指明了方向。要做到“三个解放出来”, 必须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 从而有的放矢。

## 一、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

### (一) 不合时宜的观念

不合时宜的观念主要是指不合乎时代进步的思想观念, 表现在因袭传统过时的观念或脱离时代、超越现实的观念两个方面。

1. 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 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对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 对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带来的某些问题, 归结为市场经济本身, 进而否定市场经济; 把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扩大化, 进而责难发展市场经济; 把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同计划经济混为一谈。

2. 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在对社会主义总体认识上, 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 就是“一大二公三纯”; 在所有制问题上, 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 发展其他经济成分是违背社会主义, 至多只能当作权宜之计, 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分配方式上, 追求单一的按劳分配, 不承认也不允许其它分配方式存在, 认为按要

素分配等其他分配方式都是同社会主义相违背的。

3. 用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的观念。看不到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 看不到阶级斗争在我国虽然存在, 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限夸大阶级分析的方法, 用划分阶级的办法对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收入、地位、职业的变化, 从而得出这些人是非革命的、非无产阶级的观点; 把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阶层同工人、农民对立起来, 认为这些新阶层就是剥削阶级, 是资产阶级, 认为他们的利益与工农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把工人和农民中的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现象上升到阶级对立的高度, 认为工农阶层内部出现了资产阶级, 出现了剥削阶级, 主张予以分离; 把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 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新表现。

4. 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念。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 而不承认脑力劳动创造价值; 只承认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 而忽视或否定服务领域创造的价值; 只重视科技在提高工人的熟练劳动程度方面对创造价值的作用, 而忽视或否定科技在十分广泛的领域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形式; 只承认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创造价值, 而看不到在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经营管理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形式; 只看到私营企业主等阶层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一面, 而看不到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创造价

值。

5. 平均主义的观念。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同时富裕；把按劳分配理解为平均主义；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成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别看成是两极分化；把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财产看成是剥削的产物。

6. 小农观念。不能以宽阔的眼光看待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目光停留在自己管辖的小天地里，把溶入世界潮流看成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把按国际惯例办事看成是屈从敌人的压力；把与国际经济接轨看成是与资本主义接轨；把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看成是丧权辱国；把学习外国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看成是做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

7. 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的观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和平共处，互相借鉴。旧的传统观念只看到二者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竞争的一面，看不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一面；将二者的对立绝对化、简单化，看成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社即资，看不到社会主义可以从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与借鉴中发展壮大自己，取得全面优势而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把必要的学习借鉴看成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是背离社会主义，下意识地拒绝学习和借鉴。

8. 把发扬民主与加强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的观念。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发扬民主会影响党的权威，削弱党的领导；把厂长经理负责制与发扬民主对立开来，认为负责制就是“我说了算”；认为在社会利益、组织形式、价值形态多元化的条件下讲民主就会越讲越乱。

9. 把党的最高纲领同党的现实纲领割裂开来的观念。只承认党的最高纲领，不承认党的现实纲领，把在党的最高纲领指引下制定的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看成是对党的最高纲领的否定、抛弃、“修正”，是降低要求，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对党的最高纲领的背叛。

10.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对立起来的观念。看

不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能相提并论，否则就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否定；并认为讲以德治国就是搞“人治”，不符合法制精神。

## (二) 不合时宜的做法

1. 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多地依赖于直接的和行政的手段，不熟悉也不善于运用法律的、金融的、财税的等经济手段和间接手段加以调控；指导经济工作、做规划、订措施更多地习惯用主观愿望和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济的规律；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干预过多，审批过多，不必要的检查过多，卡的办法过多；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找市场，而是找政府；搞地方保护主义，搞部门本位主义，搞各种不正当竞争，搞暗箱操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用主观随意性代替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等。

2. 违背依法治国方略的做法。不善于依靠法律的手段、法律的力量调节经济、社会生活，而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权力的力量；许多可以用立法加以规范的东西用行政手段去规范，许多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解决，甚至干预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导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3. 违背民主政治建设要求的做法。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变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思想上民主意识淡漠，家长制、“为民作主”的思想浓厚；决策中不能够广泛地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工作中遇到问题和矛盾不善于通过民主的办法去解决。

## (三) 不合时宜的体制

1. 经济体制方面。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律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漏洞很大；政企不分现象比较突出，行政干预过多，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完全下放；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运营、增值缺乏一套有效的制度和办法，相当一部分企业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企业

经营者的奖惩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有制经济比重太高，对非公有制经济还存在一些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政策，各种所有制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没有形成；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还不完善、不配套，对经营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等的劳动和贡献缺乏相应的分配政策。

2. 政治体制方面。党与政府、人大、政协、群众团体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政府与企业、社会和各种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干部制度上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群众参与程度不高；人才选拔和使用上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对权力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

3. 文化体制方面。文化事业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许多可以作为产业发展的文化事业被更多地看成是社会福利性质的事业，不能放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办，而主要靠政府拨款。相当一些可以让社会参与、多元投资发展的文化事业，由政府大包大揽。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严重存在，影响文化工作者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4. 科技体制方面。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科技发展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企业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中心、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企业之间紧密联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科技进步格局还未完全形成；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的体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鼓励科研人员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作为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不完善；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成长的科技创新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新的发展科技事业的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

## 二、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不合乎世界的变化和脱离中国的实际。

(一)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发展的理论，而是看成包罗万

象、包治百病的良方，当作现实生活的“辞典”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寻找现成的根据和答案，无视时间、地点、条件，用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个别结论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依据和尺度。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学说，而是热衷于从马、恩原著中找根据，用静止的、僵化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于根据新的实际和新的实践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出的新结论和新观点，对任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上的东西，都认为是离经叛道，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开放的体系，而看成是封闭的体系，对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认为是“杂质”，一概加以否定、排斥和拒绝。

在对待现实社会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发生的新变化上，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是用本本、条条来裁剪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的“辞典”。

在判断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上，不是坚持实践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以本本和条条为准，对号入座，机械地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去套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符合”的就认为是先进的、正确的，“不符合”的就认为是落后和错误的。

(二)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上，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科学方法，而是片面地、机械地去理解

1.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成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说，而没有同时看成是社会新生活的建设学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学说，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新社会的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作用，看不到马克思



主义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

2.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成是关于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没有同时看成是人民民主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强调专政的一面，忽视民主的一面，尤其是把在革命时期因为特殊的原因更多地强调专政的做法，照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3. 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成是抽象的社会学说，而没有同时看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解放的科学，它不仅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将人类的解放作为终极目标。但教条主义者只是把它看作抽象的社会学说，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因而忽略甚至轻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学习和理解，不能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

4. 把马克思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简单地套用到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变化、新特点不作深入的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和趋势认识不清，对其内在矛盾把握不准，因此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隔靴搔痒，苍白无力，同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东西，不敢大胆地学习和借鉴。

5. 把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照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但教条主义离开具体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阶段，看不到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形式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实际，机械地拿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设想来看待今天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对党在现阶段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等不理解，持怀疑态度。

(三) 在对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持僵化的观点

教条主义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对根据时代发展

和实际生活的变化作出的对马克思主义补充、完善和发展的一切东西都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如否认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把发展多种所有制看成是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发展市场经济看成是改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抛弃和否定；把有没有财产或财产的多少作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依据，认为身无分文才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否则就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把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看成是异己力量，不承认他们的劳动和贡献，不承认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把吸收非工农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看成是吸收资产阶级入党，看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是政治上的投降；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简单地、机械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之的，而看不到这一重要思想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及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因而也看不到这一理论对我国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

### 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 (一) 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突出问题是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

1. 把命令主义当成思想超前、勇于创新、工作有魄力、有创劲，无视群众的认识程度、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

2. 把尾巴主义当成对局势的稳定、稳重老练，无视人民群众发展、进步的要求和愿望，无视客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机遇，跟在时代和群众后面跑。

3. 把教条主义当成是对基本理论的坚持，对原则的坚持，排斥根据新的现实和新的实践对科学理论的补充、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

4. 把经验主义当成工作准则和法宝，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排斥对任何新的知识、新的方法的学习、借

鉴和总结，往往犯以偏概全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5. 把官僚主义当成驾驭全局、宏观领导、摆脱事物主义，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凭条条和原则实施领导，指导工作。

6. 把形式主义当成开创新局面、保持一致，满足于照抄照搬，热衷于表面文章，只图虚名，不干实事。

7. 把保守主义当成实事求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求稳怕乱，无所作为，只讲稳定，不讲改革、发展，只图小步走、有发展，不求创新路、大发展。

8. 把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当成维护群众利益，一切从部门、单位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大局出发，不能从全局发展着眼。

9. 把悲观主义当成从实际出发，凝固地、孤立地看待所在地区、部门的发展条件，而不能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国际、国内广阔的发展空间看条件，看困难多，想机遇少，看劣势多，想优势少，看问题多，想办法少。

10. 把急躁冒进当成思想解放，无视客观条件，无视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现实性，单凭主观愿望、热情和意志办事，勉强做那些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 (二)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表现主要有：

一是始终把事物对立统一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一讲解放思想，就忘了实事求是；一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一讲加快发展，就不顾客观规律，不讲质量、效益，盲

目攀比速度；一讲放开搞活，就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一讲宏观调控，就什么都想统，什么都想收。

二是跟风赶浪。不立足于现实，不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实际，盲目地跟着气候走，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人家搞什么也跟着搞什么，说上一起上，说下一起下，最后的结果是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三是一刀切，一律化。布置和指导工作的过程中，不考虑事物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分析地区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不研究各地的具体特点，缺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往往是一个要求、一个政策、一个模式往下贯，出了问题一个方子吃药，这看起来很坚决，实际上行不通。

四是走极端、绝对化。离开事物的本来面目，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工作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五是不能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特别是对一些事物的复杂成因，只看到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其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解决起来，就往往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结果事半功半，按下葫芦浮起瓢。

六是在解决问题中不能把握好度。不认真研究事物的质和量的关系，处理问题不注意火候，不注意掌握分寸，不区分界限，往往讲过头的话，做过头的事，结果造成许多事物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归结起来，“三个解放出来”的要旨，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责任编辑：叶金宝

# 知识分子与“三个代表”

张江明

(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会长,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本文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才问题的论述, 对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创新精神, 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并对如何贯彻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 江泽民 知识分子 三个代表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25-04

江泽民同志 2001 年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是对“七一”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才问题论述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丰富和发展。这个讲话从“三个代表”高度, 以战略眼光对新时期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的作用、重要性与贡献, 作了很高评价与肯定, 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 关系国家的兴旺发达, 深刻阐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与主攻方向, 提出在新形势下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要求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个讲话对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创新精神, 加强两个科学的协调和发展, 攀登科学高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人才关系国家兴旺发达: 知识分子与“三个代表”及其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指出: “人才问题, 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这是从总结长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来的科学论断, 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所谓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写照。

人才的成长有两条途径: 一是少量的通过实践自学成才; 二是大量的主要的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成才。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 自己毫不占有生产资料, 靠出卖脑力劳动以取得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教师、

作家、医生、演员、职员等), 他们都是“雇佣劳动者”, 是“脑力劳动工人”, 虽在他们中仍有层次之分, 但就大多数人来看, 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 广大知识分子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引导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组成一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劳动大军, 向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一步步地前进。

马克思和列宁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评价很高, 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由工人运动自发产生, 而是由工人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从其他阶级出身转变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先进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把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 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这两大功绩是无与伦比的。

江泽民同志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深刻阐述知识分子的重要和作用; 又以“三个代表”指导知识分子的工作; 同时提出知识分子以实践“三个代表”为历史使命。他明确指出: (1) 党在 80 年的历史中, “知识分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 知识分子是工人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 同工人阶级一起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 是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 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和先进文

化的传播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他们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和广大人民中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在实践的总结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办教育，办文化，办科学和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都需要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和发挥作用。(4) 知识分子是“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5) 对知识分子和人才要更新观念，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既要广纳贤才，知人善任；又要着重培养优秀人才，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家，勇于开拓的学科带头人，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不断成长。(6) 提出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努力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勇做先进生产力开拓者、先进文化传播者，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达到共同富裕而奋斗。

二、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江泽民同志充分肯定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种“创新的理论思维”，要求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尤其是要从过时的旧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教条式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上升到理论上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经历了长期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两门科学：一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及其

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二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而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对这两门科学必须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正确的处理，不能畸轻畸重，也不能顾此失彼。这两门科学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分别在这两门科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泽民同志针对“重理轻文”和“见物不见人”的情况，从四个方面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摆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一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二是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三是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四是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应该说，这四个“同样重要”是很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尤其是在任用人才上同样重要，需要进一步落实和解决。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同样重要，是由于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如果仅是一个科学，那是兴不了国的。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来看，它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综合国力中，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从两个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不同形式同时产生、同时发展，互相渗透，互相交错，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好比是鸟之两翼，人之两腿，是缺一不可的。只有把两个科学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才能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使整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

要真正做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必须贯彻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原则。在领导的指导下应同样加强，在人、财、物上对社会科学的投入上应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并应有一定比例，不要差距过大。党政工作的计划、安排、部署，社会科学也应和自然科学一起有硬指标、硬任务，及时检查、总结，限期完成。

三、要有正确的方向和学风：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和学术氛围。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要有党政的领导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奋斗。首先要有正确的方向，这是个大前提。只要方向正确，就会一通百通，迎刃而解。如果方向错了，就会陷于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处境。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主攻方向是：“重大现实问题”；主攻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攻的目的是：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主攻的课题是：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要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服务中来达到。在这个主攻方向指导下，对基础理论也要研究，着重于应用基础理论来研究主攻方向提出的现实问题，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这个主攻方向，要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学术研讨的主题，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著作选题的确定，学术成果的评奖等各个环节，不要停留于形式主义的空洞号召。

提倡和形成“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学术氛围”十分重要，尤其是“民主、团结”的学术风气。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人民民主，坚持科学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对路线、方针、政策，应统一于党中央的决定，不搞争论；对学术理论问题、历史问题等，应容许不同意见的争鸣、商榷、批评与反批评。如果在这些领域没有“争鸣”、“齐放”，就不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气氛，就会变成“死水一潭”。

四、加强领导：“党政第一把手要亲自抓知识分子工作”以及几点建议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加以研究，适时制定

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措施。党政第一把手要亲自抓知识分子工作，真正交几位知心的专家朋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现实性的。所以明确提出“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知识分子工作”，一方面鉴于知识分子和人才的极为重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对待这么重要的工作，理应由第一把手亲自抓，成为第一责任人；另方面鉴于当前我国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第一把手是党委、党组的“班长”，在集体讨论中最后由他发言、作结论（“拍板”），实际上成为最后或最高的决策者。因此，只有第一把手亲自抓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才能列入党政工作的议程，才能做得好。加以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知识分子工作的不多，再次强调和明确提出，使之落实，十分必要。

为了在广东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现提几点粗浅的建议，作为参考。

第一，建议广东党政第一把手主持召开一次广东部分自然科学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见一见面，讲一讲广东如何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北戴河座谈会精神，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如何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合、协调和建设，怎样落实把两个科学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什么要求，需要研究那些课题，怎样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省委省府的科学决策服务；广东各级党政部门的第一把手应如何亲自抓好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有什么要求和措施。

第二，建议抓紧续建广东科学中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用）。现在形势发展迫切要求把广东科学中心抓紧建成，也符合两个科学“同样重要”的精神。此中心应建成广东的标志工程，体现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关怀。在省委省府领导下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拟定建设方案，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平等协商，合理分配。

第三，建议较大幅度增加对广东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机构（包括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人、财、物的投入，每年应有相应增加。目前广东社科联全年经费 200 万元左右，社科院 1000 多

万元,即是说,社会科学专业机构全年经费还不到建设高速公路一公里的经费数目(2000多万元)。社会科学中特别是文史哲困难更大,召开一次全省性的研讨会或年会往往要由教授向领导或热心人士“乞求”(有学者说是高级“文丐”,或叫“新时期的武训”)。这种情况希能得到解决,以利于社会科学的开展。广东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62年),外向型经济理论(1982年),经济特区理论研究(1980年),港澳华侨理论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研究(1978年)等。如果加强领导和有较好的物质条件,是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

第四,早在1930年上海、广州等地就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联盟,领导人周扬、

(上接第10页)践的本质、特征和主流。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并坚信“真理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它必然承认,如同在科学上要充分尊重科学观察、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实际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人民群众的实践反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说来,一个理论、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其真理性只有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其价值也只能看最终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什么才能确定。

在此意义上应该说,总体上,人民群众的检验也就是实践的检验,在人民群众中是否行得通,也就是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我国近20多年的实践证明,敢于和善于倾听来自实践和群众的声音,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创造并实现丰富的社会价值,这是邓小平理论作出的典范和深刻启迪。这一启迪也告诉我们,如何把“实践是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贯彻到底,特别是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充分体现它的原则,并把它与以人民

胡乔木等。联盟活动了6年,被国民党破坏后,便停止。中共中央1982年第48号文件指出:“成立全国社联的条件已经成熟”,后因故未有成立。广东省社联于1960年成立,一贯来属厅级机构,同省科协、省文联等一样。在精简机构中建议坚持不变,尽可能适当加强,以利于做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工作。

第五,建议省委省府每年暑假组织广东部分自然科学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到适当地方休假,借此机会进行学术交流和谈心,帮助他们了解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成就和经验,向省委省府献计献策。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为主体的价值原则充分地结合和体现出来,仍然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实践课题。

总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邓小平理论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形态的许多重要思想内容和方法启示。我们要给以科学的深入的理解和总结,用以推动哲学的真正发展和创新。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724、358页。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87、67-6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⑥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⑦ 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责任编辑:何蔚荣



# 掌握科学方法 把握精神实质

——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丁晋清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5-0029-01

既要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又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 是当前思想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响应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号召, 编写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书, 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 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主线,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五个历史阶段, 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一主旨, 且语言精练, 结构严谨, 深入浅出, 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的一本好书。

学习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把握其精神实质, 掌握科学方法。该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给我们的启示也最大, 具体说来就是:

1. 在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上花了不少功夫。要写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普及读物, 只有很好地钻研原著, 才能把握其精髓, 掌握其要义, 才能做到“大事周而全, 小事简而约”。我在通读该书的同时, 很注意引文和下面的注释, 发现作者们引用经典作家的原话都非常准确, 非常到位, 能准确地说明问题,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而且作者们基本上引用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8卷、《列宁全集》1-55卷、《毛泽东选集》1-4卷、《邓小平文选》2-3卷、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可见作者们在著书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原

著上花了很大功夫, 而不是从整脚的教科书和二手、三手材料中信手拈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值得称道的。更进一步说, 我党理论准备先天不足, 尤其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和研究。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才能谈得上去掌握、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知半解、蜻蜓点水, 只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 就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 把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 甚至当作马克思主义加以固守。以往的教训够深刻了。

2. 坚持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既不厚今薄古, 也不厚古薄今。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传的理论体系, 只有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坚持, 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该书在把握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好, 对每个阶段的历史地位都给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各个章节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时, 对该阶段继承了前一个阶段的什么东西, 又发展了那些东西, 在本阶段又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继续发展了那些东西, 都讲得非常透彻、清楚, 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雄浑而又绚丽多彩、逶迤而又气势磅礴的画卷。该书特别提出要严防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3.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该书自始至终突出这种精神。该书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时, 都强调该

# 思入现代社会的本质

##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刍议

张曙光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要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或当代意义, 就不能回避它之于现代性难题有何价值问题。马克思哲学是执行着现代社会自我批判的现代哲学, 内在地具有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和超越向度, 实质上是终结了一切哲学形上学的历史性的“生存- 实践”哲学。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实用主义和片面性问题, 即根据某种潮流和时尚要么把它往“纯哲学”上拉, 要么把它往“实证科学”上靠, 结果使马克思在哲学上发动革命变革的意义和真实内容隐而不见。本文认为, 整个马克思理论都包含着两种思想要素或双重旨趣之间的张力。经由对这种思想张力的阐明, 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对于现代性难题的深刻洞察力和重大批判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生存- 实践 现代性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5- 0030- 09

我们生活在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人的自主性和对世界的干预与操控能力极大提高, 但生存前景也变得更加不确定更有风险; 人们已经并仍在获得空前的社会解放, 同时也正在遭受自己造物 and 自身欲望的更直接役使; 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和自由, 人生的意蕴却愈发浅薄和虚无; 物质和精神、道义和功利背反的问题也更加严重了……。我们已经被告知, 这个让人愈来愈感到困惑和迷惘的时代就是“现代”, 这不是每代人都曾经历的现时代, 而是有着特定历史规定性比如工业化、市场化、理性化的社会形态。当代许

多思想家都对这个现代社会做出了分析和诊断, 提出了不同的现代性理论和主张, 其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 但却混杂在似是而非的论说中而在整体上与这个时代一样地纷纷扰扰。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超越“好得很”或“糟得很”的极端之论而又能于现代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阐发出建设性方案的理论就显得弥足珍贵。正是基于此, 为许多思想家所依据所借鉴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为我们所看重。本文旨在从存在- 方法论视角侧重论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

时代的主题, 革命、建设和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 现实存在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如何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去创建或发展自己的理论, 去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并从反面论证以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 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 都需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 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或主观愿望出发; 从不断发展变化

的实践出发, 而不是从僵死的教条出发。

诚然, 该书也有一些可改进之处。如果能在书末增加一节, 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就更好、更完整。总的来看,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不失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的一本好书。

责任编辑: 叶金宝

无可置疑,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方位已相去很远。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即阶级对抗具有主导意义,而今天不同阶层的相依互动则是社会的常规状态;马克思那时要着重解决的是人们如何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提高生产力和进行社会革命是人类根本的出路,而现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及其与人类互相制约的关系已极为突显,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成为紧迫的世界性任务;在精神文化领域,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致力于扭转观念和现实实践的关系,强调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而在信仰失落、理想式微、社会生活愈来愈平庸化、表浅化的当今,我们却不能不重新重视精神文化的超越和理想维度……。这些现象上的区别,决定了重复或简单地搬弄马克思成说的做法是无意义的。

但是,马克思和我们又并非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虽然封建主义还在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纠缠,但毕竟气力难支,无碍于资本主义由童年进入青年;宗教神学历经外部冲击和内部反叛,其威权已从根本上动摇。由此马克思得以声言: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可以说,“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所有那些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接轨”的民族所苦恼的问题——而抗拒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民族则只能停留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中,命运将更加不幸。可以说,我们和马克思都生活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只不过我们处于现代社会相当成熟的阶段,马克思则在它生长的早期。“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而已。

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于封建农业社会的现代社会是历史上迄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有机体,他所致力研究的也正是这样的现代社会而非一般社会,但现代社会也必定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发育生长出来的,它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深层历史根据的突发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现代”一词的用法多半是与古代或过去时代相对言之而不是作为专有

概念,也没有“现代性”、“现代化”的用语;并且,在提到“现代”时,往往与特定的概念如“资产者”、“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文明”等连用。这难道只是受制于当时的语境或马克思尚未充分地看到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吗?我认为根本原因不在这里。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固然会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但马克思一般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我认为恰是为了表明现代与过去时代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表明现代社会是原有社会矛盾的解决或转化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著作中选取数例以印证:“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sup>①</sup>马克思说到“现代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时,同样是要在与过去时代的关联和对比中明确现时代的本质规律或来龙去脉。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sup>②</sup>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表明了他观察现代社会的鲜明的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的基础或底蕴就是基于事物自身矛盾的历史辩证法。

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提出现代性范畴与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19世纪视为工业革命已经实现、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世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由于他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革命的未来形势问题上,对于大工业所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前景问题,则没有进一步探索下去。这固然可以视为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是用历史的观点理解“现代”的;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他都“当作是以

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现实的现代社会也不例外。既然现代社会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就既不可能“前无古人”，一切都绝无仅有，亦不可能“后无来者”，成为历史的终结。因此，它决不是历史运动的最高目的和完成，决不能总是“现代”；与其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结晶体”，毋宁说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依据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更早更明确地洞察到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甚至在资产阶级学者把近代“理性”及其“自由”、“平等”原则作为超历史的“永恒”真理大唱赞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特有的历史规定性和工具(手段)性问题。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能够在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揭示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向着更高的历史阶段转变、跃迁的可能前景；才不至于对现代社会做出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的片面之论，陷入浅薄的乐观或一味地伤感悲观之中。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由资本主义开创和主导的现代社会绝不是永世长存的社会制度，它的存在既有历史必然性，又只能是暂时的社会形态。<sup>⑥</sup>

我认为，马克思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理应作为我们透视和把握现代性的根本思想方法。而明确这一点，在今天的理论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省思一下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性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或特点，一是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作为标示工业和市场经济社会的专用词，而忽略它的另一种用法及其相对的历史意蕴，结果造成如下悖论：有人依据当代西方社会新的特征如信息化而宣称“后现代”社会已到来，有人则依据现代社会的开放和流变性而宣称“现代性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实验”。让人搞不清“现代性”究竟是何物；再一点就是在上世纪中叶之前，多数都是对现代性及其理性原则的正面评价，在中叶之后，对现代性和理性负面问题的抨击乃至对现代性的整体否定则成为主流，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谁还要为现代性和启蒙理性说好话，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由褒而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当然这里

也有社会和认识两方面的演进：在现代性的问题逐步暴露的情况下，它自然会招致人们更多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无疑具有对自负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批判意义。然而，从“后……”到“后后……”的竞相标新立异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思想的困窘、肤浅和一种话语的漂浮及恶性的自我克隆状态。导致对现代性的这种要么充满矛盾和含糊的看法，要么一面倒的片面之论的重要成因，就在于相当一些理论家缺乏历史眼光和矛盾观点。而由于“现代性”首先来自于西方，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铄的，它与我们在时间上正在经历的现代有着不小的距离，这就更让我们一些人陷入到“现代性”理论的迷雾中，把现代性看得更加神秘莫测、不可捉摸，一些人甚至比西方人更形而上学和矫情：不是以为现代化通体光明因而简单乐观，就是倒过来满眼漆黑对未来悲观乃至绝望。这实在可笑且可叹。

## 二

将现代社会纳入到历史发展长河中加以认识，并不意味着抹煞或淡化现代社会特有的性质。相反，是为了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它。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与现实是互相隶属、互相阐释的。现实源于历史而又是历史萌芽的相当充分的展开，因此，立足于现实且本身就是现实存在者的人，要从历史的线索认识现实就必须同时从现实回溯历史。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人基于实践的自我创生、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关于历史和现代社会的整个理论，可以说都建筑在他的这样一个论点之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论点无疑具有历史的普适性，但只是在他生活于其中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实践本性才更为明显地突现出来。在国内理论界，关于实践的论述已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却难以看出它针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和批判意义，这实际上说明我们对实践的理解远未到位。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改造外部世界以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根本上说，实践是人不断地实现自身生产和再生产即自我创造的活动，作为这种活动它一开始就必然具有自为手段自成目的的性质，换言之，实践必然具有工具性和

超越工具的规范性和理想取向——人文化成和人性的提升。事实上，实践就是人们创造规范并为规范所制约的对象性活动，人和人的文明的造就活动。在历史上，它具体地体现为人的劳动活动和劳动本身具有且从劳动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人们相互结合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正是这一矛盾运动，形成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形成了与传统社会内在关联而又有着质的不同的现代社会，也势必会造成现代社会的自身否定与超越。这就是马克思以“生产”和“交往形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理论。就理解现代社会而言，这一理论至少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据此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祛魅”，即解除其神圣的“意识形态”的虚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世俗性和现代文明的理性特质。马克思写道：在历史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用语虽然是18世纪产生的，当时的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它构成历史的基础、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以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就是因为忘掉了这些思想的基础所致。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④</sup>在阶级社会，获得了普遍性外观的思想观念即使在刚出现时要反映社会的共同利益，但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的基础和真正要维护的却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社会也不例外。有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毕竟为全社会带来了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较之过去的统治阶级它也直白得多。它所开启的人类生存方式是以无限的追求利润、以需要和生产的超自然发展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用行动表明，它要破坏一切封

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撕掉一切笼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类统置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与此同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⑤</sup>在今天，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的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不是仍然需要大力发挥吗？人类在过去时代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决不像某些人所想象得那么合理和有益，它总是强化着人自身的弱小蒙昧和其血缘共同体的狭隘和封闭，使其很难从自然规定性中超拔出来。可以说，正是资本所引导创发的文明才使人走出自然的从而也是民族的襁褓，长大成人。笔者认为，人类“成人”的标志体现在精神和现实两方面，不仅如康德所说每个人都能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在现实上他们还要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人类的一员——世界公民——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由此“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显然，这一目标还远未全面达到。

同时，它对于我们批判现代社会中劳动和人的异化、物化，认识现代性的理性二重性及其矛盾关系，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都强调了实践的目的和道德意义，中国哲人亦然。实践的目的和道德意义其实包含在人的感性具体的劳动、生产之中。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及其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劳动，内在地具有全面的、普遍的性质，是人的一切价值的源泉，就是说，劳动不仅意味着人的自食其力，还意味着人们

之间的合作互助和社会化,由此使人的生存赋有道德价值和以类的完满性为目的的发展向度。但是劳动既有上述工具(手段)和目的二重性,还有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劳动的具体性见之于各种劳动的手段、对象、目的和人们合作形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劳动的抽象性则是寓于具体劳动中的一种属性,即在“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的一般意义上,劳动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和支出过程。正如在劳动中发生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互为中介,但毕竟可以相对区分为两种关系。“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sup>⑥</sup>虽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资本本来是劳动的凝结即死劳动,但它一旦支配活劳动从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就只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即效率原则来要求和组织劳动,使所有劳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服务于同一目的而不再自成目的,也不再体现劳动者的个人意志和兴趣。劳动于是被规整在工具-技术理性的单一尺度上,失去了目的和价值理性即道德、审美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sup>⑦</sup>于是,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无关紧要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而直接造成这一问题的资本关系也不可能不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形式,因为它体现不出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和平等交往反而破坏了这一点。“社会”成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抽象”的东西,个人劳动则丧失了自主的意志和感性的特质。

资本统治下的抽象劳动的确制造出一个愈来愈庞大的物的世界,但它由此把整个人类社会也物化了。实际上这里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活动整体上的颠倒即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是社会整体上的理性化却不再合理。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借助社会统一化的行动联系的物化,解释了现实抽象的这个过程,如果内部活动不再通过规范和价值,或者通过理解的过程,而是通过交换价值媒体协调的,那么,这种社会统一化的行动联系的物化就会出现。

这样,参与者首先注意的是他们行动的结果。当他们目的合理地以‘价值’为方向,认为这些是一种第二自然界的客体时,他们相互之间,并与自己本身就采取了一种客观化的态度,就把社会的关系和内部心理的关系变形为工具的关系。因此,具体的劳动力转变为抽象的劳动力,就意味着共同的生活以及各种特殊的生活的物化的一种过程。”<sup>⑧</sup>哈贝马斯接着提出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价值理论作为现代性理论的“优点”和“弱点”。他认为,马克思的原理促进了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经济上概括性的解释,但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经济的分化和文化的作用。笔者认为,马克思直接面对和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象认识不足是很正常的,这恰恰说明后人不能躺在马克思的现成结论上而应有所作为。但也不能同意类似第二国际的领袖那样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注意把社会之物归结为社会关系,还特别注意从历史性的经济关系中透视出人的曲折发展。例如,马克思一再强调,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财富正是在普遍交换中所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正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也包括人在交往中超越主客对立模式走向平等和自由的可能前景。实际上,工具-技术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的主宰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与狭隘的异化的社会形式的产生一样,不过是人类在成为休戚相关的共生群体之前,彼此进行生存斗争并不得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这仍然是人在走向“成人”的过程中个人和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做出的利己性选择及所付代价。

诚然,在已经意识到社会发展与个人命运的不一致甚至往往造成后者某种程度的牺牲的现时代,我们固然不可冷漠地站在“历史规律”之上坐视人的牺牲,而应尽最大努力——包括对原有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这种牺牲。但无视人类内部的矛盾关系,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牺牲,也只能属于一厢情愿,于事无补。马克思对感伤和悲观主义的正确批评足以为我们明目醒脑。



## 三

从根本的也是总体的角度看，确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世界历史都是人基于劳动实践的生成。

“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sup>⑨</sup>人们就是这样凭借自己的活动不断地使人类的社会历史得以重构。历史因此不复有预成的、既定的性质，人本身也不复有无可奈何的宿命。我们据此把马克思的哲学概括为“实践哲学”或“实践人学”。然而，由此所确立的“实践主义”却似乎偏向另一方面，即实践主体决定论和由此导致的历史决定论。这里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仍然坚持了人类中心和主客二分及其对立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作为主体统治自然客体）；二是人作为单一主体遮蔽了人的社会差异、多样性和自由个性（社会的人不是内在的、无声的、同一的“类”，而是不同“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和作为社会关系“人格化”的问题），不同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难以展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选择与责任被忽视，个人的生死、灵肉、情感等问题更无从谈起；要么就只能在主客关系的框架中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以人的实践作为元概念导致的宏大叙事，是与主体形而上学一样的实践形而上学。它逻辑地预设了历史作为人的实践的展开是一个统一的圆圈式过程，并且必定指向人类的终极圆满（解放和自由）。这并没有摆脱人的自我神化，人对自己活动的自我神化，还是让人陶醉于自己的力量和美妙的未来，同时也就消解了人对自身弱点、局限的认识和自我批判能力，使人难以意识到他的每一次解放和自由的获得，都是新一轮的奴役和束缚及其新的抗争的开始。这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最后斗争”和“千年王国”。因而，这种实践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理论构成（形而上学基础），它肯定维护着现代性却不能反思批判现代性，于是它本身就应当被批判和超越。

毋庸讳言，和任何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思想也要打上历史印记并有历史局限。他作为人类的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处在充满社会对抗而物

质文明和人的自觉性普遍提升的现代社会早期，自然既要为现代社会的进步包括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而欢呼，又要谴责现代社会由资本所造成的分裂和物化取向，他也确实看到了社会革命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发生的现实可能，由此强化了他对社会（关系）问题总体解决的宏观构想。在一个“阶级对立简单化”即非此即彼的极性社会，人们特别是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家难免要产生总体性革命的期待以及对未来过于乐观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一再预言革命爆发的失误等问题，列宁曾给予中肯的分析和批评。那么，对于支持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哲学思想，又当如何看待？

限于篇幅，这里难以详细评论，以笔者的看法，马克思哲学大体上可归于现代范畴，但它又是执行着现代社会自我批判的现代思想，内在地具有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和超越向度，因而并不缺少所谓“后现代”思想视野。实际上，上面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概括有很大的失当之处，并不准确。我以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既有主体主义，又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主体形而上学；它实质上是一种“生存—实践哲学”（或实践—生存哲学）。因为马克思推重实践就是为了把哲学引入人的具体和现实的生存处境，就是要从人们实际面临的生存条件和人自身的切身感受出发，批判地理解人的生活性状和孕育于其中的种种可能性，从而提供给人们展开和把握自身生活和命运的、经过理论论证的自觉意识。他在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立意义上申明自己属于重视人的感性存在并从而具有“优越性”的“唯物主义”；又同时在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对立意义突出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对人们能动的生产和生活过程的“描述”将代替哲学的思辨，并声言共产主义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颇堪寻思的。应当指出，我们以往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的确有实用主义问题和很大的片面性，即根据某种潮流和时尚要么把它往“纯哲学”（其实是超验形而上学）上拉，要么把它往“实证科学”（马克思本人也确有此一说）上靠，结果使马克思在哲学上发动革命变革的意义和真实内容隐而不见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是用一种低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我们显然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两种倾向或双重旨趣,但是我们已习惯于形式逻辑的同一,害怕不一致和矛盾,也不太理解自我矛盾,我们非要把矛盾切成两方面然后归结到一方面才心安理得,而未意识到这种自我矛盾的真实性和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实际上存在着实践作为元概念的逻辑规定和实践作为感性活动的经验性质之间的张力。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尚未引起理论界重视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了解这个问题,就不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特点及其对现代性的双重意义。

就哲学史而言,自从西方哲学走上概念性思辨哲学之路,能够充当元概念的概念就不能具有感性色彩,而只能是纯思维规定。如“思”、“有”等等。由此,西方哲学成为只钟情于独立自足的超验理念、实体的“形而上学”并逐步与神学合流。即使有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原则和“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人的意识活动中的“自我意识”特性进一步凸显,但也仍然未脱离一般的思想和逻辑规定。从笛卡尔直到黑格尔,近代西方哲学就主导倾向而言都是极力推崇人的纯理性认知的意识哲学或主体形而上学。可以说,原来主客不分、物我混同的人,经由理性思维及其哲学而从自然状态中超越出来,以理性的自我规定取代了过去的自然规定,达到完全自主自由的境界,并使理性思维成为人们生活的向导,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既然人的肉体生命连同人的具体处境都滞留于尘世且被轻忽,则人的完全自由的境界也只能是观念上和精神上的。于是,原本生发于生活的哲学却在追求“纯粹”和“圣洁”的理想世界中,消尽了人间烟火味乃至与人们实际的、感性的生存对立起来。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存在论上正是主张圣俗、灵肉二分的,这同时也是价值上的分野与褒贬,即尊圣域鄙俗世、崇灵魂贬肉体。于是,人的精神世界越是向天上升腾,人的现实生活就越是庸碌、齷齪和充满苦难。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与之同构,即主客二分和主体中心。这不仅膨胀了人对自然随意地开发消费的实用态度和霸主意识,还势必要强化人的生活世界的分裂,加

剧人类内部的“生存斗争”。受主流意识影响的人们把宗教、哲学、理论以及“元首和国家的政治业绩”,“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而把人的现实生存看成动物性的东西,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由于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是绝对的理性主义,只认同超验、绝对、同一、必然、确定,排斥经验、相对、差异、偶然、不确定,它就不能不成为从外部绳度和剪裁人的生活的教条和独断论,在否定人的活泼的生命和个性自由的同时,消解人们按照自己的具体境遇选择和决定其生活方式的思想能力。这一哲学所提供的理性主义理念,诚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发挥了奠基和支撑作用,但它也助长了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肆意扩张,并使人的生存愈来愈模式化、外在化。正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人类生存方式越来越严重的悖反性质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形而上学问题的深刻反省,才有了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有了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所开启的新的哲学视野。可以说,正是凭借“实践”这一人的原初事实(人不可能到他的实践之外去生存或找到立脚点),这一依赖自然又超越着自然、有现实性又有理想性的活动的双重维度和批判精神,马克思才超越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哲学乃至一切精神活动与人的物质活动背道而驰的取向,也才能在扬弃哲学形而上学的同时,拯救哲学的形上维度。马克思以自然的“人化”即实践地生成的“社会”来说明人的现实的生存并非“现成地直接呈现”在人面前的自在存在,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的形上维度,而这种形上维度本来寓于人们感性的社会生活之中。

笔者认为,马克思经由实践所发动的哲学变革,其实质可以视为把走向了外在对立和两极化的人的生存两重性,再有机地整合到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之中即实践之中。所以在实践唯物主义中不可能没有如下两方面因素的互动:一是超越的、理想的甚至可以说是统一的终极目的式关怀,一是感性的、经验的、当下多样性的现实关注,这两方面的

因素和向度不仅互斥互补，而且互相否定和转化。这同时表明“物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都要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和人的生活的物化可能，也说明了实践必须对自身给予批判和扬弃。作为基本的方法论，这一自我否定关系也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体现在这些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差异之中。哲学总要表达信念和希望，而信念和希望寓于现实之中；对于人们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对立，就必须到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中寻找。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经济科学而是经济哲学，所以不是单纯的实证，而是实证的批判。批判基于理想，实证则指向现实。但理想生发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由利害、爱恨、善恶、物性与灵性、当下与永恒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交织着展开的过程。所以我们经由政治经济学所找到的就不止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还有他们现实而又超越的生命信念、价值观念和生存情态。

#### 四

诚然，马克思的理论也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他是总体上的历史进步论者。但他并未忽视无数个体存在及其取向的千差万别，——而是看到了个体之间的关联及其整体利益；也没有忽视各种退步、灾难和牺牲，——而同时注意到了与此相反相成的另一方面。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他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不满，人类也正是从各种负面问题中吸取教训，逐步变得聪明起来的。没有什么能够保障人类不会堕落，除非他自身不甘于堕落。马克思对人类满怀期望与信心，因为人类不仅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并走进了现代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发现现代文明的问题并正在诉诸于革命性的改造（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当代，这也包括来自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和反体制的探索。马克思不是一个无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人类的命运只能在理性的尺度上展开，而是认为“自由”才是人的发展的根本维度。但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此岸，人们所达到的自由只能是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

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交换。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人们能够把愈来愈充裕的时间用于展示自己天性和才能的科学、文学、艺术、体育等等的创造中，以及人们的自由交往中。

的确，马克思说过不少这样的话，“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对未来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于“乌托邦”的理想。但这种假言判断不是算命，亦非空想，而是有着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事实做根据的。在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马克思的某些理想已经或正在实现。而这就意味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逼近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虽然从另一方面看资本的力量还在加强、生命力远未衰竭。我认为，这种情况既表明资本关系及其文明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表明时代批判的矛头要同时对准资本和与之匹配的现代科技理性；又表明我们还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辩证地看待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学说。与过去的主流性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同样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信仰与理性、当下与未来、统一和多样、肯定和否定等多重思想要素，是这些要素具有张力的整合。马克思所指认的共产主义，植根于人类社会性生活的源头之中，是从人类历史性的生存活动中内在地“生长”出来的，表征着人类在实践中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本质，表征着人类的“大道之行”。作为理想和信仰而存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体现的就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大道之行，所以它能够成为人的道义的源泉，给人的生活以希望和精神激励，并具有对现实巨大而持久的批判力量；而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及“形态”（如“社会主义形态”），则体现了人类具体的社会历史演进，就此而言，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通体光明，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后形态，相反，它还要被置于审视和批判的位置上。现实的运动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多姿多彩、各有特点，是人们在当下感受和体验着的生活态，但它毕竟受制于各种历史条件和人们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在当今只能与资本主义竞争并共存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

和资本主义一样地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工具理性并采取相应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因而也要受到它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and 影响。这就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同样会有一个现代性问题(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是搞不起来的),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对人文与科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层与民主和人自身的灵性与物欲的矛盾必须有高度自觉,善于利用、控制和逐步地化解这些矛盾。现代性负面问题的最终消解亦即工具理性重新作为手段从属于价值理性,有赖于通过长期的全球化过程形成休戚相关的“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的社会化”,——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指向及其对现代社会的超越性所在。

可以说,我们过去对于共产主义理解的一个严重缺陷,就在于没有从“共产主义”同一概念中看出差别,如同我们也没有从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这同一概念中看出作为非实证的“道”和实证的“发展次序”(发展阶段)之区分。结果,先是陷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无批判崇拜,一旦出现问题就动摇乃至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岂不知所放弃的是人的真正的自我确证和人生意义,是人类生活的超越向度和价值,也是自外于大道。但大道既为大道,就不可能总是隐而不彰。试问,即使正在被激烈批判的现代性及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其全球交往方式难道说只是有利于跨国资本,而有益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无益于共产主义以新的形式进一步展开?若果真如此,社会主义的中国何以能向世界开放并迅速地崛起?

历史哲学或历史主义是否一定导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我们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信仰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找到了它,这就是在他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中所蕴含的理想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统一与差异之间的张力。对于我们这些还困惑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思潮的人来说,解除困惑的重要途径大概就在于对这个张力的理解。

今天,由市场经济(在中国则是扭曲变形的市场经济)所助长的人的物欲横流、狭隘自私、精神迷惘、心灵空虚比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的确严重得

多,但是,人类的主体能力、知识水平、反省意识和文明程度也是过去时代所无可比拟的。人类“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展开着,仍然有待于当今人类“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务之急应是批判对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态度和行政干扰,扶发和强化市场经济的理性、平等、信用原则,健全法制,尽可能地限制强化了人的生存斗争和个人占有取向的市场经济的弊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民主政治,并从体制上杜绝官商勾结和政治腐败;同时大力发展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文化事业,突出观念形态文化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强化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提升功能,批判、扭转人的狭隘自私的物欲取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与西方经济和法律制度接轨的同时,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和文化的多元化取向,批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独断并努力改变其不合理的规则,维护民族和人类的长远利益,探索出真正可行的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亦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此而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探索“第三条道路”,都是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可贵努力。而重温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变化机理,确定我们今天的行动和方向,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①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4页,第1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

③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21页。

⑤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497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211页。

⑧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责任编辑:罗 苹

# 论东西方管理的融合与创新

苏东水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导, 上海 200433)

[摘要] 文章重点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东方管理思想在融合、回归中复兴; 二是西方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三是作为东方管理文化成功运用的华商管理的内涵与特点; 四是国际管理学者的共识。文章认为,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关键词] 世界管理 东方管理思想 西方管理理论 华商管理文化 创新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39-07

人类进入 21 世纪, 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入 WTO 之后, 将更为广泛地与世界融合。经济的融合必将导致管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西方管理学正经历着向东方管理思想的历史回归, 东方管理文化的伟大复兴将在新世纪实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我们必须把握住新世纪世界管理的发展趋势, 大力弘扬东方管理文化, 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

## 一、在融合与回归中复兴的东方管理思想

东方管理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一种博大精深的管理理论。在新世纪它将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在与西方管理理论的互补融合中, 在管理学的世纪回归中复兴。

### 1. 东方管理原创的现代价值

东方管理理论具有包容性、人本性、系统性、创新性、柔和性、服务性等特点。它是在总结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其理论渊源来自中国古代《周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等众家学说。通过对中国古代众家学说思想的扬弃, 提炼出具有现代价值的管理思想, 形成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修己安人”、“人民为本”; 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的“兼爱”、“利人”; 以韩非子

为代表的法家的“唯法为治”; 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应敌而变”; 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教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原创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其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

(1) 东方管理思想正在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战以来西方管理界一直在加紧吸收东方管理的智慧, 生态管理、绿色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现代人对古老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归。创新管理、集成管理、知识管理、柔性管理、网络管理、合作竞争管理、后发展管理、跨文化管理等, 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网络生态管理。

(2) 东方管理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增强综合国力。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经验表明, 东方管理提升了它们的产业竞争力。东方管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手段之一。

(3) 东方管理代表了企业管理人本化的发展方向。东方管理强化了企业管理的人性、整体、共生、人为为人的管理价值, 企业管理正进一步走向整合化、柔性化和人性化。东方管理还是企业无形资产管理的精髓。无形资产管理在对“人”的管理上, 与东方管理的人为为人学说殊途同归。

(4) 东方管理为现代家庭注入新的活力。无论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 家庭都是社会培育新型管理

主体的重要场所。东方管理为现代化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和家庭和谐提供了要旨。

(5) 东方管理思想可以避免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失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道必然经历人身、体制和心灵等三次解放,而东方管理思想可能在第三次解放中发挥重大作用。东方管理文化倡导人生健康、成功、自在,实现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对东西方文化整合的促进。

新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融合的世纪,中国人民将向世界各国文化学习更多,获益更多;同时,中华文明及古老东方管理思想的价值也将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中国将由此对人类、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 2. 东方管理思想的西传东归

管理理论的发展轨迹经历了由“中”到“西”再到“中西融合”的转化,使管理思想更重视“人”的作用,更重视文化的作用,更重视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对于东方管理思想的西传东归,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述:

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世纪回归。从“人为政本”到“以人为本”。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人为政本”,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时所讲的“人本”主要是从政府与官员的角度探讨,但带有强烈的为国忧民的色彩。在观念层面上与当今新经济时代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本质上相通。在新经济时代人本管理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因为它能够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能够创造企业和员工的最大价值。在管理实践中又重新坚持了人本精神。

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世纪回归。从“家国伦理”到“以德为先”。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统治者或思想家都引天然的家庭伦理进入国家的治理,家庭的礼俗秩序被扩大为国家的统治秩序,因此十分强调一种自然而然的伦理。西方经济发展到今天的网络经济,也意识到没有发达的网络道德保障网络的安全,是不会有发达的网络经济。在新经济时代,“以德为先”正是适应了新管理的需求。

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世纪回归。从“社会责任”到“人为为人”。这是管理学世纪回归的核心。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获

得人们认同的过程,等到认同后,更是一个“为人”的过程。这对任何组织也都一样。管理学从注重组织和人的社会责任,发展到人为为人的境界。

建立东方管理理论体系为推动东方管理现代化所必需。我认为东方管理理论体系由治国学、治生学、治身学、治家学四大部分组成。其管理的哲学要素可以简练地概括为15个字,即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这15个要素可以分别简要解释为:治国之道、随机应变、以人为本、运用权威、事实求是、以和为贵、重器利器、依法治理、取信于民、运筹帷幄、谋划决策、巧妙术、高效廉洁、勤俭致富、圆满合理。东方管理文化精髓或本质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通过东方管理文化的精髓的应用,推动东方管理的现代化,从而建立适应新世纪的新的管理模式。

## 3. 东方管理理念的创新

东方古代管理思想并非都适用于当今世界。必须结合新世纪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古代东方管理思想进行扬弃,从古为今用出发,进行东方管理理念的创新。我认为这种创新突出体现在“三为”上,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1) 以人为本。所谓“人”,就是处于管理系统中的人,即中国古代所谓的“民”。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孔子曰:“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人。”墨子曰:“君,臣萌通约也。”孟子说:“民为贵”,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此可见,早在2000年前,我国古代先哲们就提出了人本思想。这些思想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从管理学角度说,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就是要求管理者要为他人着想,要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关心爱护他人,帮助他人成就事业。

(2) 以德为先。儒家提出了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命题。从这一命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身”,即从自我管理开始。通过这一命题,将管理行为建立在牢不可破的根基之上。《大学》中有“德者本也”之说,可谓对管理学哲学基础的界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质是“安人”。“修己”才能



“安人”是一种人性化的、根本性的管理方法，也是建立在牢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治理方法。“修己”与“安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3) 人为为人。这是揭示管理学本质的核心命题。“人为”就是“人的行为、作为”，中国哲学重视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可塑性，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为人”是“人为”要达到的目的。就管理行为而言，管理活动要始终兼顾到被管理者。“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人为为人是对古今中外管理行为本质的高度概括，是“激励与服务”积极行为的综合体现，强调人自身行为的激励与修养。我认为，每一个管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还是现代企业以服务为宗旨的管理理念，都体现了“为人”的管理目的。

##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1. 西方管理原创的现代价值

纵观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发展是旧的理论的修正，是对旧的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西方管理原创在今天仍极具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

(1)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的著名论著使其成为第一位管理大师；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成为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夷为鉴，可以导改革。

(2) 西方管理原创的理论代表当时时代的需要，然而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具有继承性的，原创的管理理论经过现代管理学者的修正，产生了管理学理论的创新。今天我们学习西方管理原创的著作，就是要合理地继承他们的理论，并研究现实问题，最后提出适于现代社会的管理理论、理念和方法。

(3) 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具有合理的内核，是今天倡导管理人性化、柔性化的重要的补充。泰罗的科学管理在今天看来由于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适当当今新经济时代。但其中合理的科学成分却仍具现代价值。在今天强调以人为本，人本化趋势日益突出的时候，我们仍需寻求人本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4) 西方管理原创与东方管理文化具有互补性，吸收他们的合理内核可以推动东方管理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思潮正影响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东方管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东方管理的人本思想与西方管理的科学思想互补互融是推动管理学创新和发展的正确途径。

总之，在管理实践中吸收西方管理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合理部分，在弥补其理论上的局限的基础上，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是我们当今管理创新的关键。

### 2. 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及启示

近20年来西方管理在不断地创新，管理理念正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重视比较管理研究的理念。西方比较管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过比较管理研究，管理理论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普遍认识到一国文化传统对于管理方式的形成和运用具有很大影响，从而在寻求管理的普遍规律以及管理方

式、方法的移植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更加认识到管理中“软因素”的重要性。所谓软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强调管理中人的因素,特别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

(2) 重视企业文化的理念。企业文化热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管理学家从国际竞争角度,在对日本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管理的差异主要在于文化。为提高本国的管理水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研究。管理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3)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彼得斯等人为代表分析批判了过去管理理论的缺陷,认为过去的管理理论过分拘泥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甚至是与人为敌的管理。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进行一场“管理革命”,使管理“回到基点”,即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的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管理模式。这一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于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4) 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彼得·圣吉首次提出了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管理理念,这种组织被认为是新经济时代的组织形式。彼得·圣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未来惟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学习型组织。”在《第五项修炼》书中他提出要在学习型组织中进行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

(5) 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的理念。查尔斯·M·萨维奇在其著名的《第五代管理》中明确提出了“通过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来共同创造财富”的理念。所谓虚拟企业就是不仅把公司成员,而且把供应商、公司顾客以及顾客的顾客都看成是一个共同体,充分调动内外各种资源。其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书中还提出了未来管理模式要在五个方面发生转变,即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变;从例行程序向复杂性程序转变;从序列活动向并行活动转变;从工业时代的概念性原则向知识时代概念性原则转

变;管理在结构、控制、权力、交流等方面将发展变化。

(6) 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1998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达尔·尼夫在其主编的《知识经济》一书中,基于“下一波经济增长将来自知识型企业”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管理理念。作者认为,以向顾客提供信息为基础的企业将胜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把信息转变成知识的企业将会是最成功的企业。并指出,灵活性、适应性、反应能力和快速革新能力,正日益被看作为知识经济中最佳的组织结构要素。

(7) 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知识管理被看作管理学理论新发展的突出点,也是西方管理的最新理念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已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资本。知识管理主要说明如何对知识资本进行管理。而在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部分,是知识企业价值实现与价值增值的重要基础。企业对知识资本的管理应在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和顾客资本这三个环节上体现出来,应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利用。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影响之一是要求企业建立知识密集型组织。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管理的特点是:善于利用知识创新与知识资本带来的优势,同时在管理方式上有利于员工之间开展思想交流与知识创新活动。

以上西方近 20 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下面几点启示:

(1) 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 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

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重要作用。

(3) 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这也是西方产生比较管理理论的原因。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 三、华商管理: 东方管理文化的成功运用

华商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以及华商足迹所至的土著管理文化相融合的成功典范。回顾华商的发迹史,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令人震惊。然而,华商总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与智慧,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成功。

#### 1. 世界华人的创业特点

世界华人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如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概括其创业特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家族式创业。世界华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历来重视家族血缘关系。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因为血缘关系,同一家族的人,天生就有一种互相亲近和彼此信任的感情,所以,华商在创业时,首选的合作伙伴大都是家庭的成员。这是海外华商企业大部分为家族型企业一个主要原因。华人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人人都生活在这张关系网中,克勤克俭,严于律己。经营者实施着对家族制企业的全面控制。

(2) 利用“五缘”进行网络化经营。华商网络是指海外华商在非政治的、形态不拘的联系中,凭藉“五缘”纽带,基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泛商业网。它在卓有成效的海外华商经营中影响深远。“五缘”包括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

系;所谓文缘就是文化关系;所谓商缘就是因物品的交易而发生的关系;所谓神缘就是供奉之神祇宗教关系。由于“五缘”网络的存在,使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家族企业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密切的信息、技术、资本、商品等交流,保证了企业在一定范围的发展与进步。有人把世界华商网络形象地比喻为网络没有统一的控制中枢,从任何一点开始联结都可以进入,既便于协作,又强调独立奋斗。

(3) 足下生财、勤劳致富。综观华商的家庭出身,多半是生活窘迫的农民和小商人等下层劳动者。他们抱着白手起家的志向,前往海外创业。足下生财这个说法,生动地说明了华商的成功是靠自己的勤劳、靠自己的血汗换来的。海外华人并非天生就是企业家,他们移居一个新的国家,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具有一种创业文化。这种创业文化既强化了他们不满足现状的价值观念,也保持并发扬了他们的民族共性、自豪感、自尊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从而形成并壮大了海外华人的社会资本。

以上特点在老一辈华人创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新一代华人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依靠知识和信息致富,如创办雅虎的杨致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3. 东方管理文化在华商中的成功运用

世界华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国内外的许多管理学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世界华人对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文化的成功运用。这包括三个方面:

(1) 运用“人缘”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

世界华人利用华商之间形成的网络进行经营,即运用“人缘”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华商网络以亲缘、地缘、文缘、商缘、神缘为纽带,这“五缘”的本质在具有东方特质的关系。通过“五缘”形成的华商网络是一种社会网络,它可以提供情感、服务、伙伴关系、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持。世界华人的成功是因为华商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以人为本”观念的体系。

(2) 遵奉“人德”文化——具有“以德为先”的素质

世界华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遵奉“人德”文

化,极为重视商德。其内涵可概括“诚”(以诚相待)、“信”(以信为上)、“和”(以和为贵)。

“诚”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华商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华商,把“诚”字奉为自己人生处世的信条,以“诚”待人,以“诚”处事。不仅对自己的属下讲“诚”,而且在与其他人的经济往来中也是如此。所以,华商又有“诚商”的美誉。“诚”与“信”相伴而生,华商深谙此理,正因为华商以“诚”在先,所以才有了信誉在后。

“信”也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儒家学说的“五常”中,“信”字被恭列其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得住脚,并且有所作为,就必须为人诚实,讲究信誉。在华商企业中人际信誉有时甚至取代法律的强制作用。华商众多的东南亚各地,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市场规范尚未发育,而华商在这种环境下已习以为常,他们在资金运用、企业管理、风险回避等方面自成一整套手段,并行之有效。有时,华商强调人情,注重情感而疏于法制。人际信誉成为华人商业信誉的重要基础和依据,诚信实际上成为一种资产,一种保障,道德约束成为法律强制之外的又一重要商业机制。正因为商业网络是华人赖以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天地,人际信誉也就愈显重要。如果缺乏基于诚信的人际信誉,这种网络也将难以维系。

“和”体现了儒家学说中的“和合”思想。

“和”即调和、和谐与协调。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更是将“人和”置于“天时”和“地利”之上。“和为贵”为儒家思想的著名格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信奉“和为贵”处事哲学的华商们,都很善于处理令许多西方老板很感棘手的雇主与员工关系。从新加坡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的亲力亲为到马来西亚“种植大工”李莱生汗流浹背地与工人们一起干活,都体现了华商极为“人和”。华商的成功与华商奉行“和为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 坚持“人为”文化——体现“人为为人”的影响

世界华人在其创业过程中坚持“人为”文化思想,充分体现了“人为为人”的深刻影响。华商管

理中的“人为”文化具体表现在“俭”、“搏”、“善”,即勤俭、拼搏、慈善上。勤俭和拼搏体现了华商的人为,慈善体现了华商的为人。

“俭”。华商以“俭”为美。这是墨子提出的一种经世思想,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所推崇的美德。华商移居他乡,谋生不易,更珍惜点滴所得,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奉行勤俭的原则。这种以勤俭为原则的生活习惯,也被他们带到企业管理中,使他们在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到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以尽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获得更高的利润。例如,“船王”包玉刚在企业管理中特别重视控制成本和费用开支,他的原则是“能省则省”。印尼木材大王黄双安把公司院子里工人丢弃的各种小木块逐一捡起来,准备留作他用。

“搏”。拼搏是华商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华商创业的成功,需克服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从华商的家庭出身看,多半是生活窘迫的农民和小商人等下层劳动者。他们多数在生活极为艰难时前往海外,开始充满荆棘的异国生涯。他们缺少资金,没有退路,只有拼搏,白手起家。可以说,华商的成功是靠勤劳、拼搏和血汗换来的。

“善”。华商成功后非常注重慈善。他们的慷慨与勤俭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李嘉诚对国内教育、福利事业捐赠,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其中最出名的是在广东汕头捐建了汕头大学。邵逸夫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的捐献也超过10亿元人民币。另外还有陈嘉庚、黄怡瓶、王克吕等众多的华人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

#### 四、国际管理学者的共识

管理学发展到今天,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论,但是在一些重大的观念上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近20年代来,我本人在各种场合传播东方管理文化,在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中与国内外管理学者进行广泛学术交流。我认为,国际管理学者中已经在“人为管理”观念、“管理文化”的意义和“融合发展”必然性等方面形成了共识。

1. 对“人为管理”观念的共识。管理学者们普遍认为:(1)“人为管理”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文化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基础上的新型管理模式;(2)“人为管理”观念不仅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渊源，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赋予了它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3)“人为管理”代表了管理人本化和柔性化发展的方向，强调人的作用、文化的作用和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4)“人为管理”顺应了人的行为规律，成为学习型组织、知识型组织、知识管理等可供实践的管理模式；(5)“人为管理”注重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并致力于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是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的新型管理模式。

2. 对“管理文化意义”的共识。管理学者们普遍认为：(1)“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管理文化”对于管理方式的形成和运用具有很大影响；(2)“管理文化”可以成为企业的一种“软约束”，一个企业的管理文化有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3)企业的管理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4)融合多种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管理文化”比单一的“管理文化”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必须以学习的态度，促进“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

3. 对“融合发展”必然性的共识。管理学者们普遍认为：(1)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思潮开始影响地球的

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永恒的主题和旋律，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不同文化之间要互相补充，吸取各自管理文化的合理内核。西方管理学需要吸收东方人本管理思想，而东方管理学更应当学习西方管理理论，使东方管理学更加科学化、客观化。(3)未来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取向应以东方管理文化为核心，吸收西方管理文化的科学成果，以丰富管理科学的理论宝库，从而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

19世纪看英国，20世纪看美国，21世纪要看我们中国了。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放眼未来，我们肩负着复兴东方管理文化的历史使命。

#### 参考文献：

苏东水著《管理学》，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

苏东水主编《世界管理论坛》，《世界经济文汇》，2000年特刊。

苏东水主编《第五届东方管理论坛》，《世界经济研究》2001年增刊。

苏东水主编《世界华商管理大会文集》，《世界经济文汇》，1999年特刊。

责任编辑：韦 前

# 艾勒曼“民主公司制”的理论要点解析

钟 坚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 本文从民主公司的理论构架、内涵、社会性质、成员权利与资本权利、形式五个方面简要地概括艾勒曼的“民主公司制”理论, 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理论对我国企业改革的一些借鉴和启迪。

[关键词] 艾勒曼 民主公司制理论 解读 评析

[中图分类号] F1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46-0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P·艾勒曼的“民主公司制”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未能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为此本文试就艾勒曼的“民主公司制”理论作一简要解读和评析, 以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 一、民主公司的理论要点

1. 民主公司理论的基本构架。艾勒曼民主公司理论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民主公司的财产结构, 它建立在人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这样一种原则上; 二是民主公司的管理结构, 它建立在人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民主自决权利这样一种原则上。这两个原则各自与常规所有制权利中的选举权和剩余净收入权相连, 这两种权利赋予纯粹的剩余索偿人角色, 被称为成员权。在民主公司里, 一个职工的工作使他具有公司成员资格。民主原则说明选举权应该赋予工人, 劳动财产理论说明剩余索偿权应该赋予工人。民主原则将直接控制权, 即管理决策的最高权力赋予被管理者。由于公司外的人不在公司的管理范围之内, 因此民主原则不赋予外方选举管理层的直接控制权。而劳动理论历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1) 价值理论认为价格或价值是由劳动确定的; (2) 财产理论认为职工应当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正是作为财产理论的“劳动理论”, 也就是劳

动财产论, 决定了民主公司财产权利的结构。

2. 民主公司的内涵。民主公司是指公司职工所控制的公司, 艾勒曼认为, “民主的公司(Democratic Firm)(也被称为‘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或‘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公司’)是由所有在公司内工作的人‘所拥有’和控制的公司, 正如由所有的公民控制的市、州或国家的民主政府一样”。艾勒曼认为, 在民主的公司里, 直接控制权应该被赋予两个原则: 一是“受影响利益原则”, 即个人合法利益受到某个组织决策影响的所有人都应该有对这些决策进行约束的间接控制(联合或个人否决)的权利; 二是“民主原则”, 即对一个组织的直接管理权应该赋予被该组织管理的人, 以使他们实现自我管理。股东、供应者、顾客和当地居民不受企业的领导, 他们不是被管理者。只有在企业工作的人(担任职工角色的人)才是被管理者, 因此只有他们才会被民主原则赋予最高的直接管理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管理或统治者主要对被管理或被统治的人负责, 而不对某些缺席的业主(Absentee)或外部党派团体负责。被管理者采用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选举管理者。

3. 民主公司本质上是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机构。艾勒曼认为, “民主公司是民主的组织模式, 在非政府的意义上说仍然是‘私有的’。民主公司的成员资格是转让给在公司工作的功能角色的个人权利。”他说, 虽然民主公司和资本主义公



司都是非政府意义上的“私有的”，但是，民主公司是社会机构，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资本主义公司是私有公司，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基础上的经济民主制度才恢复了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所以说，民主公司绝对没有侵犯私有财产，而是恢复私有财产占有的合理基础。因此，由资本主义公司转变为民主公司是通过恢复劳动占有基础来改造和完善私有财产制度的方法。民主权利关系是一种权利的委托，即管理者代表被管理者和以被管理者的名义从事管理工作，民主法规将不可转让的管理权利通过授权或委托的方式使管理者代表被管理者使用权利。

4. 民主公司的成员权利与资本权利。在民主公司内，成员权是赋予在公司工作的个人权利，即赋予职工以职工的权利，而不是资本提供者的权利。这样，通过将成员权、选举权和剩余部分索偿权赋予公司的劳动功能角色的方式，民主原则和劳动财产理论在公司内、在法律上得以制度化。当成员权被赋予劳动角色时，这种权利被称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权利。此外，成员权还应该被赋予除选举权和剩余部分索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利，即当前资产和债务的净价值权利。它们代表了原始投入的价值加上公司当前和过去成员再投入的过去劳动成果价值。这种属于成员过去劳动的权利应该被当作个人财产得到尊重，最终应补偿给当前和过去成员。当成员权被作为财产或资本所占有时，即使这些权利被雇员所占有，成员权还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艾勒曼认为，第三种权利(资产净值权利)的价值是净资产价值，即资产价值减去企业债务价值。它产生于企业的原始资本或缴入资本加(减)每年公司经营留存的利润(亏损)，因此，不应该被看成是附属于在公司工作的功能角色的个人权利。“一旦控制权和利润权从资产净值中分离出来，任何对于这种资本的其它要求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只接受利息而没有选票和利润的债务要求。‘自有资本’(在传统意义上的)在民主公司内是不存在的。”因为劳动租用资本。

5. 民主公司的形式。(1) 职工合作社。艾勒曼认为，“职工合作社是一种成员在公司内工作的人的合作组织形式，成员的贡献是以按小时或按工资计

算的劳动为基础的。因此，职工合作社是一种公司，在这种公司内，成员权、选举权和利润权都赋予在公司内工作的人，选举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利润根据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当今大多数英国职工合作社都是按共同所有制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财产的产权结构最适合于小型、劳动密集、以服务为主的合作社。”(2) 职工持股计划(ESOP)。艾勒曼指出“职工持股计划的首创者路易斯·凯尔索(Luis Kelso)认为，职工持股计划是民主的资本主义。”“以财富的重新分配为目的的职工持股计划使普通百姓参加‘一项现实的行动’，使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更为‘民主’”。但事实上，随着参加股份制的职工的增加，职工将退出工会。实际上，许多职工持股计划是按反工作场所的民主原则而设计的，因此计划必定使职工处于没有任何集体决策的形式和行动的境地。(3) 混合民主公司模式。艾勒曼认为，混合的蒙德拉贡式职工合作社和内部化民主的职工持股计划的模式，就属于“混合民主公司”的范畴。混合的蒙德拉贡式职工合作社是将某个百分比的所有权按蒙德拉贡式职工合作社形式进行组织的，即按统一认定的原则(比如平均或根据工资)确定全部职工股份选票，职工的剩余部分根据劳动分配给职工。内部化的民主职工持股计划已经是民主的职工所有制的混合结构，职工持股计划中的职工所持股比例可以是任意的，持股部分在合作社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它是在公司内部将部分所有权组织为“民主职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在混合公司内，股份包含有职工股份制权利的主要三种所有权，即选举权、利润权和净资产权。但是股份制中职工持股部分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的方法组织的，因此，选举权与利润权(职工股所具有的)相分离并作为个人权利让渡于职工角色。

## 二、基本评析

艾勒曼是美国工商顾问、经济学家、数学家、作家。他既是推动管理人员和职工购买股份从而实现职工持股制的先驱之一，又是将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向其他国家进行积极推广的主要学者。艾勒曼凭借着服务于国际性组织的机会，通过广泛接触各国所进行的企业改革实践，对实行股份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创新价值。他不仅

阐述了从企业内部劳动产权入手建立“民主公司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且分析了欧美的职工持股计划、日本大型的职工控制的公司、西班牙蒙德拉贡职工合作社以及前南斯拉夫的自治模式,并着重指出在企业改制中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尽管艾勒曼所持的理论和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并适用于我国,但是他所阐述的民主公司制的理论和观点,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却不乏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1. 要辩证看待欧美资本主义模式。在艾勒曼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英美模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英美资本主义确实受到深层自相矛盾的困扰,其自身违反了私有财产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有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中民主和正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替代形式”,即民主的公司制模式。在这里,艾勒曼实质上是对原苏联东欧国家“非‘社’即‘资’”、完全照搬欧美模式的思维和实践提出了批评,也是对他自己过去鼓吹俄罗斯和东欧私有化观点的修正。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显然,艾勒曼所持的模式多样化的观点值得肯定。

2. 通过职工持股制度来实现劳动产权。艾勒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阐述了民主公司的普遍企业形式。他把这种实现了企业内部劳动产权的股份制企业称为民主的公司制,但又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讨论股份经济,而是把建立和推行一种职工持股的股份经济作为论述的重点。艾勒曼还特别指出,“目前,全中国各地都在进行各种企业形式的多种

试验。较小型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常进行职工控股和内部职工主权的试验。经理和职工被看作是企业的重要成员或所有者。由于在公司内工作的人能够联合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因此,这种企业公司可以被称为‘民主的公司’。”“混合的民主公司可能会成为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许多试验的‘持股合作企业’的普遍思想模式”。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制以及推行职工和管理者持股制度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艾勒曼的理论无疑给了我们新的启示,通过职工持股制让劳动者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对所有制的参与,并实现对企业的民主管理。这种对所有制的参与,使企业职工不再是理论上的主人,而且成为现实的主人,使职工同企业形成一定的财产关系,进而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样,既可以激发内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可以提高他们对企业的关心度、爱护度和参与度,从而增强公有制企业的凝聚力和发展力。

#### 参考文献:

[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公司制》,新华出版社,1998年。

张彦纯等:《西方国家企业的“经济参与”制度》,《外国经济管理》1994年第10期。

钟坚:《西方国家推行职工持股制的经验与启示》,《深圳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季敏:《国外员工持股制及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上海改革》2001年第6期。

责任编辑:郑红军

# 银行运营价值的特点及其对 银行危机处理的影响

陈志英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在特许权价值基础上提出银行运营价值概念, 并对这种运营价值的特点、规模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强调在银行危机处理中, 要注意保持银行运营价值对减少银行危机损失的影响。

[关键词] 银行危机 运营价值 危机处理

[中图分类号] F83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49-03

银行或银行资产处于运营状态的市场价值与处于清算状态的市场价值存在着差异。在破产银行及其资产的拍卖过程中, 购买者通常会支付高于银行资产评估价值的价格购买银行资产, 这种情况表明存在着基于银行负债、资产及银行本身的无形资产价值, 我们称之为银行的运营价值。银行通过付出一定代价和成本建立起来的经营资源, 具有价值, 能够用价值尺度加以度量。

## 一、银行运营价值的特点

### 1. 银行运营价值的构成和特性

银行的运营价值主要由银行的特许权价值、组织价值和经营价值构成。一是特许权价值, 它是银行运营价值的主要部分。特许权价值产生于银行业的准入障碍,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许权价值就是银行牌照本身的价值。准确地说, 特许权价值是银行基于特许经营权建立起来的银行经营资源的规模、质量和结构所形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银行经营资源本身的价值, 但又必须依附于银行的经营资源而存在; 它产生于银行业的经营准入资格, 但其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经营结果。二是组织价值和经营价值。组织价值和经营价值是银行组织结构和经营特性所体现的价值。它反映建立这一组织结构和经营特性的成本, 以及这一组织结构和经营特性的市场经营效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誉、客

户关系、经营人才队伍、经营管理文化, 以及良好的市场份额、稳固的客户基础和有效率的贷款生成结构等, 都体现出一定的价值, 成为银行组织价值和经营价值的组成部分。

银行运营价值的第一个特性是它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由于银行的运营价值是一种无形价值, 很难对其作出准确的计算, 体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 可以用经验模型分析等方法对其作出评估。实践中通常用失败银行购并者所愿意支付的溢价大小与所承担的资产的预期损失的差来度量, 即如果我们假设溢价为超出所承担的银行资产帐面价值的价格部分, 则: 银行的运营价值= 溢价+ 所承担资产的预期损失, 而所承担资产的预期损失= 资产的帐面价值- 资产的市场价值。

银行运营价值, 从概念本身出发, 是与银行核心存款(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正常存款, 一般指活期存款、小额定期和储蓄存款)量的多寡、银行实际净值的水平呈正比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以这两个变量作为银行特许价值的替代变量。银行的核心存款量的多少, 显示出银行吸纳存款的能力、存款的质量和实际吸纳存款的效果; 反映出银行经营资源的集中和运用能力与水平。同样, 银行实际净值水平的高低既反映市场对银行健康状况的评价, 也间接反映银行集中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如果银行是上市企

学术  
研究

业,则银行股票价格的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运营价值的变化。这些潜在的能力和实际水平又进一步表现为银行的生存、盈利和发展能力。在银行失败处理过程中,并购者所支付的“溢价”就是反映这种能力的价值。因此,银行的运营价值与银行资产的质量、银行的风险水平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银行效率的反映。

银行运营价值的第二个特性是它的依附性。即银行的运营价值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银行的负债和资产以及银行本身。一旦银行被清算,其运营价值也随之消失。因此,处理失败银行资产所使用的方法会影响保存特许权价值的能力。虽然当资产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会引起一些价值损失,但风险资产保留在运营机构里要比清算价值高。例如,在处理失败银行的购买并承担债务(P&A)方式中,破产银行的存款和资产的一部分是由一家收购银行来承担的。在保险存款清偿方式中,银行关闭后,由保险机构或其他危机银行接管机构清算破产银行的全部资产并负责支付保险存款人。因此,运营价值在购买并承担债务或整体银行交易方式中得到了保护,但在清偿方式中则没有。1988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完成了52所失败银行的不关闭援助交易和整体银行P&A交易。在这些交易中,并购行接收了失败银行的大部分资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平均成本为失败银行帐面资产价值的20%,比这一时期处理的所有失败银行的平均成本低10个百分点,虽然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这10个百分点的差异,但主要还是由于资产保留在运营机构中比清算价值高得多。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多数有问题的银行要到它们最终失去资产的20—30%时,才会开始资不抵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清算一个刚刚资不抵债的银行也会产生巨大成本(交易费用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清算状态下的银行及其资产的价值将远低于运营状态下的价值)。

### 2. 银行运营价值的估算

购并失败银行的银行之所以愿意支付运营价值,其原因在于银行进入市场的特许方式,以及建立银行的经营资源需要付出代价并承受一定的风

险,这种代价并不包含在银行的资产价值中。那么,究竟怎样估算银行的运营价值量呢?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和不同国家以及银行的不同状态下,银行的运营价值有很大差异,有时甚至是差异极大。为此很难给出个准确的数值,只能在实证基础上作出基本的统计分析,以估算运营价值量。下表是对美国采用购买和承担债务方式(P&A)拍卖处理的160家商业银行所作的简要统计,表中的数据说明确实有一些失败的银行具有比较高的运营价值。

购买并承担债务方式处理的160家  
失败银行简要统计表(1985—1988年上半年)

| 变量            | 平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 溢价(美元)        | 916.05 | 62600.00 | 0.00 |
| 溢价与核心存款的比率    | 0.026  | 0.222    | 0.00 |
| 溢价与所承担的资产的比率  | 0.044  | 0.277    | 0.00 |
| 溢价与破产银行总资产的比率 | 0.019  | 0.178    | 0.00 |

资料来源:FDIC《Managing Crisis》。

收购者对160家失败银行所支付的平均溢价为916.05美元,所支付的溢价平均约为破产银行资产的2%和购买者所承担的资产的4%。也就是说,表明平均而言,收购者支付的溢价水平并不高。但由于银行的运营价值为溢价与所承担资产的损失之和,所以失败银行的运营价值应高于上述比例。从上表可以发现,某些失败银行的运营价值可能高达所承担资产价值的27.7%和破产银行总资产价值的17.8%以上。

### 3. 影响银行运营价值的因素

影响运营价值的因素很多,银行业准入的壁垒和宽严程度是运营价值形成的基本因素,但并不是决定运营价值量的最主要因素。对运营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银行的经营资源水平和效率,而效率通常通过实际和潜在的赢利能力来衡量。购并银行对运营价值支付的成本必须能够最终通过经营的赢利得到补偿,这是购并银行支付运营价值的前提。因此,赢利能力是决定运营价值的核心因素,能否带来实际和潜在赢利是购并银行支付成本的最终依据。效率可以是总体上的效率,也可以是局部的效率。银行有时会因为外部因素或意外情况面临财务

危机,而不一定因为效率下降才导致失败。这时,银行存在整体上的效率,购并银行愿意为运营价值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如上表反映购买者愿意对某些银行支付高达银行总资产 17.8% 以上的溢价。有时,虽然银行整体上是无效率的,但其若干部分仍然可能是有效率的,购并银行会对失败银行的局部效率水平给以恰当的评估和支付相应的成本。

因此,影响银行运营价值的因素除准入壁垒外,更多地反映在影响银行经营效益和风险的内外因素上。银行具有高比例和较大规模的核心存款,表明银行有着较为重要的和高质量的经营资源,而且有低成本融资的能力。如果银行过多地依赖高成本融资,必然降低银行的运营价值。从外部看,银行的外部环境会对银行的运营价值产生普遍影响。银行业竞争加剧、存款利率上升以及金融创新的加速发展都有可能稀释银行的运营特别是特许权价值。如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放宽金融管制时期,由于银行大量吸纳高成本和不稳定存款以及广泛运用非利率竞争手段,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导致了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的特许权价值普遍下降。80 年代末实施《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制法》以后,由于监管当局强化了监管,改善了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的特许权价值迅速恢复和提高。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出现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银行大量违规经营,导致银行的赢利能力和效率下降。这可从银行购并分支机构愿意支付的成本下降反映出来。

## 二、银行运营价值对银行危机及危机处理成本的影响

运营价值对银行危机及危机处理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运营价值变化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间接影响银行的价值。二是运营价值本身的存留对银行危机处理的成本支出构成直接影响。

### 1. 运营价值对银行危机处理成本的直接影响

运营价值对银行失败处理成本的直接影响,表现在银行失败处理过程中能够尽可能保留多少银行的运营价值。这与银行失败处理方式的选择和处理节奏的把握有密切关系。(略)

### 2. 运营价值对银行危机处理成本的间接影响

运营价值对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当银行运营价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通常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银行的特点决定银行具有服从“内部人控制”假设的倾向,但当银行具有较高的运营价值,特别是较高的特许权价值时,银行管理者与银行本身的利益方向趋于一致,他们会采取谨慎、承担合理风险的行为来保持特许权的价值,避免银行被监管机构关闭以获取长久利益,从而避免或减弱道德风险。当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下降时,银行管理者的行为则发生显著变化,“内部人控制”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

A.S.Cebenoyan 等人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证明美国在储贷协会特许权价值较低期间,特许权价值对储贷机构的风险有最大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特许权价值升高到一定程度,它以及管理者的持股水平对储贷机构风险的影响逐渐减弱。当经理人员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时,在特许权价值下降的情况下,会导致储贷机构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时机构往往具有较高的融资杠杆比例。特许权价值较低时也导致欺诈行为上升。从 1986 年到 1988 年期间,低特许权价值导致高风险行为,特别是储贷机构有较高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时更是如此。但当 1993 年储贷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开始恢复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有效益的风险行为呈正线性关系。

### 三、提出银行运营价值概念对银行失败处理的意义

提出运营价值概念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要注意运营价值的管理问题。银行运营价值既取决于银行本身的经营,也取决于银行的外部环境。加强对影响银行运营价值因素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加强对低运营价值银行的监管和纠正,对保持银行体系的健康和减少银行失败十分重要。二是注意在银行失败处理过程中保护银行的运营价值。既然失效银行可能存在一定甚至比较大的运营价值,那么在处理失败银行的过程中,注意保护银行的运营价值,对实现失败银行经营资源的有效转移,减少资源损失和控制处理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失败银行运营价值水平高低也是决定

# 新经济条件下 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前瞻

黄振荣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 美国经济的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向来是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美双方在该领域的原有的分歧将得到不断的弥合, 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中美纺织品贸易将呈现新的特点。本文着重考察新经济条件下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分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美纺织品出口仍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依据, 讨论在新经济条件下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所遇到的挑战和应对挑战的创新途径选择。

[关键词] 新经济条件下美国贸易结构变革 中美纺织品贸易 挑战与创新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5- 0052- 04

## 一、新经济条件下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决定其对纺织品进口需求的增长

20 世纪 90 年代, 克林顿政府继续采取里根政府的供应学派的理论主张和老布什政府尤其鼓励研究开发和大力改革学校教育的政策思想, 同时大力鼓励创新, 使高新技术产业得到飞速发展, 从而使美国经济步入新经济时代。从 1991 年到 1999 年, 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近 10 年的超常规速度持续增长。2000 年 2 月公布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 自 1995 年来, 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 2.9%, 大大超过了 1973 年至 1995 年 1.4% 的平均增长速度。1997 年美国商业领域和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 2.2% 和 2.8%, 1998 年为 2.8%、4.8%。在 1988—1999 年度, 美国商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了 3.1%; 与农

业无关的商业领域的增长是 3.0%。在 1999 年第四季度, 无论是全部商业领域还是与农业无关的商业领域, 劳动生产率增速都达到美国自 1992 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速度。此外, 1998—1999 年度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 6.4%, 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高达 10.3%, 为 1982 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的增长。

但是自从 2000 年第二个季度起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突然从第一、第三季度的 4.8%、5.6% 下降到 2.4%, 金融市场也随之紧缩; 最近美国接连遭受的恐怖袭击再次使得经济处于强烈的振荡中。但是, 美国的新经济并没有失去活力, 这是正常经济发展中的调整,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 可能很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因为其经济的核心在于创新, 它支撑着美国的高新

处理方法的主要因素。如果失败银行的主要部分是有效率的, 那么应该尽可能采取银行重组或整体银行购并的方式加以处理, 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其运营价值。而当失败银行的运营价值极低时, 为减少处理费用支出, 则可采用破产清算等简便方法。

参考文献:

陈志英: 《美国储贷协会危机的经验教训及借鉴》, 《走向世界——广东省第一批高层次管理人才出国进修论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A. S. Cebenoyan, E. S. Cooperman, C. A. Register, Ownership Structure, Charter Value, and Risking-taking Behavior for Thrifts, Financial Management, V. 28, No. 1, Spring 1999.

责任编辑: 郑红军



技术产业,确保了其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新经济”促成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两个主要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美国GDP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新兴产业、行业的比重迅速上升。“新经济”背景下的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

(一) 进出口贸易构成中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结构性变化。“新经济”下美国经济结构变化虽然呈某种服务化,但服务贸易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之势。按照美国官方贸易统计数据计算,从1990年到1999年,服务贸易在美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23%下降至19.8%。进一步分析表明,服务贸易在总贸易中比重的下降主要是由服务进口的缓慢增长与商品进口的大幅度增加导致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到1999年,美国商品进口总额增长了近1.13倍,服务进口总额只增加了70.6%。同一时期商品出口额增加56%,服务出口增加79%,快于商品出口增长速度。结果使服务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略微上升,由27.5%上升到28%左右。但服务进口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则出现大幅度下滑之势:由19.7%降为13.4%。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浪潮,并未提升撼动商品进口在美国贸易总额中的地位。

(二) 商品贸易的结构变化。按照标准工业分类(SIC)所划分的商品类别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进出口商品位次,并未发生大的变化。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相比,按出口额排名的出口位居前10名的商品位次,仅略有变化。具体来说,在美国位居前10位的出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是电子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其次是科学仪器、照相及光学仪器设备,这类商品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美国总的商品出口增长率;在位居前10位的大宗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是电子电气设备和化学及其相关产品,其次是纺织服装及相关产品。

总之,在新经济条件下,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其商品进口尤其是纺织产品的进口将大幅度增加,这将给我国纺织行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二、新经济条件下纺织品出口仍在我国对美出口中占重要地位

(一) 中美在纺织品贸易领域的互补性很强

1. 中国纺织业对美国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从1994年起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1997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达到455亿美元,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的15.4%。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很强,据统计中国出口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其中中国输美棉布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为8.23%;另如1995年中国对美出口纺织品原料及制成衣金额达到31.72亿美元,占到中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8.84%。

2. 美国市场对中国纺织品的依赖。美国是发达的经济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每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总额占到美国销售纺织品和服装的20—35%。美国鞋类市场产品的主体来源是中国,1991年美国进口外国鞋子95亿美元,其中中国产品占27亿美元,1996年美国消费鞋类产品12.19亿双,从中国进口就占了7.51亿双,据统计,中美纺织品贸易使美国纺织品制造商1991年度获得创纪录利润,比当年美国制造商销售平均收入高出4倍。同时,中国价廉物美的纺织品保证了美国的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的维持。正如国外舆论的报道“美国人24小时离不开中国产品”。

(二) 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口仍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出口仍将是我国对美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我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的传统产业,如汽车、住房、旅游等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扎扎实实地为新经济打基础。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的确创造了一块新的市场需求,但这种新的需求在我国远不如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所能创造的需求大。

2.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源泉。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的确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而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发展很快,但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体制上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每年仅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一两个百分点,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2%—3%的增长速度,而是要增长得更快,比如说每年要增长7%—8%,那

么,剩下的那6个百分点的增长显然还得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更快增长,仍将是我国较高增长率的主要源泉。

3. 我国高科技贸易发展缓慢。据海关统计,我国在1997年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技术产品仅占9.1%,而美国在80年代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比重就超过2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每年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率约为20%,其中形成规模效益的只占15%,仅占成果总量的3%。据统计,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另外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等少数类别。

如此看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可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纺织品的出口是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文已经阐述了在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的贸易结构变化将使美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对纺织品的进口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纺织品的出口是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美双方多年来关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普惠制待遇、纺织品关税和配额、反倾销、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分歧将在WTO的法律框架内得到规范的解决,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 三、应对新挑战的创新路径选择

#### (一) 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挑战

外部环境的挑战首先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绿色贸易壁垒是指由政府组织专家以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形式颁布的一系列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及各种措施,旨在保护有限的资源和人民健康,促进生态平衡,并对来自国外的进口商品加以限制。美国已接连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标志制度,要求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要符合环保要求,即产品在生产、销售、运输、消费的全过程中都必须有利于环境保护。近年来美国居民对纺织品的环保标准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对丝绸燃料的化学成分有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检测手段,如禁止含有所列举的化学物质的棉

布和含有可能致癌的偶氮染料纺织品的进口。这些壁垒使我国在未来的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还有亚洲国家间对美出口纺织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挑战。近年来,在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纺织业迅速崛起的事实面前,中国原有的原材料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逐渐丧失,目前,主要的天然纤维棉花的国内垄断收购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化纤实行国内市场保护价因此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纺织业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纺织和机织行业劳动力成本从1987年每小时0.23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0.58美元,高于印度的0.56美元、巴基斯坦的0.44美元、孟加拉的0.23美元、越南的0.37美元、斯里兰卡的0.39美元和泰国的0.14美元。据德国Werner International Co. Ltd的资料,以美元计算的工资成本,印度尼西亚1998年比1996年下降了53.8%,泰国下降了31%,巴基斯坦下降了7%,这都加剧了中国纺纱、毛纤和机织行业劳动力成本与东南亚各国对比的不利趋势。

#### (二) 来自中国纺织行业自身的挑战

1. 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从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方面看,初级加工产品如纱布的比重过高,制成品服装的比重偏低;从纺织行业内部看,附加值低的衣着用纺织品占3/4,产业用和装饰用纺织品却只占到1/4,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衣着用纺织品绰绰有余,即使大量出口后仍有大量积压,而产业用和装饰用纺织品却远不能满足需求,国家每年需要约10亿美元的外汇进口。我国产业用纺织品需求在2000年已达到200万吨,占需求总量的20%。这表明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

2. 从以量取胜逐步转到以质取胜。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具备相当的规模,但一直依靠以低价出口来换取量的增加,而非质量上的提高。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原因除配额限制因素外,主要是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出口数量和外汇不能同步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纺织服装产品更由于东南亚国家的低价竞争而遭受连续负增长的厄运。

#### (三) 以上两方面的挑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纺织

品服装行业科技水平低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低造成的

从绿色贸易壁垒方面看,科技含量低是我国纺织品服装面对美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我国生产的纺织服装产品科技含量不高,环保技术含量低,这与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紧密相关,我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大都还处于粗放式的经营阶段,多数厂商缺乏生产环保含量高的产品所需的资金和设备、尤其是技术。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行业科技水平低仍是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是:坚持不断降低初级加工产品如纱布的比重,加大制成品服装的比重,促使国际国内纺织品原料市场的全面接轨,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引导传统加工业调整结构,实现合理布局。当然,这需要我们加快纺织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纺织科技水平的提高,推进全行业技术进步综合经济效益的根本好转,加快纺织工业的产业升级。同样,我国纺织品服装行业以量取胜的原因,也存在于行业整体的科技水平低。而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在同其他亚洲国家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也在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 (四) 应对挑战的出路选择

面临新经济条件下的新的挑战,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保持对美出口传统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而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

首先,应加大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实施“科技兴贸”。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纺织行业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新工艺、新技术层出不穷,相信随着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对纺织加工手段的改造,纺织服装产品迅速提高科技含量将成为大势所趋。为此企业应建立技术中心,加快产业升级。技术中心应形成从织造、印染、情报、信息分析、染化料测试到服装设计的完整功能,从而使出口产品增加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推进贸易方式向高水平的来料加工出口发展。上海丝绸(集团)正是本着“科技兴贸”的原则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连续10年名列上海口岸出口创汇排名第一,在1999年出口创汇

已达到6.602亿美元。

其次,创新还包括知识创新,这主要表现在教育和人才。产业竞争的关键在人才竞争,纺织行业必须加大人才培养进而加大研究开发的费用,我国企业R&D的投入占销售收入不到1%,而美国的这个比例接近10%,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急需加大。

再次,培育自己的品牌产品。名牌产品的需求与普通产品的需求相比,在相同的价格下,有更大的需求量;同样需求量,名牌产品具有更高的价格。用品牌来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是竞争策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纺织服装行业通过培育自己的品牌产品,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声誉,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拓宽海外市场可以进一步增强产品出口创汇的能力。

总之,我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庞大,如果企业能够抓住机遇,重视创新,则在长期中所增加的资本总量不但不会从纺织服装业吸走大量的劳动力致使纺织服装业萎缩,反而会助企业一臂之力,最终使纺织服装行业成为新经济中的“朝阳产业”。

#### 参考文献:

- 唐小波、沈秋明等:《WTO法律规则与中国纺织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 赵伟、陈勇:《美国外贸:“新经济”背景下扩张的主要特点》,《亚太经济》2001年第3期。
- 李晋:《新经济与我国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1年第4期。
- 林毅夫:《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管理》2001年第7期。
- 孔凡昌:《跨越中国“入世”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2期。
- 李善同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2期。
- 曾永珍:《论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外贸的影响》,《对外经贸信息》1999年第12期。
- 沈国勇等:《科技兴贸增强外贸出口后劲》,《国际市场》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韦前

# 论中国企业管理的双重跨越与文化支持

徐增文<sup>1</sup> 张明之<sup>2</sup> 王 腾<sup>3</sup>

1.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系讲师、经济学硕士, 江苏 南京 210003)

3. 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WTO 将新经济现实地带到中国企业的面前, 中国企业必须适应环境的变迁而进行管理变革, 实现从传统的经验管理越过通常意义的现代管理阶段, 发展成为新经济下的知识管理这一巨大的双重跨越。本文着重分析六大管理变革, 最后讨论实现这种变革所应要有的文化支持。

[关键词] 企业管理 双重跨越 变革趋势 文化支持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5- 0056- 04

## 一、引言

入世将世界经济的脉搏和最新动态飞速而直接地传递到中国企业的面前, 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 新的生存和竞争环境, 竞争格局和竞争规律的演变, 要求对企业的管理哲学、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进行彻底的变革。而变革的艰巨, 其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经验管理层面, 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程度与西方企业相比还差很多, 基础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做得很不够。要从传统的经验管理跃过现代制度管理阶段而达到知识管理阶段, 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 新经济的竞争是以知识为基础、以核心能力为表现的竞争, 新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则是取得这场竞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传统的管理哲学和模式已经落后, 不能适应新经济的要求, 中国企业必须知难而进, 直面管理变革, 才能在新世纪的挑战中赢得先机。

## 二、从经验管理到知识管理的双重跨越: 中国企业六大管理变革趋势

管理的核心思维和观念总是与一定的经济时代相映照、相适应的。管理必须跟随经济的变迁进行变革, 才能够引导企业发展, 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规律的要求。WTO 将新经济真实地带到中国企

业的面前, 中国的企业必须实现从传统的、落后的经验管理越过通常意义的现代管理阶段、发展成为新经济下的知识管理这一巨大的双重跨越, 才能够真正应对 WTO 和新经济的挑战。具体来讲, 中国企业必须实现如下管理变革:

第一, 从维持型管理转向创新型管理, 建立企业主动出击机制。传统的管理观念强调成本、效率, 本质上是一种维持型的管理,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守业”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思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以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开发等产业和技术的飞速发展, 经济运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相应的产业竞争环境也在飞速变化。这种变化强调“非线性的未来”, 明天可能截然不同于今天。“未来”与“现在”之间, 不再是线性的延伸, 而是非线性的跳跃, 甚至是“断裂”或者“突变”。在这样的环境下, 企业原有的技术基础、产品实力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于竞争对手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而宣告失败与无效。企业在技术上、产品上的创新不仅可能改变消费需求, 改变市场竞争力量的对比, 还有可能改写和塑造新的行业标准, 创建新的游戏规则, 从而占据市场的主导权。在信息技术行业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 它揭示出应

对新经济的基本模式——主动出击，把握先机。通过发挥企业的创造力，在新的市场趋势到来之前提前做好技术、人员、知识方面的储备，从而能够跟随乃至引导市场潮流。

第二，从静态型管理走向动态型管理，树立速度观念和动态竞争观念。工业时代以及前工业时代的竞争法则是“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好”。而新经济时代的竞争法则是“把事情做得更快”，借用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说法，就是“第一重要的是做第一”。企业单有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活动还不够，还必须提高从创新概念形成到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推广的速度。创新、研发、营销各环节，信息搜寻、决策制定、执行反馈各过程的速度必须更快，才能够超越竞争对手，走在市场的前面。因此，新经济的管理将是动态的管理，是关于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的管理。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必须大力摒除传统管理习惯和毛病，如按部就班、谋定而后行、决策拖沓、沟通不畅、执行不力、反馈不及时等，树立快速行动、立即反馈的作风，才能够在新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与速度相关的另一个观念就是动态竞争观念，速度不仅意味着领先，更预示着变化和可能。为此企业必须随时对自己的竞争优势及其基础进行审计，同时对对手的竞争动向进行紧密追踪，对市场和竞争的动态发展进行预测和判断，不仅要致力于维持现有优势，更要强调主动出击，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通过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和更替来实现持续发展。

第三，从质量型管理走向价值型管理，通过个性化定制创造市场价值。在知识和信息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质量固然重要，但却不再是竞争制胜的唯一法宝，甚至可能不再是竞争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主权的日益加强，能否保证消费者权益和提高消费者价值成为竞争的焦点所在。而整个社会消费的主流，已从大众化消费阶段，经过一般的差异化阶段，开始走向个性化定制阶段。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波音的飞机制造，到Dell的电脑定制，以及国内彩电厂商为大型家电连锁销售企业定制彩电等事例，都反映出消费者已经开始直接参与产品的开发设计、监督产品的生产过程，并且要求在产品使用中得到优异的延伸服务。在新经

济时代，质量依然是重要的竞争因素，但只有合乎消费者需求的质量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对中国企业而言，传统的产品质量管理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必须通过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来加强。但是，质量管理只是一个方面，中国企业必须大力推行价值型管理，调查和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针对消费者的需要进行产品的研究开发和质量控制，针对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为客户提供量身定作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个性化定制创造和提高消费者价值，实现企业的发展。

第四，从直线型管理走向网络型管理，建立虚拟组织、战略联盟，实现资源互动整合。中国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形式通常都是直线型组织结构。但是新经济的环境以高度动态性和复杂性为主要特征，原有的直线型组织便不能够适应高速动态运转的需要。在新的动态竞争环境中，只有通过加强各部门的自主决策能力和多向迅捷沟通，建立网络型组织，打破传统直线型结构的等级秩序和刻板程序，迅速决策、迅速执行，才能抢得竞争先机。网络组织的特点是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形成信息和知识高速流动传递的网络，这种网络不以权力和等级为主导，而是以知识和信息为主导决策执行的依据。各网络结点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依存，通过信息、知识和其他资源的沟通共享来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信息技术设施的普遍建立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使虚拟组织应运而生，通过互联网络，企业可以组织网上开发、网上销售，而不需要投资建立庞大的办公和销售设施，不仅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加快了速度。新经济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战略联盟的大量涌现，通过建立战略联盟，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和竞争力互补，包括渠道互补、知识互补、信息互补、技术互补、品牌和形象互补等诸多收益，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格局。

第五，从资产型管理走向资源型管理，充分发挥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竞争力。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实力是通过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固定的或者有形的资产来衡量，例如土地、厂房、矿山、机器、设备、生产线等。但是在新经济时代，无形资源和无形资产，例如品牌形象、知识产权、专利、以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为代表的智

力资源成为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决定消费者价值的主要源泉。资源管理,特别是无形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将是新世纪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关键。然而,在这方面我国企业目前的管理却是非常薄弱的,不仅没有设立相应的部门和岗位,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观念和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六,从生意型管理走向事业型管理,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所谓生意型管理,其实质是一种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管理。生意型管理通常以单纯的收入和利润为目标,企业被视为实现个人目标——尤其是企业所有者或者企业控制者(管理者)个人目标的工具,在这种观念之下,企业是所有者或者控制者利益的代表,是经济的实体,而不是社会的实体。事业型管理的观念则正好与之相反。事业型管理视企业为大众利益的支持和提供者,是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者、员工、消费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的代表,或者说利益共同体。因此,企业经营运作过程实质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消费者提供价值、为股东赢得资产增值、为员工提供个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经济的,更具备丰富的社会含义。在新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生态环境、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等成为思想主流。企业要持续发展,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就必须为其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大的利益。同时,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才则是知识创造和应用的主体,能否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激发其创造潜力将成为知识竞争的关键。事业型管理的核心思想在于:企业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工具,而是劳动实现其价值的条件。企业经营是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多方共同的事业,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来保障员工的积极性,树立事业理想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热情,以此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

### 三、实现双重跨越的文化支持

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存在的随时间演变的共有价值体系,包括价值观、信条及实践的体系或模式,是企业核心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体系以及管理运作历史与现状的综合体。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

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动态的对立统一关系。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既遵循企业文化的指导,反过来又对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强有力的巩固和加强作用。按照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企业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企业文化的影响和支配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知识的发展和进化则与人自身的认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深层次内容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管理变革必须从企业文化变革开始,适合新经济新世纪的中国企业管理变革,首先要形成适合新经济新世纪竞争特点的企业文化,才能实现双重跨越,保证管理变革的顺利进行。与这种要求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应具备如下特质。

第一,推崇知识。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源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显性知识资源和隐性知识资源。在知识管理理论中更重要的一个观点是,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有价值、更完善。如果说,显性知识是“冰山的尖端”,那么隐性知识就是隐藏的冰山的底部。由于企业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企业的员工头脑中(如经验、技术诀窍)或者员工之间(即组织知识,某些默契形态的制度和规则,以及意会型的方法),要有效应用这些知识,必然取决于员工个人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知识本身的发生机制具有创新性、共享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并与人的价值观念、思考和行为方式、主动创造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型的企业文化推崇知识的价值,强调知识创新、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等行为,鼓励员工一起学习,协同支持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得企业内部具备通畅的知识共享和知识交流的途径,使企业员工能够有效获取知识,并且通过交流和共享创造和应用知识,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第二,速度制胜。新经济环境充满着变化,“一个公司的成败在于其适应变化的能力。”传统竞争因素诸如质量成本等重要性在不断减弱,而新的竞争要素——时间和速度越来越占据重要和关键的地位。在新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已没有决策大小的问题,只有速度快慢的问题。因此,快速反馈,迅



速行动将成为新经济文化的基本行为规范。

第三, 创新为本。在信息化、知识化背景下, 在日益加强的全球竞争背景下, 创新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不断得到一些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强化, 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在剧烈变动的时代, 延续性逻辑下的竞争哲学通常会失败, 或者难以成功。真正的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传统游戏规则, 敢于大胆创新, 不畏风险, 敢于改变和创造游戏规则, 建立新的运作标准, 在思想模式上能迅速改变的人。未来是不确定的, 当我们习惯于用工业文明, 用过去的确定性眼光去对付未来的新经济的不确定性时, 我们就会屡屡踏空和失败。在信息和知识文明中: “明天意味着一切改变”。要把握未来, 就必须创造未来。通过预测、判断、创新去确定未来。因此, 创新是新经济企业文化的活的灵魂和根本。

第四, 虚拟互联。虚拟是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典型表现, 是与信息、知识及其相关基础设施条件飞速发展的结果。企业经营虚拟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利用现代先进的信息互联技术手段,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势资源, 包括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无形资源以及生产、制造设施等有形资源; 其二, 虚拟意味着企业之间可以形成更灵活的互动联合体系, 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的优势资源, 并与其他企业形成战略资源的互补整合。例如研究开发型企业只需要保持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研发设计能力, 而不必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资源耗费在低价值产出和常规的普通工业生产制造中。由此可见, 虚拟互联文化的要旨在于灵活、柔性、合作、共享。虚拟的另一个特点是价值实现过程的虚拟性, 是创造消费、“购买消费”。传统的消费概念已经过时, 消费的手段和过程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消费理念——发现、创造消费并从有限消费转为无限消费, 成为虚拟经营的重要内容。

第五, 持续学习。崇尚知识将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只有通过整个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学习速度和学习意愿的培养, 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业资源和市场, 才能应对新经济新世纪的挑战。学习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和应用只有学习才能够完成, 创新和创造始于学习, 环境适应依赖于学习, 应变能力

来自学习, 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新经济的学习观念, 不仅包括个体学习观念, 更强调群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观念, 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 极大地提高学习的效率和速度。因而企业不是一个终身雇用的组织, 而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 是一个“共同学习的组织”。持续学习成为企业及其员工的日常运作惯例。

第六, 融合发展。经济全球化导致竞争的内涵发生变化, 资源共享与联合发展成为竞争制胜的重要手段。竞争中的合作使企业必须不断融合多元文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文化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让身处这个时代的企业成为跨文化的社会群体组织。通过全球化实现各种稀缺要素的互补联合, 通过全球合作实现越来越大的战略联盟体, 从而形成信息、知识、人才和其他稀缺资源的优势结合体, 这就是融合发展的目的所在。实际上, 企业融合文化应当是多元文化、合作文化和共享文化和双赢竞争文化的综合。

#### 参考文献:

- [美] 保罗·S·麦耶罗主编, 蒋惠工等译: 《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 珠海出版社, 1998年。
- 陶德言编著: 《知识经济浪潮》,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8年。
- 陈胜昌主编《知识经济专家谈》,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年。
- [美] Verna Allee 著, 刘民慧译: 《知识的进化》, 珠海出版社, 1997年。
- 申明: 《知识资本运营论》, 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8年。
- [美] 查尔斯·M·萨维奇著, 谢强华译: 《第5代管理》, 珠海出版社, 1998年。
- [美] 达尔·尼夫著, 樊春良、冷民译: 《知识经济》, 珠海出版社, 1998年。
- 薛志成: 《知识管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 《企业改革与管理》1998年4月。
- 《商业新世界中的“知识管理”》, 《计算机世界·IT经理世界》1998年3月。
- 秦朔: 《革命年代——美国企管思维创新10大变化》, 《销售与市场》2001年第12期(上)。
- 李宝山、王建军: 《新世纪企业管理的六M法则》,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 其他: 知识管理网: <http://www.chinakm.com/mpapers/kmssm/index.htm>
- 企业文化网: <http://www.7158.com.cn>
- 责任编辑: 黄振荣

#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述评

储小平<sup>1</sup> 李 桦<sup>2</sup>

( 1. 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 广东 汕头 515063)  
2. 汕头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摘 要] 中小企业集群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产业组织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本文对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组织 社会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2002) 05- 0060- 04

在中国经济 20 年持续增长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在一些城镇,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区域, 小企业甚至支撑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江山。很多地区的中小企业并不是离散地、相互孤立地发展的, 而是相互依赖、相互簇拥紧密抱团, 构成一个个专业特色鲜明的小企业集群。因此, 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产业组织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形式——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 一、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

学者们对中小企业集群概念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在各自的定义中, 其内涵、着眼点都有一定的差距。最早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马歇尔(1890), 他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小企业的集聚从而形成小企业集群。而胡佛(1975)将小企业集群看作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我国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深入首推江浙的学者, 他们在经济学的基础上, 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有代表性的是仇保兴(1999)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 1. 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 2. 在这一特定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现象, 其

协作即为集群中企业间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 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 3. 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的交换(exchange)与适应(adaption); 4. 交换行为的功能是为了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尽快积累, 而适应则是为了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和环境的不确定性; 5. 集群中存在企业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 6. 中小企业间所形成的长期关系无须用契约来维持, 而以“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来维持集群的运行, 并使其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 拥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 二、对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原因的分析

在西方国家,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与完善, 一些经济管理学家从各个角度对企业集群形成这一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进行了一些研究。

如上所述, 马歇尔最早运用“外部经济”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马歇尔认为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经济, 对于单个厂商来说, 虽然是外部经济, 但是, 对于某一个产业或某个产业集团来说, 则都是内部经济。这种情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适用的, 因为把全部具有相同性质的中小企业集合起来(即马歇尔所说的

“工业区”)，并且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和分工，就实现了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在这里，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包括企业集群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严格地说，他讲的是“小企业集群”(工业区)。作为一种企业群落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是“小企业集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分析产业生产成本时引入的，是立足于产业角度的分析。他通过“外部经济”对中小企业集群的讨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区域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企业集群。

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在波特看来，企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及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它产业的企业。此外，还包括政府或非政府机构。

波特等西方学者的见解富有启发性，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集群，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小企业集群的背景是不相同的。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状态中，并且由于传统社会以及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又要特别重视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台湾学者非常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台湾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之间紧密的产业网络关系是台湾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陈慧娟、吴秉恩，2000)。将台湾学者的探讨概括起来大致有两大途径。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所做的探讨，其二则是依据经济学的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前者认为中小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王如玉、曾淑婉，1992)，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是需要依靠企业主

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建立，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维持网络安定的主要力量；由同家庭、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网络内的运作次序(陈介玄，1994)。从经济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则认为企业会为降低交易成本、依赖稀有资源、交换彼此资源、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等等原因形成网络关系(吴思华，1992)；而网络内的成员之间则从事生产、销售、研发甚至财务等方面的分工(司徒达贤，1992)，透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从内地学者研究的现状来看，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与广东一带，特别是在江浙地区。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在江浙的迅速发展，江浙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从区域经济(方民生，1997；张仁寿，1999)、非正式制度(李永刚、祝青，2000)、制度变迁(朱康对，1999)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也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2000；吴国林，2001)。网络与企业集群是不同的但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领袖型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实力雄厚，规模大，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本人具有远见卓识，有高超的经营能力，信用卓著，有崇高的声望，在当地商界有号召力，能真正以自己的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大批相关企业共同发展，能合理地分配核心企业与协作企业之间的利益(储小平，2001)。另一些学者提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仇保兴，1999；朱康对，1999；李永刚、祝青，2000)，这也是颇有新意的研究思路。其观点主要有：第一，历史上民间的商业传统；第二，古典心态和东方式的人文环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使得相互依存的小企业集群得以迅速形成(李永刚、祝青，2000)。第三，体制漏洞和政府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由于一些地区(如温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

条件并不好,所以当时许多政策的约束力到此就有所减弱(朱康对,1999),使得边际制度创新有了可能;同时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妥协、默许甚至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朱康对,1999;陆立军、白小虎,2000),这样使得浙江的小企业集群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地理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建立起来。第四,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使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种专业产品(陆立军、白小虎,2000;李新春,2001)。

### 三、中小企业集群的基本分类

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基本分类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具有高度的离散性和易变等特点,所以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分类繁多。特别是由于学者们强调的重点、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因而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分类也各有特点。

仇保兴(1999)认为按照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来分,其形式主要有: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

李永刚、祝青(2000)认为浙江众多小企业群落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生产性小企业群落或商贸性小企业群落,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小企业群落,都是由这两个子群落共同构成的。

陈雪梅、赵珂(2001)在对中小企业形成的内部与外部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有: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由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等原因。

李新春教授(2001)根据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将企业集群描绘为三种形式: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

企业集群的不同类型反映着企业间连接方式的差异,受专用性关系资源,特别是企业家的体制资

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李路路,1998;石秀印,1998)。其中反映出企业主对降低交易成本、回避市场风险的努力以及领袖主宰欲的满足。

### 四、中小企业集群的演变特征

在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微观的结构演变特征的分析中,除了相对集中的企业地理空间分布、企业集群的组织化、动态化等基本特征外,比较重要还有以下几点:

浙江中小企业集群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多种企业集群形式共存。它的专业性分工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演进深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同专业市场(例如义乌的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柯桥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或者其他类型的市场(如义乌的联托运市场、房地产市场)共生(陈红儿、陈琪,1999;李永刚、陈寿灿,2000;李永刚、祝青,2000)。

在从专业镇的角度来分析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中,吴国林(2001)认为,广东目前的专业镇经济虽然已经从“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开始创业,逐步形成规模;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但是仍然主要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占领市场。李新春也认为专业镇的产品常常选择(有意或无意地)一些“日不落”产品,如服装、制鞋、家具等。

在集群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集群类型向另一种集群类型的更替。如果对它进行简单的分类,产业集群的更替可以有两种模式: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集群趋向退化、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非法经营活动都有此过程。所谓正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产业集群不断从原来的初级产业集群向更高级的产业

群落演进的过程。产业群落的正向更替是产业素质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不断优化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产业群落的不断演进,一些地区(如温州)产业群落内部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化方向发展。可见,随着产业集群的扩散,各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集群的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由于进入或退出集群的障碍较小,集群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也正如此,集群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此外,各企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以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性,这也使得集群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可塑即动态化的特点(朱华晟,2000)。

#### 参考文献:

- 李新春:《企业联盟与网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新春:《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 张仁寿:《依靠民间与市场力量推动的城镇化:温州的经验》,《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期。
- 李永刚、祝青:《浙江小企业群落式发展初探》,《财经论丛》2000年9月。
- 陆立军、白小虎:《从“鸡毛换糖”到企业集群》,《财贸经济》2000年第11期。
- 冯德连、王蕾:《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演变与启示》,《财贸研究》2000年第5期。
- 张仁寿:《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 李新春:《企业战略网络的生成发展与市场转型》,《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林汉川、魏中奇:《中小企业的界定与评价》,《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7期。
- 胡小平:《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 李新春:《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
- 王如玉:《从网路结构观点看制造业中的依赖关系——以运动鞋业及放电加工机的个案为例》,中原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
- 司徒达贤:《台湾中小企业发展之经验策略》,台北:第一届中小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1993年。
- 吴思华:《产业网路与产业经理机制之探讨》,台北:第一届产业管理研讨会,1992年。
- 陈介玄:《协力网路与时候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
- 陈慧娟、吴秉恩:《台湾中小企业动态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关系之研究》,《中山管理评论》2000年冬季号。
- 陈雪梅、赵珂:《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暨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 储小平:《粤东区域发展的战略思考》,《南方经济》2001年第4期。
- 陈红儿、陈琪:《中国小商品市场体系的培育及其经济效应》,《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
-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2000年。
- 《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郑红军

# 简析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环境障碍<sup>\*</sup>

叶 勤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有效利用外资购并、重组和改造中国企业, 是中国政府 2000 年以来重要的政策取向。本文分析了目前阻碍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环境因素, 包括制度障碍、认识障碍、交易障碍和体制障碍, 并指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环境障碍的消除, 最终有赖于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和不断的改革开放。

[关键词] 外资并购 直接投资 环境障碍

[中图分类号] F830.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64-03

2000 年以来, 我国政府提出将跨国并购作为引进外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新途径。<sup>①</sup>利用外资并购扩大利用外资的数量, 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引导, 还需要着力培育促进外资并购的市场环境, 消除阻碍外资并购的环境障碍。相对于国内并购, 一些特殊的环境因素阻碍跨国并购的进行。桑德斯那姆 (1997) 将跨国并购的障碍归纳为四个方面: 结构性障碍; 技术性障碍; 信息障碍; 文化传统障碍。与此不同, 由于中国较低的市场化水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性和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性,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环境障碍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制度障碍、认识障碍、交易障碍和体制障碍。本文试图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实证性分析。

## 一、来自制度方面的障碍

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的考虑, 中国从 1978 年对外开放以来一直对经常项目下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的管制, 对外商投资的行业、出资比例、经营期限和股权变更等投资事项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有效地保证了政府对于外商投资的监管和引导, 对于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中一些规定却在客观上不利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发展。

### 1. 审批制度。中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设立一

直实行政府逐项审批制度, 涉及的部门包括政府计划部门、技术改造管理部门、外经贸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 历经四个环节。据一项对上海市外商投资审批制度的研究报告, 上海市共有 195 项国家法律规定的审批项目或程序, 其中 102 项与外资企业前置审批有关, 外商投资审批的繁琐由此可见一斑。<sup>②</sup>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 外资并购也面临繁琐的审批过程, 按照外经贸部 1997 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 对于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新设并购、增资控股、参股和因其他原因造成股权变动(如破产、股权质押等), 除正常的报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外, 还需要报送原来审批机关重新审批; 其中涉及到国有股权的转让, 则必须经国有资产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并报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这就使外资并购不仅需要长时间的谈判, 而且还需大量的时间等待审批。繁琐的审批无疑降低了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效率和积极性。

2. 资产评估制度。中国企业的股权或者资产转让,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1992 年) 规定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和清算价格法等进行价值评估。但是基于对资产状况的判断差异, 中外双方在会计

<sup>\*</sup> 本文是毛蕴诗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研究的一部分。



处理方法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差异,其评估的结果也相差很大。中国的资产评估制度同国际通用的资产评估方法存在差异,增加了双方谈判的难度。目标企业商誉的评估和在企业资产转让中的估价尚无具体规定,这不仅使外资在并购中待机低价收购民族品牌,也增加了双方对于商誉转让的谈判成本。

## 二、来自认识方面的障碍

并购是企业扩张的一种正常途径,但是外资并购涉及股权在不同国家企业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因此常常引起政府、学术界对于外资并购与保护民族工业、政治制度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此外,中国文化传统对并购的态度、参与并购的中外双方对并购目标的认识差异也构成了外资并购的认识障碍。

1. 社会观念障碍。在中国,并购往往同亏损企业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企业只有无法经营才考虑作为目标公司被其他企业收购、兼并,而企业被收购、兼并通常被看作是企业经营失败的象征。这就构成了外资并购的社会观念差异。事实上,并购与被并购都是企业发展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企业经营成功与失败的象征。在国际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部分跨国并购是“强强联合”的互补式并购。我以为,如果在观念上就将外资并购同中国亏损企业扭亏脱困联系起来,无助于推动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2. 对企业控股权的认识障碍。中国企业总是希望获得企业控股权,以实施对企业的完全控制。尤其是在同外方进行合资谈判中,虽然中方企业并不具有资金、人才、管理和技术优势,但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利益、企业利益和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又常常不肯放弃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权,并认为失去控股权就是失去企业。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控股权更多地为具有企业优势的股东掌握,而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大股东甚至会主动转让企业的控股权,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外双方对“控股权”认识上的差异,增加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难度。

3. 对并购实现目标的认识差异。中外双方对于并购的目标和期望不同,也阻碍了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活动。这可以参照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合作目标体系上的偏差,说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与作为被并购的中国企业之间存在的目标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表1 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合作目标体系上的偏好差异

|      | 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目标偏好   |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目标偏好     |
|------|------------------|-----------------------|
| 投资选择 | 1. 启动落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 1. 选择优良投资环境确保投资安全和效益  |
|      | 2. 解救亏损老企业       | 2. 增强生产链中的配套生产能力      |
|      | 3. 成长产业由东道国控股    | 3. 战略安排决定控股投资         |
| 技术路线 | 1. 引进高新技术填补空白    | 1. 控制技术扩散,保持比较优势      |
|      | 2. 以市场份额换技术      | 2. 以投资跨越市场壁垒          |
|      | 3. 引进研究开发中心      | 3. 建立全球生产加工基地         |
| 市场定位 | 1. 产品大部分出口       | 1. 全球战略决定产品销售方向       |
|      | 2. 保护性出口         | 2. 投资带动母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
| 经营管理 | 1. 利润增长扩大税收      | 1. 生产基地是成本控制中心,收益总部控制 |
|      | 2. 解决就业问题        | 2. 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成本     |

资料来源:王洛林主编《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的目标偏好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目标偏好存在较大差异。并购是实现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以上目标偏好的差异也较好地反映了外资与被并购的中国企业之间存在的认识差异。

## 三、交易障碍

交易障碍主要体现在外资并购的交易过程之中。外资并购是一种产权交易行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有完善的产权交易平台、中介机构,为并购企业提供目标企业的搜寻、资产评估、法律文书和金融服务,使交易能有效地完成,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中国目前还缺乏有效的产权交易平台和中介机构,构成了外资并购的交易障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产权交易平台的建设还不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1990年底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到2001年底已经有1200多家公司成功地在两个市场挂牌交易,为企业的产权转让提供了交易平台。但是由于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大多是由地方政府一手操办完成,很少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因此,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完成的

企业并购的数量还比较少。不完善的交易平台和有限的挂牌交易目标公司,使大部分的外资并购通过企业之间直接接触完成,增加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目标搜寻和交易的成本。

2. 熟悉外资并购业务的中介机构欠缺。外资并购是一种比国内并购更加复杂的企业活动,对投资银行、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 90% 以上的企业并购是通过投资银行完成。目前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少数综合性证券公司手里,而这些证券公司大多只从事上市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没有涉足非上市公司的外资并购业务。其自身的不足也限制了对外资并购中介服务的开展,由于长期只从事国内并购,对于外资并购的需求、目标、动因等缺乏了解,对于外资所在国家的并购法律、税收制度、会计制度等也缺乏认识,难以满足外资并购财务顾问的要求。同时,在提供金融服务,例如过渡贷款(bridge loan)、股份回购、举债收购、换股收购等金融工具的利用上,也因为政策因素或自身技术原因难以提供。这不仅阻碍了中国投资银行业的国际化 and 参与国际竞争,也增加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交易难度。此外,中国国内绝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缺乏既懂国内会计制度,又精通国际会计准则和英语的国际性会计专业人才,难于为外资并购提供专业服务。

3. 并购中可利用的金融交易工具单一。并购公司有多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方式:现金收购、换股收购、现金换股结合收购。并购公司还可以通过定向地向目标公司股东发行新股、可转股公司债券或可选择公司债券等金融创新工具,收购目标公司。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外国资本的直接投入,因此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时一般采取现金收购的支付方式。对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只能采用现金收购的方式。对外资并购单一支付手段的限制,也形成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障碍。不完善的交易平台和不成熟的中介机构,封闭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单一,形成了外资并购的交易障碍。

#### 四、来自体制方面的障碍

1993 年中国开始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改革的目标,积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要素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企业制度、金融体制、农业体制、对外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但是同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制约了外资并购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企业人事体制方面的差异。目前,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谈判中,除了交易价格外,关于员工安置、原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安排的谈判最为困难。由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大多通过协议并购的方式完成,参加谈判的主要包括主管地方政府的官员、原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从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看,除了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外,还希望并购后能够尽量少地解雇员工,保持地方就业水平,减少政府安置下岗职工的负担;而事实上的经理人员“终生雇用制”和不完善、不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又使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理性目标”和“理性选择”就是保持自己在企业的“位置”。而外资并购是一种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一般伴随着技术升级改造、产品更新换代和管理制度的调整,而这些调整的焦点还是对于目标公司原有人员的调整。因此在外资并购的过程中,政府的社会就业目标和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目标,使得外资并购的谈判成本、并购成本和并购后重整成本大大增加。

2. 社会保障体制方面。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也阻碍了外资并购的发展。一些长期亏损企业无力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到 2001 年 6 月,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仅有 1.02 亿人,而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 年)统计,仅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就达 3.52 亿人,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远远低于社会实际就业人数。这就造成在外资并购的谈判中,外方往往被要求为原企业的解雇员工“一次性买断工龄”,支付退休、下岗员工的“赔偿金”或“遣散费”等。这就使外资并购需要支付额外的并购成本,阻碍了谈判的进行。

#### 五、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推动外资并购的发展(下转第 92 页)

# 后动企业竞争优势的四个来源分析

陈遯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给出后动企业及其特点基础上, 本文重点考察后动企业竞争优势的四个来源: 一是从先驱企业的错误中学习, 进而获得差别化和成本优势; 一是可以通过“搭便车”, 降低产品价格, 获得成本优势; 一是可以通过创新, 改变游戏规则, 获得竞争优势; 一是在市场格局发生变化时, 有可能获得市场新优势。

[关键词] 先驱企业 后动企业 竞争优势 来源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67-03

相对于首先向市场推出“领先性”产品或服务的先驱企业而言, 后动企业是指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市场的企业。一般认为后动企业由于在先驱企业之后进入某一产品或服务市场, 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Von Hippel(1984)认为, 先驱企业在首先推出产品或服务之后会利用该市场没有其他竞争者的条件(此时先驱企业实际上是垄断者), 赚取超额利润和增加市场总的规模。如果该市场的容量很小, 则后进入的企业几乎没有机会; 如果该市场的最小规模经济很大, 则后进入者面临很大的进入成本, 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后动企业进入市场时, 先驱企业可能已经建立了市场位置和学习曲线经济, 在消费者中建立领先者商誉, 这使得后动企业可以获得的市场份额较小, 边际利润较低。同时, 先驱企业可以利用首先进入市场的机会, 先占稀缺资源, 如与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商签定长期的独家供应合同, 使得后动企业有可能得不到合适的生产资源。先驱企业首先推出产品或服务之后, 可以以此建立行业技术的标准, 并且有可能在消费者中建立“这就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印象”, 即使它的产品成本较高, 质量较差。从而成为判断所有后来产品的“原型”, 这样后动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不得不采取“跟随”先驱企业的战略, 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企业应该尽量成为先驱。

然而, 对于许多公司来说, 什么时候进入也许不是战略的选择, 而是, 在他们的竞争动态下, 后进入也许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即当公司准备进入筑了壕沟的大公司成功的市场时, 早进入在一开始就被阻止了。在国际市场的情况下, 不发达的国内市场, 当地环境的落后科学知识不发达或不存在相关产业, 以及本国其他的环境因素常常限制了某些国家勤奋的公司首先进入世界市场。

但是, 后进入并不等于失败。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国际上, IBM不是首先推出个人电脑的企业, 但现在估计谁也不会否认IBM执行业之牛耳。日本的JVC公司在SONY公司之后很多年才推出VHS录像机, 但现在VHS模式成为录像机行业的标准。在国内, 海尔电器在家电业是比较晚推出的一个品牌, 现在从美国的yahoo网站上唯一能检索到的国内家电厂家是海尔, 而现在有谁还会记得中国最早的家电企业呢?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谁能在竞争中成功, 先驱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但是成功仅仅靠先驱是不行的, 成功还需要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作为后动企业完全可以在竞争中, 尽量避免劣势, 建立成本和差别化优势, 从而在竞争中打败先驱企业, 毕竟胜利是看谁笑到最后。

一、后动企业可以从先驱企业的错误中

学习,进而获得差别化和成本优势

先驱企业在推出产品或服务时,由于是市场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产品或服务,到底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功能,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消费者不太清楚,而企业也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猜想来进行研制,这样不可避免地有时候会出现消费者所需要的功能没有提供,而提供的又是消费者所不需要的,或者是产品或服务的定位错误。而后进入者在等待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可以对市场上消费者的反应进行分析,对产品进行改进,重新定位,因而超过先驱者,甚至有可能完全取代先驱者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Lieberman 和 Montgomery(1988)认为可以从先驱者的错误中学习,获得成本和差别化优势,这种成本的节约有可能达到1000万至1500万美元。

California Cooler公司首先向市场推出葡萄酒冷却器,这种产品非常成功,特别受到不喜欢喝啤酒的妇女的欢迎。但California Cooler犯了一个错,他们没有认识到葡萄酒具有很强的女性导向,情趣非常重要。而Callo公司看到了,进入市场推出Bartles & Jaymes,而这种产品更具有情趣,再加上有效的广告,终于把California Cooler完全从市场上清除出去。

同样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SONY公司首先向市场推出Betamax,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它使得用户可以在忙碌时录制下喜欢的节目,然后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再欣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Betamax有一个缺陷,就是Betamax只能录制1个小时的节目,而很多节目如电影节目的长度往往超过1小时,这样用户在录制的过程中必须更换新的录像带。发现了Betamax的这个缺陷,紧跟SONY之后,日本的JVC公司向市场推出家用视频系统(VHS),可以连续录制2个小时的节目。之后JVC和松下公司,以及其他的消费电子公司,在产品设计时都采用VHS制式,这使得VHS在竞争中更具优势,并成为产品技术标准。最后,SONY公司也不得不采用VHS制式。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赢得消费者。

二、后动企业可以通过“搭便车”,降低产品成本,获得成本优势

先驱企业常发生大量的开拓市场成本,如由于

消费者对新产品或服务没有任何经验,先驱企业必须花大量的人力和金钱来做宣传,教育消费者如何使用新产品和服务发生的费用,向有关部门提出新产品申请并获得批准(这在新药品推出时最明显)过程中的支出,培养生产要素供应者的费用,以及建立训练和服务中间商和购买者的基础设施的成本。而后动企业在先驱企业之后进入市场,由于消费者对这类产品已经比较熟悉等等,后动企业可以以比较少的成本进入市场,也即后动企业可以“搭便车”,有关研究者经研究认为跟随者的绝对市场费用和R&D支出较低,模仿的成本大约是创新成本的65%,而后动企业的赢利率有可能比先驱者更高。

聪明的快速跟进者让先驱企业教育消费者关于新产品的好处——任何产品推出时的巨大的任务。而让先驱企业花时间和金钱教育消费者意味着你可以真正地集中精力于区别你自己的策略。松下公司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战略。SONY公司一直在R&D上具有优势,而松下公司在营销和生产方面具有优势,几乎在所有的产品上面,SONY公司都是首先推出,然后在1至2年之内,当消费者对新产品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已经知道该产品的用途等之后,松下公司利用自己在生产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大规模生产,进行大规模广告推销,从而赚取大量利润。

新产品的推出,在正式向市场推出之前,有的产品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特别是涉及到食品、医药方面,而这有可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以及时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对新药的推出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的新药推出之前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审查,而作为后动企业,在先驱企业推出新药之后,推出类似功能药的时候,就可以节省时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三、后动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改变游戏规则,获得竞争优势

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游戏规则,先驱企业可以在市场占据一个稳定的地位。后动企业作为后进入市场的企业,如果模仿先驱企业,采取“我也是”的战略,则往往会陷入被动的地位,最后有可能走向企业的衰亡,很多企业的实际案例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理想的竞争环境是没有竞争。后动企业可以制定并执行一个和先驱者完全截然不同的战略,也就是改变该市场上的游戏规则,使得公司在所处行业中能够起到控制和施加影响的作用,从而站稳市场,并把先驱企业驱逐出市场。

如汽车市场,20世纪初,汽车是富有人人的奢侈品,普通的民众是根本不可能买得起的。此时,亨利·福特决定为普通大众生产汽车,这种汽车大得足以装下全家,小得只要一个人驾驶和修理。他将以最低的价格、最实用的样式、最好的质量,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于是,他加紧研制,最终于1908年10月1日,正式向美国市场推出物美价廉的T型车,受到大众空前的欢迎。而此时,由于1907年的金融恐慌,那些目标为富人生产汽车的生产商已经都纷纷倒闭了。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确实是汽车史上的一个奇迹,到1914年,T型车的年产量是260720辆。大批量的生产,使福特汽车公司并没有因为实行低价销售而受到任何损失。1912年,T型车的售价已经下调到了每辆车575美元,比美国人的年均收入还低,单辆车的利润也已经由1909年的220美元,下降到1914年的99美元,而市场占有率却由10%扩大到了近50%,推动利润总额由300万美元上升到了2500万美元。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市场上,主流汽车是美国三大汽车商生产的大型汽车,这种汽车车型宽大,但是耗油多。而由于日本国土狭窄以及资源的短缺,汽车市场上的汽车是那种车型较小、省油汽车。日本厂商向美国市场推出这种省油小型的汽车,也就是改变了原来美国市场上那种大型车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结果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厂商推出的汽车在原来被认为是大型车天下的美国市场上大行其道,迫使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生产小型节油性汽车,这几年更是逐渐进入小型汽车的生产,如福特汽车公司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扩展生产线。

四、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时,后动企业有可能获得优势

市场不是静止的,而且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方向不能完全预测。引人注目的是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可

以瓦解竞争的状况。先驱企业常常形成这样的感觉:“我们是最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没人能告诉我们怎样做的更好”。这很容易形成某种惰性,因而停止倾听消费者的呼声。而如果后动企业愿意并且能够倾听消费者的需求,并迅速作出反应,后动企业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

另一个变化是技术变化。技术的变化可以为后动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机会,特别是当新技术使得现有企业的技术过时或摧毁现有企业的竞争力时。后动企业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竞争力也许可以建立新的行业标准,掩盖先驱企业。这方面很有名的例子是钢铁行业的变化。钢铁行业最显著的技术进步是基础氧化炉的使用、连铸技术和用电弧炉加工废金属技术的使用。1950年,奥地利的林兹——多纳维兹公司把基础氧化炉技术投入商业运用,代替了开放炉工艺,从而用最短的时间把铁变成粗钢。连铸技术由德国的罗恩沃克公司于60年代加以完善。而电弧炉技术在70年代成为生产非合金钢的可行方式。由于这些技术的出现、完善,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以及后来的巴西和韩国,新建的钢铁公司毫不犹豫地采用基础氧化炉和连铸技术;相反在美国已建的钢铁公司在旧的技术上已经做了无可挽回的大量投资,包括在实物资本和生产技能方面,因此这些公司不愿采用新技术。到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现在美国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总之,毫无疑问,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较晚,后动企业相对于先驱企业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但是后动企业可以通过从先驱企业的错误中学习,充分享受“搭便车”效应,以及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把先驱企业排除在竞争之外,获得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市场,后动企业可以密切注视市场的变化,及时有效地回应市场的这种变化,最终把先驱企业远远地甩在后面。

#### 参考文献:

Kerin, Roger A, Varadarajan, P. Rajan, First-mover Advantage: A synthesi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 *Marketing Research*, Oct 1992, Vol. 56, Issue 4.

迈克尔·E·波特:《竞争优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下转第79页)

#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

## ——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肖 滨

(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 儒家传统 现代民主 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70-06

当代著名政治学家 S·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论及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时, 曾这样写道: “儒家民主也许是一种矛盾的说法, 但是, 儒家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问题是: 儒家思想中的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呢?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这些因素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取代这些文化传统中的非民主成分呢?”<sup>①</sup>显然, 尽管亨廷顿对“儒家民主”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但他并不否认儒家传统社会中出现民主的可能性, 甚至也不怀疑儒家传统中存在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实际上, 他真正关心、也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是: 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 儒家传统中的哪些精神资源, 借助何种媒介或途径, 可以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 成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文化支援力量?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亨廷顿问题”, 本文即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回应与解答。

### 一、确立制度环境

在上述问题中, 亨廷顿强调要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 儒家传统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可以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 即使儒家传统中存在着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或资源, 其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环境条件。那么, 这种环境条件究竟是什么?

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 这种环境条件首先是市场经济。通过对东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观察, 学者们发现, 在包括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中, 由于在实践中插入了市场经济, 儒家传统与民主政治已处于或者正趋向于对接、兼容状态。由此, 他们认为, “儒家传统或许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物与民主实现对接。这一中介物必须是在新加坡和另外三小龙中共同存在的。……这个中介物即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建立或继承下来的市场经济(故又称自由经济)。在日本, 儒教(还有当地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三者已完全对接, 运作也较成功(尤其在经济方面)。在新加坡、台湾和韩国, 儒教与市场秩序已衔接, 现正处于衔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进程。不难看出, 这条路线的走向是三点一线: 儒家传统(作为固有传统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中介与基本目标)——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目标), 而不是绕开市场经济, 直接拿儒教去嫁接或对抗民主政治。”<sup>②</sup>上述“三点一线”论, 作为对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经验观察而来的理论概括, 可能还有待于实践与事实的进一步检验; 但从探讨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来看, 它强调不能绕开市场经济, 必须把市场经济作为连接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



的制度环境,这不仅具有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而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因为,一方面,现代民主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现代民主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生长才能获得坚实的土壤、深厚的根基。因而,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要在民主政治中起到某种支援、辅助的功能,根本性的制度条件之一是在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之间插入市场经济,这也就是上述“三点一线”论的要义所在。另一方面,只有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民主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得到逐步的生长、发育,这一并非完满无缺的现代政治运作机制,才需要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支援和辅助,同时,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源、道德精神对现代民主可能具有的正面功能、作用,才有现实的作用对象。因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如果根本缺乏市场经济秩序,现代民主难以得到生长、发育,那么,即便儒家思想传统中蕴涵着某种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资源要素,这些资源要素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和作用对象。

不过,除了市场经济以外,儒家传统有可能支援现代民主所需要的另一制度环境是法治框架。这不仅因为构成现代民主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身是法治之下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是(宪)法(主)治之下的民主,亦即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意味着即使用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其权力也要受到宪政制度的限制、约束。因为民主只解决了谁来行使公共权力的问题:由于人人行使公共权力绝无可能,现代民主对此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一套制度安排,比如大众参与,公民投票等。然而,不论谁来行使公共权力,都有一个如何限制公共权力的问题,而宪政恰恰是在(宪)法(主)治之下,通过建立政府权力的内部制衡结构和外部约束边界而形成的一套限制权力的制度安排。在此意义上,法治、宪政框架本身就是现代民主的制度前提。因而,正如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来分析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的关系一样,同样也不能离开法治、宪政这些制度环境来讨论儒家传统如何成为支援、辅助现代民主运作的文化资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儒家传统要成为支援现代民主的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必

须首先确立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市场经济秩序、法治宪政框架。因而,不能把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进行直接对接,而需要通过四点一线——儒家传统、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现代民主来发挥儒家传统对现代民主运作的支援、辅助功能。换言之,也只有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的制度环境之下,才谈得上儒家传统中的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如何取代其非民主的成分以及如何成为一种有利于现代民主的文化资源的问题。<sup>③</sup>

## 二、设置领域边界

其实,儒家传统要成为现代民主的文化支援力量,不仅需要确立一个包括市场经济、法治框架的制度环境,而且必须设置一个思想前提条件,即对其道德理想主义进行限定,使之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包括政治生活中的个体即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国家,定位于“私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sup>④</sup>用儒家的术语来说,即是把其道德理想主义限定于“内圣”或“修己”的范围,而不是扩展至“外王”或“治人”的领域,即不从“修身”、“齐家”贯通至“治国”、“平天下”。

对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现代功能的发挥来说,这一领域边界的限定既有理论的必要性,也有历史的可能性:

就理论的必要性而言,现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要求把“内圣”与“外王”、“修己”与“治人”切分为两橛而不是贯通于一体:前者是个体进行道德价值自由选择的空间,是道德理想主义安营扎寨的领地;后者是公共规则规范与公共权威运作的范围,是政治法律技术操作的天下。前者(内圣、修己)不能越位进入后者(外王、治人),即不能由内圣而外王,由修己而治人,否则,以“圣王”面目出现的统治者将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名义实行道德专制,即“以理杀人”;同样,后者不能跨界进入前者,即由“外王”、“治人”的领域侵入“内圣”、“修己”的空间,否则,将剥夺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形成极权主义的控制。总之,只有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包括政治生活中的个体即政治人),限定于“私人领域”,它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从历史的可能性来看,随着支撑儒学一统天下的社会历史条件(如自然经济、宗法制度、皇权专制等)的消失,儒家思想原则已不可能全面支配、安排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典章制度的所有领域,即儒学已不可能重新“建制化”。这样,儒学就不得不开始其撤退和收缩的历史进程。如果把余英时先生所描述的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基调的转换即放弃“得君行道”的旧途,转而向社会和个人生命方面去开辟空间看作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预演,<sup>⑤</sup>那么,自康有为开始的儒学思想的演变则可以视为这一撤退、收缩的历史进程的全面推进:先是从政治(康有为)退到社会(梁漱溟),继而又从社会收缩为人生(熊十力),整个迂回曲折的战略转移,最后落脚在港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性论之中。<sup>⑥</sup>在儒学思想活动领域的撤退、收缩这一历史进程中,虽然会有反复、曲折,比如牟宗三就力图通过所谓“道德的理想主义”的重建使儒学思想原则继续获得对社会政治的支配、统领地位(即从道统开出政统及学统),但是,由于儒学的重新“建制化”已无可能,因而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是不可阻挡的。而这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机会:儒学及其道德理想主义因被收缩、限定在个人道德选择、人生情怀、人格修养的“私人领域”(即余英时所说的“日用常行”的领域)而找到了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领地。

上述理论与历史的双重分析表明,打破儒家“内圣外王”贯通于一体的传统格局,把“内圣”与“外王”、“修己”与“治人”分别归属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限定于“私人领域”有相当坚实的根据。正是通过这一定位与限定,一方面设定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边界界限,避免了其无边界扩展所导致的泛道德主义后果;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现代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作用的空间领域。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地发掘、选择儒家传统中所蕴藏的可以支援现代民主的道德精神资源。

### 三、选择资源要素

现在的问题是,在上述制度环境和思想前提下,从儒家传统中选择什么样的道德精神资源去支

援现代民主?

近年来,余英时的一项论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他说:

“传统儒家的‘修己’与‘治人’是站在社会上领导阶层(中国的‘士’或西方所谓 elite)的立场上设论的,似乎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时代。然而任何社会结构都离不开一个领导阶层(elite),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因此领导人物的品质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依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只要社会上有领导人物,人民便必然会要求他们在道德上和知识上具备一定程度的修养。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修身论通过现代的转化与曲折也未尝不能继续在‘公共领域’中有其重要的贡献。传统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观念固然已失时效,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终究是一条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原则。制度离不开人的运作,越是高度发展的制度越需要高品质的人去执行。”<sup>⑦</sup>

如果把这里的观点加以展开,那么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人:没有“政治人”(包括政治家、公民、候选人、政党成员、民意代表等等)的参与,现代民主的运作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这样,“政治人”的道德素质、人品修养等就是现代民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从儒家传统中选择道德精神资源去支援现代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方面,现代民主本身是一套制度框架,它体现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公共的操作规则、作业程序、运作机制(如大众参与、政治竞争、公民投票、选举制度等)。换言之,现代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关注的重点是政治生活中的制度、规则、程序,而不是人的道德素质、人品修养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民主制度本身并非是完备无缺的:它长于制度规则的建构,短于政治人的道德素质、人品修养等方面的提高。这表明,在如何提高参与现代民主运作的政治人的道德素养方面,它需要获得来自其他力量的支援。另一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上,传统儒家主张“为政在人”,着眼于对人的要求,关注的是统治者的人选及其道德人品。故此,儒家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⑧</sup>《大学》中甚至

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这意味着，在政治人的道德人格、人品修养方面，儒家传统中蕴涵着相当丰富的精神资源，有可能对现代民主构成某种文化的支援力量。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确实可以在儒家传统中选择一些有助于提高政治人的道德人格、人品修养的资源，以构成现代民主的支援力量。当然，在儒家传统中究竟有哪些资源要素属于这种支援力量，这是一个有待于认真发掘、清理的大课题。在此，我们略为展示三点，以说明这种支援力量是存在的。

### 1. 政治人的责任伦理：忧患意识

责任伦理相对于意图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对概念。“意图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 亦译心志伦理或信念伦理)的要义是：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信念、意向的价值，它使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而将责任推诿于上帝或上帝所容许的邪恶。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则意味着，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对自己行为可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在韦伯看来，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是“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在“根本上互异”，但二者的关系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sup>⑨</sup>不过，韦伯强调，以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必须根据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行事。因为人类的意图伦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非理性的吊诡关系，善的意愿并非必然会带来善的结果，反而可能导致恶的结局。根据韦伯的这些看法，参与政治(包括现代民主)运作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具有责任伦理是基本条件之一。

就责任伦理而言，儒家传统资源中可以构成支援现代民主的因素是“忧患意识”。<sup>⑩</sup>换句话说，参与现代民主运作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需要具备儒家传统所揭示、彰显的“忧患意识”。因为忧患意识实质上体现的正是责任伦理。按照当代学者的解释，儒家的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

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地自觉表现。”<sup>⑪</sup>忧患意识之所以是从“人之自觉”中产生的，是因为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会产生忧患意识。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会有忧患意识。所以，“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生于人生之苦罪，它的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忧患的初步表现便是‘临事而惧’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从认真负责引发出来的便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sup>⑫</sup>

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也许还可以作其他界定，其理论内涵也比较复杂，但如果接受上述解释，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参与现代民主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若能从忧患意识的传统精神资源中吸取养分，以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从事政治活动，清醒地估计自己的行为后果，认真地担当自己的行为责任，即奉行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这无疑将有利于现代民主的运作。因为20世纪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如果单纯依循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行事，带来的都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负面后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家传统中的忧患意识对于进入现代民主过程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不失为一帖清醒剂。

### 2. 政治人的道德情怀：天下为公

参与现代民主运作的政治人不仅需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奉行责任伦理，而且应该对公共权力在根源上属于公民大众具有深切的了解，从而不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借用儒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

把“天下为公”定位为政治人的道德情怀，着眼点有二：一方面，天下为公之理念与人民主权的原则有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从表面来看，二者似乎都触及到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但仔细研

读推敲《礼运篇》中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段论述，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伦理模式，并不是一个政体模式；是一个伦理秩序的‘理想国’，而不是政治秩序的‘理想国’。”<sup>⑧</sup>这就是说，所谓“天下为公”不过是以尧舜为楷模对统治者提出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已，它与现代民主制度中作为政治法理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天下为公）是人伦规范，后者（人民主权）是制度原则。如此界分二者，可以避免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一界分，天下为公作为伦理规范在理论上虽然不能与人民主权的制度原则相提并论，但可以作为政治人的道德情怀对现代民主的制度运作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有一大批富有天下为公之道德情怀的政治人（尤其是政治家）参与现代民主的运作，无疑对民主政治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这种支援、促进作用，在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先生题写“天下为公”以展示其政治理想、道德情怀的经验事例中得到了印证。由此也表明，对于儒家传统社会的政治人而言，天下为公的儒家理念是促进、驱动其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的精神资源。

### 3. 政治人的道德自律：修身正己

在政治权力的制约上，现代民主亦即宪政民主通过法律规则（如宪法）、制度结构（如分权制衡机制）以及社会力量（如相对自主的传播媒介、压力集团）来约束政治人，特别是统治者，着眼于外在的他律。然而，外在的制度性的他律并不排斥内在的道德自律，相反需要得到来自后者的支援、辅助。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家一再强调的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在现代民主的制度框架下，仍然是约束政治人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就是说，在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像儒家那样，把希望寄托于统治者通过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要使手握权力的人作圣人，如牵骆驼通过针孔一样。”<sup>⑨</sup>职是之故，才需要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以对统治者进行外在的他律。但是在外在的他律这一前提之下，政治人、统治者的道德自律与人格修养仍然必不可少。这样，儒学传统中极为丰富的有关如何进行人格修养、道德自律的思想与

论述，就成了参与现代民主运作的政治人可以吸取的一大精神资源。例如，儒家强调“修身”、“正己”，孔子提出：“苟正其身矣，干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sup>⑩</sup>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sup>⑪</sup>荀子曰：“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sup>⑫</sup>显然，这里所讲的修身自律、端然正己，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下的政治人，因为他们也有一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问题。

由此可见，如果既有现代民主外在的制度性的他律，又有政治人的道德自律，他律与自律相互支撑、彼此配合，这将是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格局。而在儒家传统社会中要出现这一理想的格局，现代民主的构建当然是最重要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上述“修身正己”等传统资源为现代政治人所创造性地发挥，以构成对现代民主这一他律机制的支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 四、落实作用媒介

上述分析表明，儒家传统中确有一些精神资源可以构成现代民主的支援力量。然而，需要讨论的是，这种支援力量的作用发挥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媒介？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学说已经丧失了其得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同时也缺乏可以支撑儒学的制度结构或组织建制（如传统的科举制度或书院、私塾之类），因而儒学已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游魂便是儒学的现代处境或现代命运。“游魂”这种处境表明儒学之精神已处于漂浮状态：因为“魂”即是精神，而“游”则意味着没有着落。<sup>⑬</sup>就政治层面而言，它要结束这种没有着落的漂浮状态，只有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治、民主相勾连。然而，问题是如何相联？

自“五四”以来的许多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企图把儒家精神直接落实、体现于民主政治，甚至开出民主政治，或者使民主政治以儒家精神为根基。这种连接进路的实质是使儒家精神与民主制度直接相连，其理论图示为“儒家精神——民主政治”。但是，大量的理论研究已清楚地表明，这在

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种不可能性,我们在上述儒家传统——市场经济——法治框架——现代民主四点一线的基础上,提出另外一条连接进路,即使儒家精神与现代民主中的政治人相连,其理论图示为“儒家精神——政治人——现代民主”,即把儒家精神落实于参与现代民主的政治人,并通过这种政治人对民主政治起到一种支援的功能。

在我们看来,把儒家精神落实于政治人,并以此作为媒介连接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这也许是儒家传统在现代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唯一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正如余英时展现现代儒学的前景时所言:“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溶化在‘日用常行’之中。征诸历史,儒学的起信力量往往系于施教者的人格感召和受教者的善疑会问。……如果鉴往足以知来,儒学在21世纪是否会获得新生,恐怕还要看有没有大批的新‘人师’新‘身教’不断涌现。”<sup>⑩</sup>儒学的新生是否需要出现大批的新“人师”,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推论说,儒学能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发挥某种支援作用,关键在于出现一大批既具有宪政民主的政治理想、遵守现代民主的运作规则、又在文化信念(不是政治信念)上认同儒家且富有儒家之忧患意识、天下为公之道德情怀、能修身正己、以身作则的政治人。我们倾向于把这样的政治人称为“儒家政治人”。

当然,如何全面界定“儒家政治人”的概念内涵以及如何促使儒家政治人在事实上得以出现,这些都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如果儒家传统资源对现代民主确有支援功能的话,那么,可以断言,这种支援功能发挥作用的媒介只能是上述意义上的“儒家政治人”。同时,在可见的未来,这也是处于“游魂”状态的儒学在现代性政治中寻找着落的唯一可能途径。

<sup>⑩</sup> S·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第

337页。

<sup>②</sup> 刘军宁:《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挑战》,《读书》1993年第2期。

<sup>③</sup>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儒家传统在某些方面可能成为现代民主生长的障碍。相反,在我们看来,正视、检讨这种阻碍作用,也是考察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关系问题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不过,这里的关注重心是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资源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条件下,能对现代民主起到一种支援、辅助的作用,故着重分析的是上述制度前提。

<sup>④</sup> 关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定位”问题,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79-280页。

<sup>⑤⑦⑧⑨</sup>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化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1995年第11期。

<sup>⑥</sup> 陈少明的《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解释的传统》(与单世联、张永义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有较多的探讨。

<sup>⑧</sup> 《论语·述而》。

<sup>⑨</sup> 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辑(1)》,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220页。

<sup>⑩</sup> 这里并不意味着儒家传统中的责任伦理资源只有“忧患意识”。而只是把“忧患意识”视为责任伦理资源的重要体现而已。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蒋庆《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但笔者以为,对儒家传统中的责任伦理资源的发掘不能仅仅局限于春秋经、公羊学。

<sup>⑪</sup>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页。

<sup>⑫</sup>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15页。

<sup>⑬</sup> 朱学勤:《风声·语声·读书声》,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66页。

<sup>⑭</sup> 徐复观:《良心·政治·东方人》,《徐复观杂文——看时局》,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46页。

<sup>⑮</sup> 《论语·子路》。

<sup>⑯</sup> 《孟子·尽心下》。

<sup>⑰</sup> 《荀子·非十二子》。

责任编辑:叶金宝

# 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两面性

贾海涛

(暨南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当今国际社会的局势已趋于和缓, 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国崛起在即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某些国家已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 对我的制约、刁难将会加强。不过, 反华阵营与我发生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合作和交往。总的说来, 国际形势对我利大于弊。

[关键词] 国际形势 国际斗争 对华战略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2002) 05- 0076- 04

冷战结束之后, 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武装冲突在减少, 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 全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发展的良机。就世界格局而言, 目前是“一超多强”。不过, 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独霸全球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相反却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制约。应该说, 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是相当好的,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是比较正常的。然而,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有非常严峻的一面, 有些国家给予我们的并非全是友好和善意。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潜伏着一定的危机的, 中国的安全和发展还是面临一定的威胁的。

## 一、国际大环境与新世纪中国的崛起

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强权政治的时代已完全结束, 霸权主义目前依然存在, 有时还十分嚣张。但我们也得承认, 冷战的结束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解的机会。虽然目前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及各种差异依然存在, 对立、分歧和斗争还没有消除, 但全世界阵营的划分亦没有冷战期间那么分明、那么剑拔弩张。“铸剑为犁”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相互协作取代了相互对抗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9·11”事件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全球化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就是

和平与民主、协作与发展。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好的一面, 同时也是根本性的一面。

全球化即全球一体化, 它不仅包括经济的一体化, 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的一体化。首先,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全方位的高度竞争。甚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全球化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兼并或吞并。但是, 它毕竟也意味着全人类的和平与和解、协作与支持, 也带来机遇和利益。它以全球财富的共同增长和全人类生活质量共同提高为目标, 体现一种比较公平、合理、建设性的竞争方式, 与文明、进步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 全球化不是通向发达与繁荣的免费的列车, 它不提供免费的午餐。从本质上讲, 它是比赛与决斗。全球化决不可能远离竞争和较量, 相反, 是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的竞争和较量更加激烈。从某种程度上讲, 竞争、较量就是全球化的主要手段和主题之一。不过, 值得欣慰的是, 全球化虽然表现为激烈的竞争和无情的兼并, 但武力的对抗和军事的竞争、较量不是全球化的主要原则和表现方式。在敌对状态下不可能有全球化, 全球化必须有一个全球和平、和解的前提, 有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目标。而且, 全球化会使人类的和平、和解得到空前加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全球化就是要在和平、合作的前提下, 以一种文



明、合理的竞争方式或形式取代原来体现对抗与敌视的竞争方式：军事的竞争与较量。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未来国际社会的竞争、较量将可能进入“费厄泼赖”的阶段，竞争的项目是经贸、文化，而较量的“武器”是产品或商品，是文化和教育。

当然，“9·11”事件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不过，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和基本发展趋势。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害，恐怖组织是国际社会的公敌，而制造恐怖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行为主体。国际社会基本是稳定的。美国也不可能借此机会进行全球的军事征服，更不可能靠其武力独霸全球。反恐既给美国提供了推行霸权的借口，但同时也给全球的合作提供了机会。总之，“9·11”事件绝不会阻挡住全球化，也不能破坏全球的经济增长和政治联合。国际社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国家间冷战与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都不大。

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机遇，但同时也意味着挑战，对于中国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势头和潜力令许多国家感到惊奇。虽然一些国家对此感到不安和害怕，但它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2000年1月6日的德国《柏林晨邮报》一篇题为《中国将超过日本》的文章报道：“在被问及的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大约1600名商人中，对多数人来说以下设想是明确的：在21世纪前25年，中国将取代亚洲经济大国日本并同欧洲和政治大国美国拉平。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将来世界由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三个超级实体组成。”<sup>①</sup>可见，虽然日本目前经济实力排在全球第二位，但世界各国并不看好日本，包括日本人自己。而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包括人力资源），加上发展速度惊人，许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将是取代日本与美国、欧盟三足鼎立的国家。前几年，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在2020年经济实力将成为全球第一，是美国经济势力的140%。<sup>②</sup>《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也认为到21世纪初的某个时候，“中国几乎肯定会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sup>③</sup>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已有了比较雄厚的积累，社会发展的内

部“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已为新世纪的腾飞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

## 二、西方对华战略的基本点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纵观中国近现代160多年的历史，应该说近20余年所处国际环境是最好的。但与许多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处境相应来说还是有较多困难的。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发展迅猛、崛起在即，招妒、招恨是难免的。应该承认，西方和中国的某些邻国从骨子里面与中国是有着隔阂的。从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决定了它们不能容忍中国的强大。西方某些国家目前虽不像原来那样与中国公开为敌、以武相逼，但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是难以根除的。说得严重一点，战争威胁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可以说，中国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敌意和压力可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难以相比的。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利的一面。这种局面有一定的偶然性或暂时性，但其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和日本等国都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打破亚太地区的平衡，对美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构成威胁。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假想的对象中，美国已将中国列入其中。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等人著书称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一级威胁”。2000年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将中国视为敌人的人数比例最高，大约为27%，比排在第二的俄罗斯（14%）高出近一倍。<sup>④</sup>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新的比较松散的国际反华联盟或阵营已经初步形成。这一阵营时常上演一些反华大合唱，将自己对中国的偏见、忧虑或担心化作敌对的情绪和排斥的举动向中国发泄出来。“中国威胁论”以及“遏制中国”的叫嚣便是以此为背景而出笼的。

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已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由于俄罗斯一蹶不振，中国已经取代苏联成为西方阵营的头号战略对手。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正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竞选过程中所宣称的那样，美国“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

而非战略伙伴”。美国等国决不希望中国发展太快,甚至可以说决不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一种战略主导思想已经形成并逐步实施:拖住中国,希望中国像苏联一样分裂并改变颜色。

可以说,目前除了个别国家的处境极其险恶之外,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国际社会招致这么多的敌意和联合制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古巴、朝鲜等国目前虽然与美国等国水火不容,关系极其恶化,但它们并非美国及西方的心腹之患。因为这些国家现在远非美国和西方的对手,将来也很难构成威胁,而中国则不然。对伊拉克等国,西方的担心主要是从一时的安全和局部利益的角度考虑,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被视为长期的头号竞争对手。因此,在世界局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相对而言我们面临的威胁或敌意有可能是最大的。

“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及围绕着这一行动进行的外交行为说明美国有实力控制局面并左右局势的发展。“9·11”事件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大打击,相反却加强了它的全球控制力。从政治上来说,“9·11”事件使美国得到的要远远多于它失去的。“9·11”事件可以说给美国提供了一次机会。它借机成功地控制了阿富汗并将自己的势力伸进了中亚。同时,它还威胁要对伊拉克等国大打出手。“9·11”事件并没有使美国阵脚大乱、顾此失彼,相反却证明任何中小国家都不可能对它形成挑战并构成真正的威胁。总之,“9·11”事件并没有说明美国因反恐而使我们所受的压力得到缓解。不过,也不能说美国对华政策因此变得更激进。它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因“9·11”事件而有多少改变。

美国及其盟友尽管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对手,但又不愿与中国搞直接的军事对抗,相反,它们还想利用全球化的机会通过经济的交往在中国获得好处。目前,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加“遏制”。这也是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或态度。“遏制”是真正的目的,“接触”是不愿意公然为敌或直接对抗,也不愿因此失去因经济交往带来的利益,更是为了在“接触”中进行各种渗透,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敌对势力与我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但

不是说没有战争威胁,更不代表没有别的形式的对抗。

### 三、国际较量和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式

中国与某些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将不可避免,但主要将表现在经济、文化领域,斗争与解决的方式恐怕也将以政治手段为主。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自身的实力决定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斗争方式不大可能以军事对抗为主。用武力或战争形式破坏或阻挠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等国来说代价太高,是不现实的。中国不希望打仗、不希望对抗,美国及其盟友也不希望。双方可以有正常的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只不过,中国所受的限制、刁难注定要比一般国家多。

政治斗争是外交、经济、文化和军事斗争的综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未来国际社会竞争、较量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国际斗争或国际较量的形式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手段为主,政治手段也是为这两项服务的。笼统地说,美国等国手段将主要是经济、文化的渗透和控制。它们企图借此将我国纳入它们的步调,使我国在不知不觉中屈服,最后发生“和平演变”。它们幻想在与我国接触的过程中保持主动,控制局面,以达到“遏制”的目的。它们将以不突破武装冲突的“临界点”为主的“封杀”、“制裁”、“限制”等手段为主。全球化可以说为发达国家使用这些手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全面的新型“战争”,对中国也是严峻的考验。我们应该认清目前国际较量和国际斗争的性质,适应这种竞争和较量的方式,积极迎接各种挑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全球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边缘化”。全球化和互联网使国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为西方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全球化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具。借助于它,这些国家兵不血刃就能完成对全球的市场占领,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有人因此将全球化称为“经济殖民”、“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或“美国化”。

目前的全球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全球化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和市场垄断首先意味着发展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实际上,经济领域已经成为西方“进攻”别国或颠覆别国政权的突破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国家安全的突破口可能主要出现在经济战线而非军事战线。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或经济的控制可以轻易造成一个国家经济的崩溃,让一个国家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可以轻易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或引发一个国家的内乱,甚至可以使一个国家发生分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产生的后果便是明证。这场金融风暴使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有些国家通过若干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印尼、泰国、菲律宾的政局不稳与这场金融风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经贸领域是未来国际社会最大的战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斗争将主要集中在那里,该领域的摩擦、斗争将是家常便饭。中国“入世”的过程就是这种斗争的体现。美国等国一直利用这一问题卡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但这实际上只是经济领域较量的开始。“入世”意味着机会,但也意味着挑战和风险。如果没法适应世贸组织的竞争方式或竞争规则,如果没法在竞争中生存并成为强者,“入世”就意味着自己的企业被别人吞并、市场被别人占领。当然,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不“入世”的结果更糟糕。总之,“入世”不“入世”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经济要实现国际接轨并适应国际竞争。

文化领域的斗争也将日趋激烈。西方的文化及其体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这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文化冲突和信仰上的冲突。对此我们应该制定及时的应变措施,彻底粉碎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

中国的敌对势力会在几乎所有领域寻找借口,制造麻烦,但它们会以若干问题为“突破口”或“主攻方向”。它们就是要利用这些问题大做文章,给中国出难题,以达到制约我国发展的目的。这些问题中的个别问题已严重影响或正在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处理不当势必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正常交往。

我们应正视各种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因素以及我们面临的国际挑战。不过,也应该看到目前国际环境及全球化本身积极的一面。我们不能杯弓蛇影,对国际环境抱一种过于悲观的态度。相反,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国际事务中去,用事实说话,消除误会,分化瓦解反华势力。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各种有利于我们的条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就能尽早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

①[德]《柏林晨报》2000年1月6日报道:《中国将超过日本》。

②[美]麦格纳汉:《发展评估》,“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Journal”1995年第3期。

③[美]理查德·波恩斯坦等:《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④[美]戴维·桑兹:《美国人认中国是最不友好的国家》,《华盛顿时报》2000年9月1日。

责任编辑:罗苹

(上接第69页)

Minda Zetlin, When It's Smarter to be Second to Market, Management Review, March 1999.

戴维·贝赞可、戴维·德雷诺夫、马克·尚利著,武亚军总译校:《公司战略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Marvin B. Lieberman<sup>1\*</sup> and David B. Montgomery<sup>2</sup>, First-mover (Dis) advantages: Retrospective and link with the resource-based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Vol. 19.

宋冬林主编《商战喻世明言》,长春出版社,2000年。

Cho, Dong-Sung, Kim Dong-Jae, Latecomer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Japan and Korea, Organization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Jul/Aug 98, Vol. 9, Issue 4.

责任编辑:郑红军

# 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浅析

郭永中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北京 100871)

[摘要] 当前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滞缓, 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是地方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臃肿; 三是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 四是巧立名目乱收费。解决当前中国农民负担问题,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三农的基础地位的意识,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其次是精简政府机构, 转变政府职能; 三是减负与发展双管齐下同时并举; 三是积极探索农村费税改革经验。

[关键词] 农民负担 现代化 杠杆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80-03

## 一、农民负担的现状分析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 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5.5%, 同期负担<sup>①</sup>年均增长 15.4%, 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 1995—1998年间,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1.1% (未扣除价格因素), 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 6.4%, 负担增幅低于收入 4.7 个百分点, 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 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 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 人均负担为 106.7 元, 比上年减少 1.32 元, 减少了 1.2%。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 5.1%, 比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 比最高年份的 1994 年回落 2.3 个百分点。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计算, 1998 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 68.77 元, 比上年减少 1.73 元, 减少 2.5%, 占上年农民人均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为 3.5%, 比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 比最高年份的 1995 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sup>②</sup>

从上述情况看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且呈下降趋势。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 1991 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 17.7 亿元, 各种罚款 23.1 亿元, 集资摊派 41 亿元, 其他社会负担 38.1 亿元。上述各项合计, 人

均 13.8 元, 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 2.5%。但是某些地方调查结果表明, 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7%, 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山东省农业厅的调查显示, 山东省聊城地区冠县烟庄乡, 1992 年农业税 25.3 万元, “三提五统” 62 万元, 而其他负担高达 88.7 万元, 这还不包括乡镇部门向农民收费 6 万元, 计划生育罚款 43.2 万元。<sup>③</sup>有关数据表明, 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 5% 的警戒线。

表(1) 全国不同地区农民负担与收入状况

(单位: 元、%)

| 内<br>容<br>年<br>份 | 东部       |           |           | 中部       |           |           | 西部       |           |           |
|------------------|----------|-----------|-----------|----------|-----------|-----------|----------|-----------|-----------|
|                  | 人均<br>负担 | 人均纯<br>收入 | 人均<br>负担率 | 人均<br>负担 | 人均纯<br>收入 | 人均<br>负担率 | 人均<br>负担 | 人均纯<br>收入 | 人均<br>负担率 |
| 1996             | 100.40   | 2461.20   | 4.57      | 141.20   | 1633.70   | 8.72      | 72.60    | 1168.40   | 7.30      |
| 1997             | 127.20   | 2713.40   | 5.17      | 101.40   | 1855.10   | 6.60      | 70.8     | 1380.60   | 6.06      |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年鉴》及农业部统计资料 1992—1997 年。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劳动力素质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民负担也存在着明显差别。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农民负担轻, 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方农民负担重。

## 二、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造成当前农民不合理负担逐年加重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经历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1985—1988年是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5.0%。1988年—1991年是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停滞徘徊的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02元增加到709元,名义上增长率仅为1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1.6%,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90和1991年虽有好转,但3年平均实际仅增长0.3%。1992年至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恢复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21.7%,实际增长率5.4%,恢复到缓慢增长时期的水平。总的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缓。

2. 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县乡两级政府负担着每年安排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的压力,还得给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导致组织机构膨胀。机构的膨胀,反过来增加农民的负担,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乡有几十个副乡长,简直不可思议。有的乡镇为了好办事,给村长也挂一个副乡长,这种庞大的“军团”开支怎么办?乡长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只有从农民身上取。农民拿不出钱,乡镇干部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强行收取,有的地方还以“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务”为由,进行非法拘禁,拷打。近年来这种因农民抵制不合理负担引发的伤人、死人恶性案件,在全国农村中时有发生。

3. 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政府上。据《中国经济导报》,全国农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

占该项支出的73%,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学生除学杂费、书本费之外,还需交勤工俭学费、考试费、资料费等各种费用。1995年江西省提供的资料显示农村人均学杂费支出67元,1998年上升为125元,增长87%,致使一些贫困农民家庭子女过早辍学,如果有子女考上中专、大学,在城里的高额学费和生活费用更是令相当部分农民靠正常的家庭经营收入无法支撑,必须每年大量借款,每学年需借款7000元左右,<sup>⑨</sup>农民说“无学上发愁,有学上也发愁”。

4. 巧立名目乱收费。地方政府把来自内外部的经济压力转移到农民头上,增加了农民额外的经济负担。一是内部开支的压力。由于靠财政吃饭的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大哥大、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支出又往往落到农民头上,比如强行要农民订阅报刊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二是上交税收的压力。由于县属企业不景气,乡镇企业又大批倒闭,农产品市场价格低迷等原因,出现层层下达指标,甚至层层加码,违背实征原则,巧立名目收税收费。农村当前普遍超标收费问题严重,例如村电费仍高于1元/千瓦小时,个别地方村电费甚至高达1.6元/千瓦小时。

## 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江泽民曾经指出“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共产党的宗旨和农村的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农村是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中国80%的人口都在农村,与农民的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我们就失去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们的立

国之本就会动摇，我们的事业就很可能葬送。”

1. 以农民利益为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刚开始过上温饱生活，有的地方农民正在向小康目标迈进，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估计农民的收入状况。当前农民种田不赚钱，农民收入很难增加，如果遇上天灾人祸，就会有大部分农民返贫。要增加农民的收入，目前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二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在目前市场状况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显然不现实。1998年国务院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粮食，由于不能实现顺价销售，结果使粮食部门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办法目前行不通。那么只能走第二条路，帮助农民减轻负担，降低种田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正确，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虚报农民收入，致使减轻农民负担停留在口头上，造成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加重。因此，减负政策法规要得到贯彻落实，必须首先以农民利益为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农业、农村、农民”的基础地位的意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 精减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精减机构，裁减冗员，转变职能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改革方向，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指南。现在一个60多万人的县，吃皇粮的就达1.2—1.5万人之多，一个乡镇，靠农民负担的人数，也在150—200人左右，而一个县，实际财力也就是一个亿。<sup>①</sup>用一亿的财力，负担万人以上的“皇粮”队伍，怎么能糊口过日子？内地大多数工商业不发达的县，政府养不起这么多的人，自然就要从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要钱，再加上内地干部的工资水准很低，要想多捞油水，只有向农民摊派，向农民乱收费，所以农民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贫困地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硬招，就是精简机构，精干队伍，实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体制。如果村组干部压缩60%以上，不仅便于工作，而且能够真正减轻农民负担。

3. 减负与发展双管齐下，同时并举。这是解决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基层干部要以民族兴旺为己任，真正以农民利益为重，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应当鼓励农村中的优秀分子跳出农村，积极引导帮助他们从事工商业，为农村经济发展积累资金和市场资源。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农村的发展要有时代和世界的眼光。第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重点引导农民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二，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走农业商品化和产业化道路；第三，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加快非农化步伐；第四，在农村推行多种所有制形式，解放农村生产力，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 积极探索农村税费改革经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整农村现有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也是党中央目前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举措。其作用有：一是规范收费行为，遏制农村“三乱”；二是初步规范农村分配关系，促进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议事制度，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是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实践证明，安徽等地的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拥护，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因此，尽快探索和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早日摆脱负担过重之苦，就成为新时期的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①指缴纳税金、上交集体承包任务、集体提留和摊派。

②《世界调研》1999年第10期。

③参见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86页。

④《中国经济导报》1999年9月1日。

⑤据《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7日报导。

责任编辑：叶金宝



# 五四时期吴稚晖所提倡的科学思想

彭国运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北京 100871)

[摘要] 科学是“五四”的一个口号。吴稚晖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以这个久被遗忘的人物为个案, 以探讨五四时期人们是如何具体地提倡科学的这一问题。文章认为: 吴稚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 一方面不忽视当时所强调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即形式逻辑和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 另一方面, 更侧重于提倡发展科学事业, 提倡使用和制造工具, 发展物质文明。他的提倡科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主流选择, 同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关键词] 吴稚晖 科学 五四时期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83-05

吴稚晖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新文化阵营里, 他是提倡科学最切实、最热情的人, 他主张新文化运动不仅要向西方学习科学, 还要学习西方的道德, 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复古主义。他的思想代表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选择。胡适称他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科学派的“压阵大将”, 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sup>①</sup>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认为他是1912—1928年这一阶段的“重要思想家”、“最彻底的思想家”, 仅次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代表人物”。<sup>②</sup>阿尔福莱德·福克(Alfred Forke)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家。<sup>③</sup>可见吴稚晖的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不过, 现今有关五四时期的思想史论著很少提到吴稚晖, 中国内地一般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人比较熟悉, 而对他却不甚了了。解放后至今, 吴稚晖的著作在内地没有重新整理出版过一部, 研究专著也没有一部。吴稚晖的传记, 只有一本性质近于通俗文学的《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sup>④</sup>谈不上严肃的学术研究。有关论文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sup>⑤</sup>可见吴稚晖还大有研究的余地。

吴稚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1927年他在“四·一二”事件前后支持蒋介石反共, 并且终于

成为蒋家王朝的遗老, 因此为内地学界所否弃。不过, 在五四时期, 他仍属于新文化阵营, 且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表现了他的思想个性。就这一点来说, 他不仅应该肯定, 而且应该研究。

“科学”是五四的一个口号。长期以来, 人们对五四的“科学”的理解也就停留在口号层面。然而五四的先驱者在提倡科学时, 是否仅限于高喊几声口号、而没有具体地去论证呢? 从吴稚晖来看, 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即以吴稚晖为个案, 探讨这一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 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格致”的名义下向中国输入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这种输入是点点滴滴的, 规模很小, 并且不是近代中国人的主动追求。近代中国人主动追求西方科学的第一步, 是洋务运动, 这时学习的是“船坚炮利”, 停留在“术”的层面。1867年, 奕訢奏请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 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这表明洋务运动的学习科学有上升到“学”的层面的倾向。但因此爆发了一场大争论, 天文算学馆的报名应试者也很少。多数的士大夫仍不以学习科学为然, 斥之为“奇技淫巧”。康有为正式使用了“科学”这一名词, 并在戊戌变法期间, 上书光绪帝, 奏请开学校, 教以科学。他所说的科学包含社会科学。这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开始要求给予科学以正当的重视了。严复介绍西学, 肯定西方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价值,认为是西方的政治和技艺的根本,这比康有为更进一步,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深化。1915年初,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科学》月刊,在国内发行,介绍自然科学方面的新知识;随即,《新青年》正式标举出“科学”的口号,当作近代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它对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表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学习已抓住了根本。

不过,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因为他们的根本观念就是要发动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以造成“西洋式社会国家”的基础。科学作为这种革命的武器,其中用来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反对盲从的,就只能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当时所理解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求思维合于“论理”(即形式逻辑),以反对传统思想含混、笼统的毛病。(二)用自然科学知识反对鬼神说,把生物进化论应用于分析社会历史。(三)提倡实证哲学,在历史研究中重视证据,反对没有证据的东西。这几个方面,吴稚晖最重视的是形式逻辑和进化论。

重视形式逻辑,要求思想清晰,这是吴稚晖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第一个特点。

1923年,张君勱发表《人生观》的演说,引起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在这篇演说中说:人生观“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sup>⑥</sup>吴稚晖反对这种说法。虽然他也自称“玄学鬼”,不过,是“愿受科学洗礼的玄学鬼,不是那‘大摇大摆’反对论理的‘无赖玄学鬼’”。<sup>⑦</sup>他又说:“我的玄学鬼……最拜倒科学神的脚下,总要附会论理,岂敢无赖呢?……他讲起话来,至少也总喜欢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论法,才肯出口的。”<sup>⑧</sup>“何能以玄学解决人生,可外论理?”<sup>⑨</sup>就是说,人生观、玄学也要讲形式逻辑。这里,讲形式逻辑被看做是受了科学洗礼,被看做是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的特色。又把玄学叫“鬼”,把科学叫“神”,可见对形式逻辑的重视,对不讲逻辑的轻蔑了。

吴稚晖否认上帝,否认“隐德来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所用的名词,即变相的“灵魂”)也是用的

形式逻辑。他用一个至大无外的概念“一个”把一切都包括进去,然后说,显然上帝不能超出这“一个”之外;在这“一个”之内,上帝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我”、马桶里的石头,便不是上帝,充其量只是被上帝“鉴临”了罢了,如此,则上帝不过“一个”的一分子,因此怎能有作为本体的上帝呢?<sup>⑩</sup>于否认“隐德来希”时说,杜里舒“一方面将‘隐德来希’同物质争持,成立个二元论;一方面又说‘隐德来希之意欲,即由机体构成’。隐德来希是‘初式’构的,‘心是次式的’。呀呀!隐德来希既被机体构出来的,还要同爸爸(物质)争个二元,真傻小子。”<sup>⑪</sup>这是说,“隐德来希”不能既由机体(物质)构成,又与物质并立为二。这里运用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

吴稚晖反对概念不清晰、笼统、含混。当被请为《科学周报》校读时,他曾自我解嘲道:“如今《科学周报》还是叫不懂轻(氢)气、养(氧)气,止懂正气、奇气的吴稚晖来出名校读!”<sup>⑫</sup>嘲笑“正气”、“奇气”这些名词笼统含混,不成什么概念。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吴稚晖对“一个”、“新信仰”、“人生观”等重要名词都作了清楚明白的解释。

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进化论,以反对权威,反对偶像,反对复古,这是吴稚晖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第二个特点。

吴稚晖根据进化论,反对“物质文明破产”说,反对回到孔子。针对张君勱、章士钊等人“物质文明破产”的叹声,他说:“石器以后,曾有今日的物质文明;今日的物质文明以后,还要有骇得煞张君勱、章行严各位先生的超等物质文明。物质文明非但现在说不到破产,就是再几兆年,还是进行。”<sup>⑬</sup>认为物质文明是进行不已的,决不会破产。梁启超、梁漱溟主张回到孔子,吴稚晖也以进化论来反对他们。他说:“孔二先生(孔子),说不定及不来梁任公梁大先生,梁漱溟梁二先生。”<sup>⑭</sup>“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胜过他的两个梁家小后生,那中国止好一代不如一代,这无异说中国人将由痴愚而禽兽,禽兽而蛆虫,只剩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他老也有什么显焕呢?”<sup>⑮</sup>人类文化、人的智力都是进化不已的,所以不能以古人为权威、为偶

像。吴稚晖经常以进化论来反对复古主义,提倡物质文明,提倡积极的人生观。而主张复古,提倡精神文明,提倡消极的人生观的,也就必然反对进化论。张君勱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长篇大论的论证进化论时,即隐含这种意思。所以讲进化论不仅是宣传科学,也含有要求向前学习西方的新事物,反对退后复古的意义。

吴稚晖更侧重于发展科学事业,提倡使用和制造工具,以推进物质文明的进步。

面对当时中国科学落后,物质匮乏,迷信充斥的现状,他痛切地指出:

“学校则缺少工艺之学校,书籍则缺少科学工艺之书籍,器具则缺少科学工艺之器具。”<sup>⑤</sup>

“面粉厂里反用美国的麦,身上着的是别人的布,医病时用的是别人的药。”<sup>⑥</sup>

“……什么新鲜空气,卫生饮料,反正没有科学上的知识来明白讲解,我们也漠然不动于中。我们左邻右舍的性命,都托给城隍老爷,观音菩萨。……天灾人祸,跟了蚊虫蛇蚤,猖獗起来。”<sup>⑦</sup>

“蛇鼠黄狼,一齐显灵;廿四夜灶君皇帝的上天,耀武扬威;农民的辛苦米粒,都装入妖巫道姑袋里。”<sup>⑧</sup>

吴稚晖估计,如以文学、玄学、科学三者总数为十,则当时的中国,文学占六,玄学三点九,科学只有零点一。<sup>⑨</sup>科学现状既如此贫弱,提倡发展科学事业自然成为十分紧迫的事。

吴稚晖提倡发展科学事业从号召青年使用和制造工具入手。他认为,中国物质匮乏,原因就在于工具少;工具少,又在于青年没有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爱好。“其备物不周之故,推想于物之所以备,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状,普通皆有觉悟,如所谓主张推广机器制造也,所谓传布实业主义也,所谓注重科学教育也,无非间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虽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出,普及于青年间,则所谓机器制造,所谓实业主义,所谓科学教育,皆如隔云雾而谈天际也。”<sup>⑩</sup>认为在青年间激起对于工具的爱好,是推广机器制造,传播实业主义,推行科学教育的根本。他要求青年“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置于家中自修室中。开其手匣,有小剪、缝针、修脚刀、铁锤、裁纸削笔之

刀、开瓶之钻、起钉之凿、剥孔之螺钻;无不必备。扣其衣袋,时辰表、寒暑计、画图尺规,亦无不具。于是烧蒸水之玻璃瓶,蓄电气之积累机,与所谓普通斧凿,若枢,若括之支架,相位置于刨床、钻台、锯座之间。”<sup>⑪</sup>青年如何求得这些工具呢?他的办法是“节缩青年制裘、观剧、会食,种种消耗无益之资。”<sup>⑫</sup>不过,当时的普通青年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如何使青年养成对于工具的爱好,他也没有说明。在《工人俱乐部之娱乐品》一文中,他认为,工人俱乐部的娱乐品不能仅限于台球、网球等等,要增加各式制造工具。但工人工作疲乏之余,对这些工具怎么还会有娱乐的兴趣呢?吴稚晖认为,只要工人“处以帝王娱乐木工之精神,则日入之后,苦工告毕,手持烟斗,三两赴会,……因不必刻期而成器,计日而量功,则忘机之娱乐,虽操作甚苦,而自津津有味。”<sup>⑬</sup>他以为爱好只是一种态度,能够自行随意改变。

吴稚晖的注重工具源于他的品物进步论。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前足进化为手,能造人为品。动物的工具是角、口、足;人的工具是手,手是生物界最好的工具,因为它能制造其它工具,制造出许多人为品,以与天然物对立。他说:“有人为之品,即所以善生类之群,补自然之缺,是名进化。”进化就是人为品的增加。所以,“能以其手作工,助增人为之品,使生类之群益善,自然之缺可补者,此可名之曰进化之动物。”<sup>⑭</sup>人要用手作工,才能有益于自然和人类。他说:“吾中国人民,……科学工艺太缓于人,我等不能为人类亦尽备致用日进无疆之义务,于人道终觉得有亏。”<sup>⑮</sup>发展科学也是为人类尽义务的需要。

人进化出手来就是要劳动,要制造工具,发展出科学来的。社会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品物的进步。吴稚晖列了一张表来说明他的“品物进步论”:

“七十四万年为原(猿)人时代,‘品物’一无所有。

一十五万年为老石器时代,品物止有不多几种的坚石卵,名曰石斧。

十万年为新石器时代,品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针、角锤种种,甚而至于有青铜器。

一万年至今为书契代了结绳,文明肇开时代,自琴瑟、耒耜、杵臼,至今轮船、火车、飞机、潜

艇,无非极言其品物之多而已。”<sup>①</sup>

自原人时代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文明时代这种进步大大加快了,所有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都是由工具的进步引起的。

“五千年草昧初开时代,就算仓颉为古皇,巴比伦作楔形文砖,埃及能作象形碑,那时的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状态,东西不能讳。画伏羲则半人半蛇,首蒙树叶。尼罗江上碑中之人物,亦赤条条仅遮其阴处。

三千五百年为专制时代,三代之隆,唐虞之盛,希腊罗马之宏规,皆一方面玄学鬼谈之而流涎,一方面专制酷虐之史迹,不可掩也。

三百年为宪政时代,东方固无其事,西方则歌白尼一声大喊,太阳居中而不动,金牛宪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为共和时代,则华特的城隍庙香炉式汽机出世之故。

目前世上有共产国,则由飞行机挑起了大战之故。

以后什么尤公平的名目时代,如何达到,我可不必赘言,请看上表自知。这就是我们人类值得努力科学的理由。”<sup>②</sup>

蒙昧时代、专制时代是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产物。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产出宪政时代,蒸汽机的出世产出共和时代,飞机出世挑起大战产出共产国。吴稚晖这些说法并不确切,但他看出科学的发达、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政治制度的进步,这是对的。所以他认为,要达到比今日“尤公平的名目时代”,只要努力科学就行了。因此,美好的社会在将来,在物质文明发达之世,在机器代替人工劳动之世。他提出“机器促进大同说”:

“……工厂再多开点,能够叫乡下田地都让富翁包办了,用机器耕种,农民多变成了工人,便马上一个世界大同革命起来。”<sup>③</sup>

“大同”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只要土地全归机器耕种,农民变成了工人,世界大同就会马上到来了。

在他想象的大同社会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各种东西应有尽有,任人自取。物质文明的发达导

致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人人高尚、纯洁、优美,用心思读书发明。吴稚晖认识到,人们的精神生产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因此他反对片面提倡精神文明,而大力提倡物质文明。他提倡使用和制造工具,提倡发展科学事业,提倡机器促进大同说,实际上都是提倡发展物质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国外有人说“科学破产了”,“物质文明破产了”,故他便把这个口号鲜明地提出来。1923年,他在《箴洋八股之理学》一文中提出“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sup>④</sup>当时中国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经济、军事力量,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立定脚跟。吴稚晖认为,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东西方并没有多大的距离,此后中国便一日一日地落后了。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30年,日本赶上了西方,而中国错过了。“岂知最近二十五年,不惟不急追;日本则又进一步而飞驰;中国则一前一却,徘徊观望,若无其事。……再滑过了此后的二十五年,便进了灭种的第二步,与世界共同程度,愈离愈远。”<sup>⑤</sup>当心中国太落后会导致亡国灭种,这是从御侮救亡的角度来提倡科学的,所以强调用机关枪对打,就是说,人家有机枪,我也要有机关枪,才谈得上御侮救亡,而不能用义和团的毛竹枪或用什么“诵《孝经》以退黄巾”的办法。他说他“经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sup>⑥</sup>但是甲午之败是因为中国没有大炮机关枪吗?他似乎没有考虑。他的意思似乎是首先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御侮救亡,保住中国独立,“把中国站住”,再从容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所以悍然提倡“机关枪”主义,要把线装书丢进马桶里,使许多人听得刺耳。

从上面看来,吴稚晖提倡科学技术,提倡物质文明有三个立足点:(一)御侮救亡;(二)为人类尽天职;(三)实现理想的社会制度。在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中,吴稚晖认为,人生各种问题的解决是不能离开科学的。

他认为“头等名角”的人生观应包含三个重要部分:吃饭(个体生存)、生小孩(繁殖后代)、招呼

朋友(处理人际关系)。关于“吃饭”问题,他认为,要让衣食住行差不多与清风明月一样无限丰富,吃饭问题才算完全解决了。“要想出许多饭来吃,不仰仗物质文明的科学,更有什么方法呢?”<sup>①</sup>所以,要解决吃饭问题离不开科学。关于“生小孩”问题,他认为,节育避孕,优生进种都要仰仗科学。“要想绝欲绝得道地,避孕避得稳当,能够不好好的去请教科学么?”<sup>②</sup>节育避孕是离不开科学的。优生进种呢,自然也离不开科学。“……血属之分辨,用人类之标志,不如用天然之生理。必待科学一步一步的增进,辨明人类内部有如何的差异,即显现于外部,为状貌之如何分别。”<sup>③</sup>到科学充分发达的时候,就能从人们外部特征上看出内部生理的差异,优生进种就非常容易了。可见“生小孩”问题也离不开科学。关于“招呼朋友”,吴稚晖用孟子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作为“招呼”的工具,但不认为是出自先天的,而认为它们都受理智的支配,理智自然愈科学化愈好。吴稚晖举例说,譬如见孺子已入于井,仅仅一个“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办法,而如果早预备了关联梯、救命圈、起重钩,救人就会非常容易了。可见讲“四端”、招呼朋友也离不开科学。所以,人生各种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科学的。

但是,吴稚晖并不认为科学能够完全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有人称吴稚晖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sup>④</sup>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唯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有效的知识并且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sup>⑤</sup>因此,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吴稚晖显然不是唯科学主义者。第一,他不排斥“玄学”,认为只要它不违反形式逻辑,就可以存在到世界末日。这就是说,玄学亦有其效准(他就自称玄学鬼)。第二,他明确地说“美学玄学科学三者之于人类之学,犹轻(氢)养(氧)二气之于水,缺一而不可,惟各有其成分”。<sup>⑥</sup>这就是说,美学亦有其效准。他更明确指出科学并非万能,并不包办玄学、美学。“科学包办的好梦,甲方不必做;科学包办的恐惧,乙方亦不必起也。”<sup>⑦</sup>第三,他不废宗教。他认为信仰心与宇宙同尽,<sup>⑧</sup>而信仰包括宗教的信仰(以神为对象)与非宗教的信仰(无神的信仰),宗教学,“宗教家固在必应研究之列,即非宗教家为其有人类进化史上相当价值,亦

极可研究”。<sup>⑨</sup>对于宗教,“我等止当尊重彼方亦一是非,敬爱之如常,不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足矣”。<sup>⑩</sup>可见他认为宗教亦有其价值与效准。既认宗教、玄学、美学各有其效准,则显然不认科学为唯一有效的知识。宗教、玄学、美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不同,则他显然不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虽然他认为玄学应当合乎形式逻辑,但形式逻辑不等于科学方法。既不认科学为唯一有效的知识,又不认科学方法为唯一有效的方法,则显然吴稚晖不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

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13页;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111页。

②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京)大北书局,1935年,第154、156、144页。

③郭颖颐、雷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④罗平汉:《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⑤李璠:《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吴稚晖》,《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周为号、钟声:《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李良玉:《吴稚晖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论纲》,《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等。

⑥《人生观》,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6页,按:本书无全文页码,只有单文页码。以下引自本书的页码均指单文页码。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稚晖的人生观》,广州中山书店,1928年,第86、101、107、122、126、127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君劢:《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引自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14-15、10-12、34、4、63、71、6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答李石岑书》,引自时希孟:《吴稚晖言行录》(上),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第84、85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稚晖:《科学周报编辑话》,引自《吴稚晖选集·科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35、48、90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工人俱乐部之娱乐品》,引自《吴敬恒选集·科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2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青年与工具》,引自《吴敬恒选集·科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9、1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吴敬恒选集·科学》,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27、80、81-82、79页。

责任编辑:林廷卿

# 回归传统：《春秋董氏学》初探

钱益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上海 200437)

[摘要] 戊戌变法前夜, 康有为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 《春秋董氏学》一书表明, 康有为复兴传统的公羊学说、儒家的伦理观和法家的权威思想, 对抗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平等观。由此将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在西潮面前的应变能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 权威 进化 民主 平等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88-05

康有为的许多论著均经篡改, 给研究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带来诸多不便。《春秋董氏学》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同为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但学术界尚无专门讨论《春秋董氏学》者, 因此值得深入研究以填补这一空缺。经孔祥吉考证, 该著并未进呈光绪帝。<sup>①</sup>作为研究康有为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较为可靠。

《春秋董氏学》编撰的时间, 康有为的自述有矛盾。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提到, 《春秋董氏学》自1894年在桂林开始编撰, 1896年在万木草堂继续编著, 1897年冬, 由康广仁在上海书局刻成,<sup>②</sup>历时长达四年。年谱三次提到《春秋董氏学》都与《孔子改制考》同时并举。但是直到1896年秋, 康有为还没有打通公羊三世说和《礼运》大同说, 所以该著编撰不会早于1896年秋。<sup>③</sup>文本编撰粗糙武断, 内容重复拖沓, 可证该著是在变法前经众手匆匆编成。

在编撰形式上, 《春秋董氏学》突破了从文字音韵入手进行训诂辨伪的清代汉学惯例。康氏以凌曙注本为原典。用欧氏几何的逻辑, 将《春秋繁露》进行“同类项合并”, 把阐述同类概念的句段摘抄合并, 然后加按语进行演绎, 推导出新的结论。《春秋董氏学》表达孔子改制思想的方式是开创性的, 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是否与新形式相符呢? 本文以康有为论进化和民主平等为例, 作一文本分析。

## 一、“三世”：康有为的“文化进化论”

康有为对进化论的反映集中于卷二《春秋例》。设例是为了通晓《春秋》, 《春秋》例多达23则。康氏着重阐发了公羊“三世”之意。把“三世”视为孔子托诸《春秋》的“非常大义”。《春秋繁露》中, 董仲舒把《春秋》鲁国十二公按照距离孔子生活年代的远近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东汉何休以“所传闻世”为“衰乱”, “所闻世”为“升平”, “所见世”为“太平”。三世只是书法各异的客观的时间划分, 并无社会依次进化之意。康有为却把三世附会成文教完备与否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种社会, 并把升平世、太平世分别等同于《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小康、大同社会。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合, 这在康氏以前刊布的书籍中是没有的。康有为在该卷《三世》下加按语道: “所传闻世为据乱, 所闻世托升平, 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 文教未明。升平者, 渐有文教, 小康也。太平者, 大同之世, 远近大小如一, 文教全备也。”从据乱、升平到太平, 社会依次进化, 衡量的标准是文教, 不妨称之为“文化进化论”。很明显, 康氏仍然坚守公羊家以文化判定夷夏、先进后进的立场。以文化为标准的社会进化思想与基于生物进化立场上的社会进化论不啻是天壤之别。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殊非易事。



康氏的“进化”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的关系，学术界多有争议。最早用进化论阐述康有为思想的是梁启超。梁在政变后为乃师作传，称康的哲学为进化派哲学。（《康有为传》）此后论者多袭梁说，把社会进化论作为康有为和整个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梁是康的弟子，所写传记存在过于拔高之弊。康有为本人对梁传记亦不认可，“以汝为我写传记，人必信之，然大不肖，则吾亦不敢谓汝写我像也”。

汤志钧先生最近撰文《再论康有为与今文学》，认为康有为的社会进化思想（“大同三世”说）不是导源于西方进化论，而是来自儒家今文学；康有为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是在戊戌政变之后，这主要反映在《大同书》中。<sup>⑨</sup>笔者尚有数条商榷意见，求教汤先生。

第一，把“大同三世”说称为社会进化思想是否恰当？这涉及对“社会”和“进化”两个概念的理解。“进化”一词含有直线思维和神学目的论色彩，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华传统内并无相应的对等语。如果为了中西对译的方便，一定要以“进化”一词概括“大同三世”，那么不妨采用“文化进化论”更为恰当，即社会进步的标识仅限于文化一途。晚清学人频繁使用“社会”这一概念。“社会”是中西方差异最大之处。“社会”指介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地带。欧洲各国，商工农政各界都有“社会”。“社会”发达构成欧洲一大特色。中华体系只有“江山——国——家”和“君——民”的格局。如果要找欧洲意义上的“社会”，则汉末的“士”和唐宋以来形成的“商”庶几近之。两者一定程度上逸出“君——民”的格局，并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格调，形成所谓的“士人社会”和“市民社会”。晚清各种群体的结构化程度如何？“社会”发展程度怎样？这是决定康有为应用“社会”概念的前提。没有“社会”或“社会”不发达，则社会进化无从谈起。康有为以为“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社会”作用甚巨，“善合其会则强，不善合其会则弱”。泰西各国和日本强大的原因正在于听民“开社会”。<sup>⑩</sup>中国则因“专制政体之梗”，人民缺少组织“社会”的自由，所以落伍。中国要自强，要从开会讲学

始。总之，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主张以“社会”促进自强，尚未形成如《大同书》所描绘的社会进化图景。撰写《春秋董氏学》之前，康有为可能已经接触或了解进化论，但这和信奉并运用该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春秋董氏学》表明，康有为的进化思想与西方进化论是有出入的。周予同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指出这一点，但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按《礼运》原义，是由大同世演变为小康世，依社会进化论者的主张，《礼运》是合理的，即由前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演变到有阶级的私有财产社会。康氏却反其道而行之，误认原始社会（即前阶级社会）为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歪曲了《礼运》的历史观，而且违背了社会进化的原则。<sup>⑪</sup>

第三，康有为至迟在撰《中庸注》时已接受西方进化论。这就有必要回顾康有为“三统”、“三世”的发展过程。按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卷五《改制三统》下所加的按语：“每一世中，皆有三统。此三统者，小康之时，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别有三统。此篇略说，其详不可得闻也。”康氏以为“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孔子的大义尚可推求，微言则非口耳相传不可得，故尔更显神妙，暂且不表，这正好说明康氏的乌托邦尚未构架完整。1901年，康有为避居新加坡槟榔屿，撰成《中庸注》，揭开了“太平之世，别有三统”的神秘面纱：“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世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sup>⑫</sup>至此，可断言康有为已经接受了西方进化论。

## 二、康有为的民主观与平等观

康有为发现，汉人传记所引《诗》、《书》，皆引经文，唯独《春秋》，汉人所引皆《春秋》之义，不引经文。而按《孟子》说法，《春秋》重义不重经文。可见“遗经者，其文则史，于孔子之义

无与。”若从经文求孔子大义，其结果或者像王安石，讥《春秋》为“断烂朝报”；或者如朱熹，干脆另起炉灶，改宗四书。为此，欲通经只能信口说。口说以谁为宗呢？孟、荀虽号称“亚圣”，犹未能传孔子口说；只有董仲舒得到“师师口传”的真义。《春秋繁露》的权威性更确信无疑！当然，信口说而不信经文，是建立在已经摧毁刘歆伪古文基础上的。《新学伪经考》完成了这项工作。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春秋董氏学》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有一脉相承关系的。

既已论证董仲舒得自孔子真传，康有为便俨然以董氏，更进而是孔子的代言人自居。他模仿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教旨，开始大胆地推补、引申、附会，撕下了前三卷那种小心翼翼的伪装。孔教原教旨主义者形象毕现无遗。对孔教原教旨的阐述集中于卷六，因此下文集中分析卷六。

卷六《春秋微言大义》。康氏认为此卷“真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寄”。<sup>⑨</sup>所列出的概念把孔子思想统括无遗，诸如“元气阴阳”、“天人性命”、“三统三纲”、“仁义中和”、“治化养生”等等，都“穷极之始，探本混茫。”通过它可窥见孔子制作之本源和次第。其实，所有孔子思想都是康氏本人的“夫子自道”。本卷共列孔子重要概念 90 则，60 则作了按语，占本卷条目的 2/3。

本卷分上下两部分。卷六上共列概念 29 条，对元、阴阳、五行、天、人、命、性等孔子常用的基本范畴作摘录、引申。多次用孔子思想整合佛教、耶教、波斯古教甚至当时的化学家学说。可证康氏已成为一名狂热的孔教原教旨主义者。

首先列出概念“元”。康氏曾在卷一标出“仁为天心”，在《元》后按语：孔子之道本于元，以元统天地。继把“仁”归功于天之后，康氏又在天之上套一个“元”来统天。不消说，康氏在模仿基督教，“元”即耶教中的“上帝”。在天地之前，还有一个全能的主宰“元”。康氏心目中的孔子便充当了“上帝”的角色。难怪在《人元在天前》按语中，康氏对耶教教义、儒生和佛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剽窃孔子教义。《阴阳》按语，又以波斯古教主祢乐阿士对阴阳的看法与孔子暗合。《气化》按语，康氏断言：“今之化学家”亦不能逃出孔子的

手掌心。难怪王国维尖锐地批评康氏此举“大有泛神论之臭味。”<sup>⑩</sup>

《天地人》按语则把康氏的创教思想和盘托出：“诸教皆有立教之根本”，孔子立教宗旨在“贵仁”。卷六下对“仁”作了详细阐发。

基督教教义暗含民主、平等思想，是西方民主传统的来源之一。按常理，康氏模仿基督教似乎应该得出西方传统中的民主和平等思想。然而事实却相反，多年阅读《万国公报》并未改变康氏思想中的伦常观，康氏并不主张西方意义上的平等和民主。

《本天》按语中，康氏解释了人不能平等的“苦衷”。人人都是天所生，人人都为天之子。为何只有王者称天之子，而庶人只能称母之子呢？人人以天为父，那么人人都将不事其父。为了保持伦常，所以立父为子之天，天为父之天，天为万物之祖。父子不平等，是为保卫伦常，不得不如此。

在《本天》另一则按语中，康氏把性命、知觉归于天，以人类形体模本于祖。所以要享帝以报性命、知觉之本(天)；享亲以报形体之本(祖)，若只父天，则众生诚为平等，必将以父母等同万物，则义不平，无厚薄、远近之序，事必不行。若但父父，则身家自私，必将以民物置之度外，则仁不平，将启争杀之祸，道更不善。综合考虑，只有以天为祖、立等差而行之，才能“仁至而义尽”。显然，康氏骨子里还是认为儒家伦理之道优于西方的平等思想。至于民主，中国自己就有悠久的传统，何必照搬西方？康有为以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作为变法的资源，在卷六下有详细阐述。

如果说卷六上，康氏重在阐发孔子的原教旨，那么卷六下，则是在仁、义、礼、智、信、名、统、王、夷狄等众多孔子习用的范畴中穿插着康氏的变法内容。不很明显，只是在闪烁其词中提出几则变法方案。康氏是公羊家，变法思想主要来自公羊学说。但综观全书，康氏变法思想资源较为杂乱，其中还夹杂道家无为而治等许多儒家以外的思想。大同则是最后理想。

变法思想较明确地在卷六末提出。重要概念重新诠释之后，康氏在《变易述顺》按语中指出“变法欲述顺而行，勿强骤之。圣人之道为示万世，不

以期月”。康有为赞同渐进的改良，反对激烈的变革。这也是“变法”二字在笼罩全书的经学语言中的第一次亮相。《春秋董氏学》全书是传自孔子的微言大义，而卷六则是微言大义中的精粹，是全书的核心。分析康有为思想，本卷应该作为一个重点。

康氏远承公羊学以德易暴、易姓革命的传统。

《王》按语：“天下归往谓之王，人人归孔子，不可谓非王矣。人人欲叛之，虽戴黄屋，谓之独夫。”以民心向背评判独夫与王，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不君》按语：“孔子以天下之民生养覆育付之于君。不能养民，则失君职，一也。辱而失仕，已为不君，二也。若令不行、禁不止，臣民不为用，立君无实，谓之独夫，三也。况残害其民，直谓之贼。”故而《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更加直接地说“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

康氏以为，所谓“民主”的发明权当属孔子。

《圣王》按语：“民亦民主之号，孔子早立之。”（大同译书局刊本无此句，今据万木草堂本所加）康有为实不懂西方的民主，所以他理解的“民主”只是荣誉性的称呼，只要“民”与“帝”、“皇”、“王”并称就是“民主”。卷五《九皇五帝》按语：“民与王、帝、皇并称，则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康有为也不理解西方的权利，“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民分也”。<sup>①</sup>判断君主贤明与否的标准是为公或为私，《王道》按语：“不敢有君民之心，盖圣人以为吾亦一民，偶然在位，但欲为民除患，非所以为尊利也。此为孔子微言。后世不知此义，藉权势以自尊，务立法以制下。公私之判，自此始矣。”

从以上论述可见，康有为的民主、民本思想不过要求君主自上而下对民实施仁政而已。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君主的德行之中，或者只是被包摄于君主的裁量之中，故而民还是一个“无主体”性的存在。康有为的民本思想，本质还只是君主的思想。更进一步说，就君主方面而言，民本思想只是灵活的维持君主绝对的专制政治，或者是使之复苏的类似于安全阀式的一种思想。即使勉强地从民这方面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乞求君主施与仁惠而已。<sup>②</sup>

《权势》按语，康氏对《春秋繁露·王道》“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作了大肆发挥。康氏写道：

“孔子改制，皆本权势”，“势生道，道生理，理生礼”，“势者，道之父，而礼之曾祖也。”

变法前夜，康有为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传统中寻求资源。“直捷明诚，活泼有用”的王学当然是重要一途。“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且可避祸。”<sup>③</sup>殊不知先王统治术多为“外儒内法”，所以我们还要注意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另一面，即法家因素。“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力，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法家“竞力”的历史观永远是前进的，强者力胜弱者，又被更强王者所败。如此循环，历史表现为不断追求强力的线性上升过程。康有为深知，要实行新法必须依靠雷厉风行的君权。康有为戊戌奏议最关键一条是在宫内开懋勤殿（后称制度局），作为对抗西太后的另一个权力中心。设立制度局正是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与守旧派政治斗争的焦点。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变法前夕，康有为已成为一名新权威的鼓吹者，《春秋董氏学》正是该理论的最好表达。近代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往往让位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康有为借用法家语言，鼓吹权威，颇富启发性，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戊戌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却几乎无人反法家。两者“内在理路”一致，意味深长。

从康有为变法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来看，传统还有相当可观的调适能力。史华慈的论断“在19世纪末以前，许多所谓的‘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内。”<sup>④</sup>揆诸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大致可以成立。

①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4—387页。

②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25、32、36页。

③朱维铮：《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④汤志钧：《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⑤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参见姜义华：《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0—

761、812页。

⑥周予同：《大学与礼运》，见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419页。

⑦康有为：《中庸注》，楼宇烈整理《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页。

⑧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见姜义华：《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⑨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4年，第123页。

⑩[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⑪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第267页。

⑫[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上接第66页）展，必须针对环境障碍，采取必要的措施，其包括：（1）简化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减少审批环节和时间。（2）克服对外资并购的片面认识，在充分认识外资并购投机性、危及经济和产业安全等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国家产业安全法》等，消除对并购、控股权的认识误区。（3）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资并购的交易平台，培养国际性的中介机构和人才；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指导下，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培养国际化的金融中介。（4）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打破干部人事终身制，鼓励人才流动，主要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员工和经理人员失业问题。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环境障碍的消除，最终有赖于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和不断的改革开放，从而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市场机制，促进外资并购的发展。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有关会议文件。

②课题组《外商在中国跨国并购投资政策分析》，《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

#### 参考文献：

P.S. 桑普萨那姆：《兼并与收购》（影印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陈共、周升业、吴晓求主编《公司兼并原理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洛林主编《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

陈穗彬：《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问题解析》，《国际经贸探索》1997年第3期。

白玖等：《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入世”并购中的对策》，《福建论坛》2001年第3期。

张志元：《外资来华并购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宏观经济管理》1997年第7期。

宋小佳：《对外商直接投资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的探讨》，《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

邵东亚：《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南开经济评论》1997年第3期。

孙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弊端及对策》，《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 我国狱政思想及其发展特征初探

万安中

(广东省司法警察学校高级讲师, 广东 广州 510430)

[摘要] 狱政思想, 随监狱的产生而逐步形成和完善, 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 狱政思想的发展历经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由野蛮至文明的过程。第二, 其受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表现为两者密切相关。第三, 狱政思想的内容体现了深刻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质。第四, 狱政思想的发展, 从根本上影响着监狱立法和监狱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关键词] 狱政思想 监狱 监狱立法 监狱管理制度 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93-04

狱政思想作为监狱管理的指导原则, 是监狱立法和监狱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依据, 它随监狱的产生而逐步形成和完善。因而, 对狱政思想的认识和研究, 足可明晰监狱历史的发展。

## 一

我国监狱源于夏朝, 然夏朝的监狱主要是泥土筑成的围墙, 是一种很原始的形式, 所谓“圜土, 狱城也”。(《周礼·秋官·司圜》郑玄注)而且, 夏朝的刑罚制度, 因受野蛮的原始习惯影响, 主要以“残毁身体之刑”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 故未能形成狱政思想。商代是奴隶制监狱狱政思想立就的启端, 由于神权法思想渗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 使商王对臣民的一切惩罚和镇压措施, 都被涂上神秘的色彩, 言之为“代天行罚”。有关狱事, 无论是监狱的设置, 实施关押手段, 还是预防和镇压监狱中的反抗行为, 往往都采用占卜的方法, 向神问事, 然后由商王察看兆情, 判断吉凶, 假托解释和传达上天的意念来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赤裸裸的监狱暴力外, 以“神意”的灵光予以粉饰, 极有欺骗性和威慑力。

至西周, 鉴于商王朝败亡因推行重刑之故, 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观, 狱政上则表现为“刑以弼教”的思想。由此, 西周统治者建立了“圜土制”。圜土的作用即为: “以圜土聚数罢民, 凡害人者, 寘之圜土而施

职事焉, 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 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周礼·秋官·大司寇》)又有“司圜掌收教罢民, 凡害人者弗使冠饰, 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 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周礼·秋官·司圜》)圜土收教之人, “施职事”、“任之以事”, “以所能役使土”, (《周礼·秋官·大司寇》郑玄注)一般不戴刑具, 但不允许其佩戴饰物, 并将其罪行公诸于众加以羞辱。这种耻辱刑式和强迫劳役是西周统治者实行教化的主要手段, 目的在于通过刑法与教化相结合的手段, 利用奴隶制宗教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渗透, 达到“惟民其毕弃咎”, (《尚书·周书·康诰》)“令人幽闭思衍”。(应劭《风俗通》)

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 狱政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 韩非的“以法为本”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被秦朝采纳, 成为秦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秦统治的30余年中, 实行“贱仁义之士, 贵治狱之吏”(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之制, 专任刑罚, 重用狱吏。在“行刑重其轻者, 轻者不治, 重者不来, 是谓以刑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的重刑理论支配下, 其刑罚思想是“繁法而严刑”, 狱政思想为“广狱而酷罚”, 从而形成“刑者相半于道, 而死

人日成积于市”，“赭衣塞路，圜圉成市”，（《汉书·刑法志》）“劓鼻盈索，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盐铁论·刑德》）的严酷局面。

在“天下苦秦酷法久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汉统治者“与民更始，除秦苛繁”，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和“宽缓刑狱”的狱政思想，具体表现是“恤刑、悯囚”原则和“秋冬治狱、春夏缓刑”等制度的提出和实施。所谓“恤刑”即“慎刑”，一是对尚未判定的狱案，特别是疑案，要谨慎，务使不滥不失，刑罚得中；一是对已经判定的狱案，也要本着“任德教而不任刑”，“以仁义教化为主”的精神原则，体恤或宽容囚徒。如景帝后元三年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亦令：“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捕，皆不得系”。（《后汉书·光武帝纪》）此外，还有法外行仁，尚未成为定制者，如死囚无子允许妻子入狱和放囚归家等。“纵囚归家约期还”，是汉代每年伏腊之时及特殊情况下，允许系囚暂时回家，但必须按照约定期限返回监狱的规定。汉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形成的。秋冬治狱，一方面是“春生秋杀，重德轻型”思想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是“劝农”的需要。所谓“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农桑，弘致劳来。……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后汉书·章帝纪》）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从逮捕、审判到处决，多在秋冬进行。可见，汉代“宽缓刑狱”的思想，由法家镇压的一手变为欺骗和镇压的两手，其披上了儒家仁政、德政的外衣，染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

经过各代王朝的治乱交替、兴衰相继的漫长岁月，封建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唐太宗李世民汲取了隋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对狱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太平御览》中记载：唐太宗“行次虚石县，指狱而谓皇太子曰：……滥杀无辜则政道缺，久濡有罪则怨气生。圜土之中仰视青天，有同悬镜。而鞭

械肤体郁结其中，循诸己者可以知人。传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唐朝录囚制的发展，颂系令的颁布，决狱程限的规定，悯囚制度的完善，皆是仁恕慎刑思想在狱制贯彻中的具体体现。宽仁治狱的思想，本来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仁政”以及“德主刑辅”在狱政上的具体运用，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明智的狱政理治，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后来历代封建皇帝所推崇。

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采纳了丞相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建议，把军权、财权以及狱政在内的司法权一并收归中央，置皇帝的严密控制之下。宋真宗时期，为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颁布敕令：“王者，法天讨以制常刑，类震曜而为威狱”，（《宋大诏令集》）为皇帝控制狱政大权涂上了一层神权的色彩。徽宗时代，也曾明令宣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宋史·刑法志》）对狱政权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加强狱政集权进行监狱镇压的同时，宋统治者还辅之以恤抚的手段，标榜所谓“布德恤刑”，主要表现在录囚宽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乾德四年，宋太祖“亲录开封府系囚，会有者数十人。”（《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一）宋太宗继位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各地的狱政工作，把录囚扩大到两京与诸州长吏的范围。开宝二年五月，宋太祖在“每亲录囚徒”的同时，下诏命令两京及诸州长官督促狱掾每五日一虑囚，“自是每仲夏申赦官员，岁以为常。”（《宋史·刑法志》）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重申“诸州长吏五日一虑囚”。（同上）雍熙年间又严格规定：“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系禁日数以闻”。各级官吏录囚实质上是皇帝亲录囚徒的延伸，丝毫也没有改变皇帝直接控制狱政大权的性质。正如太宗所言：“朕录囚徒，殊不觉劳，但座少时耳，如中外臣僚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三）可以看出，宋代广录囚徒，完全是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是维护皇帝控制狱政权的需要。

采取仁恕与重刑相结合的原则，是明朝封建狱政管理的基本思想，而重典治狱是明朝区别于前代的狱政特色。明太祖认为，元末纲纪散乱，“吏得



为奸，民不到治”，是缺乏教化的结果，因而，“立国之初，必先正纲纪”。在斥责严刑峻法的主张时明太祖强调，“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恶卫善”，（《明太祖实录》卷六五）认为不可效法秦之酷刑，以致“囹圄成市，天下怨叛。”（同上）他还对刑部尚书晓以治国之理，以为善于理国者必是仁义、刑罚并用，若是“舍仁义而专务刑罚”，就是“以药石毒人”，不能算是“善治”。（《明通鉴》卷五）明太祖的这种仁恕与惩罚相结合的总体思想衍伸在立法、司法、狱政各个方面，明朝的审判、录囚制度、监外执行制度、悯囚制等，都反映了这种立法治国的基本观点，而他所提出的“大狱当面讯”、“狱无囚人”（《明史·刑法志二》）的思想，对于明朝监狱管理的加强和完善更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为防止官吏轻重失度，构陷成狱，冤枉无辜，明太祖对重大狱案采取审慎态度，认为狱讼的审理要明慎公正，罚当其罪，否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天必怒焉。”（《皇明制书》下）这种思想落实到司法狱政的实践中，就是皇帝亲自审理一些重大案犯，而不委诸法司，并且根据“面讯”的宗旨，又发展了遵照皇帝旨意而组成的会官审录制度，以讯察狱囚，平冤纠错。

然而，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是面对“民狙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明史·刑法志一》）的社会状态，明又特别强调“刑乱国用重典”。在明代主要法典《大明律》和《明大诰》中始终贯彻了以猛治国、刑用重典的原则，有关监狱诏令和监狱也偏于苛重。特别是明成祖以后，由于宦官专权和厂卫特务监狱的设置，更形成“屡行大狱冤者相属”，“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的残暴统治。重典主义从而成为明监管理制度及管理实践的指导原则。

清代末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狱政思想逐渐形成。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代表提出了在不触动旧有封建制的前提下，学习西学的主张，认为西方治狱不用刑讯是有法制和教化的表现，指出中国用刑治狱，“其残酷无人理”，若不变化，仅改其末而舍其本，“富强之效日远矣”。在该狱政思想的基础上，引出了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的监狱改良，即改建新式监狱，提倡自由刑規制，主张

“以感化为归宿”的感化主义以及少年犯罪改用惩治处分等观念的提出。

北洋军阀将清末的旧监原封不动地接管过来，形成了以封建军阀独裁、割据为基本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监狱制度。镇压人民，维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同时进行政治欺骗是其狱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国民党政府和北洋政府在专制统治上是一丘之貉。因而，法西斯的恐怖性，野蛮和落后的封建性，具有欺骗性质的资产阶级虚伪性以及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性，是其狱政思想内容的核心。

## 二

狱政思想的产生、发展乃至逐步成熟，在中国监狱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也展示出其固有的重要特征。

第一，我国狱政思想的发展历经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野蛮至文明的过程。监狱产生时，统治者只是利用这个专政的国家机器来恐吓和镇压民众，这时的狱政思想，就必然是没有任何外衣、不加任何隐饰的暴力镇压。但随着统治阶级经验丰富，“以儒为主”的政治思想渗入狱政思想中，从而使狱政思想逐渐复杂化，同时也显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文明。自汉至唐宋明清，统治者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予民以休养生息。在狱政上，改变了秦朝那种“以法治国”，崇尚威吓的监狱管理制度，引礼入律，礼刑并用，标榜“以礼为本”，起到了法峻刑严所起不到的欺骗作用。但不管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监狱，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监狱，其狱政思想虽形式有别，但实质却大同小异，都是为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镇压人民的目的。

第二，我国狱政思想的发展，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深刻，两者密切关联。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在狱政上，周王也一改过去各王朝以惩罚和残杀为主要手段的监狱统治，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观和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狱政思想，体现了奴隶制极盛时期的时代特点。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到强化，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以法治本成为秦朝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狱政思想上表现为广设

监狱,对各种“犯罪”进行极为残酷的镇压,造成了摇手触禁,动辄陷刑,“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的现象。五代时期,政权交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政治制度混乱,社会经济停滞不前。这就给法律制度造成了混乱,严重影响了以儒治狱狱政思想的实施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代统治者对监狱实施军事管制,任用嗜杀成性的军校掌管审判与狱政,致使“州镇专杀,而司狱者轻视人命”。又如宋朝,皇帝控制封建国家一切军政、狱政大权,因而其狱政思想几乎都被印上皇权的色彩。

第三,狱政思想的内容体现了深刻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奴隶制社会的监狱及其狱政思想体现了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阶级实质。无论是商王朝报复主义和恐吓主义的狱政思想,还是周代恩威并用的狱政思想,皆为统治阶级专政服务。因而,我国古代各朝监狱,“视囚人为异物”,“待之如禽兽”。汉、唐、宋、明,虽有“德主刑辅”狱政主张的出笼,但还是从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者在法律和狱政制度中还明确规定保护官僚贵族等级特权的法律原则。秦朝的法律规定:“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拘桎梏”,而“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赎皆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拘桎梏,将司之”。(《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朝的人犯一旦入狱,无论是否有罪,罪重罪轻,几乎都失去了生命保障,从封建皇帝到监狱吏卒,皆可采取种种手段,在监狱中非法杀人。秦之监狱成了封建统治者实行严刑酷罚镇压人民的工具。汉朝官僚贵族犯罪系狱,也同样享有特殊优待。汉惠帝元年诏曰:“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汉书·惠帝纪》)唐朝的律令也明确规定封建等级及特权原则。皇族犯罪,不按常法处置,而是“刑于家室”、“幽于别所”。一般贵族或官僚犯罪入狱,可享受特殊的待遇,实行“贵贱异狱”的原则。而普通百姓入狱,统治者则可任意虐杀。如唐武则天时,酷吏索元礼、周兴和来俊臣等人,制造许多可怕的刑具。审案时,列出刑具,让被审人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并广加牵连,构成大

狱。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宋代还出现了一种“狱空”制度。地方长官为标榜政治清平,得皇帝之奖励和提升,往往将狱中犯人一概处死。清朝统治者为了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则大兴文字狱。

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统治的监狱同样从威吓主义刑罚思想出发,实行种种野蛮和愚昧落后的监狱管理方法,残暴地镇压敢于反抗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广大群众,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成了暗无天日的杀人魔窟。据公布的材料透露:直隶第一监狱及其分监1921年就有234人死亡,1922年死亡109人。山东第一监狱三年内共有120人死亡。山西第一监狱1921年犯人死亡率占押犯总数的10%。江苏第二监狱该年犯人死亡率高达20%。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看成是动摇其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更是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间,死于监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难以数计。这充分暴露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监狱,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利益,而不惜奴役和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

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因有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的统治,故在其监狱统治的狱政思想中,明显包含着民族性质。如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和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统治,因狱政思想具有民族歧视的性质,因而在法律制度和狱政管理上,民族差异性极大,蒙古族或满族在司法和狱政方面享有各种特殊权益,而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则饱经各种难以忍受的凌虐,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第四,狱政思想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着监狱立法和监狱管理制度的建立。秦代,在法家狱政思想的基础上,秦律也应时而生。而秦律的主要特点,是以刑法为主体,以重刑主义为指导,制定了残酷的刑罚体系。由汉代始,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的进步思想渗入到狱政思想中,因而,各封建王朝所设置的立法及监狱制度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变化。如唐律,就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宗旨。唐代的监狱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备,像禁囚制度、狱具制度、狱囚衣粮及医药(下转第131页)

# 岭南武术历史发展的若干反思

——读《(光绪丙申)大清摺绅全书·御前侍卫》札记

汪叔子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410)

[摘要] 本文从岭南籍清廷“御前侍卫”人数之多、广东悠久广泛的尚武习俗及珠三角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等几方面反思了岭南武术历史发展的情况, 并指出所存在的不足及改革的必要。

[关键词] 岭南武术 御前侍卫 武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097-08

## 一、岭南武术:“大内高手”的历史辉煌

《大清摺绅全书》, 或谓《摺绅录》, 是载录清代全国在职官员的名册。因为官场人事变动经常发生, 所以一年半载甚或隔一个季节, 便需要改版重印。

笔者兹选取的, 是晚清时期由京师“荣禄堂”书铺刻印, 清光绪丙申(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夏季版的《大清摺绅全书》。检阅其中《御前侍卫》这一章, 以期验核: 岭南地区武术的历史根柢, 究竟雄厚到何等程度?

“御前侍卫”即武侠小说里屡屡称道的“大内高手”。笔者根据该版《大清摺绅全书》的《御前侍卫》章, 参考其他史料, 制作成如下两份表格。

从这两份表中, 可以统计到当时岭南籍的“大内高手”达62名(广东53名, 广西9名), 占所记载的清宫侍卫363名的17.07%, 超过1/6。其比例, 高于所有的其他省区, 而独占鳌头。

清朝原来的规制, 宫廷侍卫最初都只由满人担任。从皇帝自己亲率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之中, 挑选忠勇子弟, 名曰侍卫; 也挑及若干宗室秀彦、外藩侍子, 轮班负责警

卫。后逐渐定为制度, 每五年一次从满大臣子弟中挑选侍卫。康熙年间, 开始兼从武进士中擢拔侍卫人选。雍正四年(1726年)也定为制度: 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武状元), 授头等(一等)侍卫(正三品); 一甲第二名(武榜眼)、第三名(武探花), 授二等侍卫(正四品); 二甲拣选若干名为三等(花翎)侍卫(正五品); 三甲拣选若干为蓝翎侍卫(正六品)。因此, 清

表1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季

清宫侍卫籍贯分省统计表

| 籍贯  | 头等侍卫 | 二等侍卫 | 花翎侍卫 | 蓝翎侍卫 | 总人数 | %     |       |
|-----|------|------|------|------|-----|-------|-------|
| 岭 南 |      |      |      |      |     |       |       |
| 广东  |      | 1    | 25   | 27   | 53  | 14.60 | 17.07 |
| 广西  |      |      | 3    | 6    | 9   | 2.47  |       |
| 直隶  | 1    | 4    | 25   | 30   | 60  | 16.52 |       |
| 河南  |      | 1    | 17   | 19   | 37  | 10.19 |       |
| 山东  | 2    |      | 9    | 18   | 29  | 7.98  |       |
| 福建  |      | 2    | 12   | 14   | 28  | 7.71  |       |
| 江苏  | 1    | 1    | 12   | 12   | 26  | 7.16  |       |
| 东 北 |      |      |      |      |     |       |       |
| 满洲  |      |      | 4    | 5    | 9   | 2.47  | 5.23  |
| 汉军  |      |      | 6    | 3    | 9   | 2.47  |       |
| 奉天  |      |      |      | 1    | 1   | 0.27  |       |
| 四川  |      | 3    | 4    | 11   | 18  | 4.95  |       |
| 顺天  |      |      | 7    | 10   | 17  | 4.68  |       |
| 浙江  |      |      | 5    | 9    | 14  | 3.85  |       |
| 湖南  |      |      | 3    | 7    | 10  | 2.75  |       |
| 安徽  |      |      | 4    | 6    | 10  | 2.75  |       |
| 江西  | 1    |      | 2    | 5    | 8   | 2.20  |       |
| 云南  |      |      | 3    | 4    | 7   | 1.92  |       |
| 陕西  |      |      | 1    | 5    | 6   | 1.65  |       |
| 山西  |      |      | 2    | 3    | 5   | 1.37  |       |
| 甘肃  |      |      |      | 4    | 4   | 1.10  |       |
| 湖北  |      |      | 2    | 1    | 3   | 0.82  |       |
| 总计  | 5    | 12   | 146  | 200  | 363 | 100   |       |

表2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季清官侍卫处岭南籍侍卫名录

| 省  | 籍贯     |      | 姓 名 | 武会试中式进士    |               | 授任官职 |
|----|--------|------|-----|------------|---------------|------|
|    | 府(直隶州) | 县(州) |     | 科          | 甲             |      |
| 广东 | 广州府    | 南海县  | 刘凤翔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番禺县  | 陈元威 | 甲戌(同治十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陈国超 | 丁丑(光绪三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黄瑞祺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东莞县  | 杜龙光 | 辛未(同治十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叶镜海 | 丁丑(光绪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郑辅良 | 丁丑(光绪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卢栋森 | 丙戌(光绪十二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叶添孙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宁遇吉 | 甲戌(同治十三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罗龙骧 | 癸未(光绪九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方以衡 | 癸未(光绪九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尹燮培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刘应森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王朝柱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杜逢春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新宁县  | 李家俊 | 壬辰(光绪十八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李膺扬 | 庚寅(光绪十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增城县  | 汤定祥 | 丙子(光绪二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香山县  | 何乃斌 | 丙戌(光绪十二年)  | 三甲<br>第三名(探花) | 二等侍卫 |
|    |        |      | 邝瑞龙 | 辛未(同治十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杨殿璋 | 甲戌(同治十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杨树康 | 庚辰(光绪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高寿祺 | 癸未(光绪九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黄占元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李平西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李荣标 | 庚寅(光绪十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新会县  | 林国俊 | 辛未(同治十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陈英桐 | 丙子(光绪二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三水县  | 麦鸿威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新安县  | 姜曜杨 | 甲戌(同治十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肇庆府    | 高要县  | 林焕忠 | 丙戌(光绪十二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新兴县  | 陈荣康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顾增康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开平县  | 谢鸿元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鹤山县  | 李殿雄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罗定直隶州  | 罗定州  | 陈连虞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西宁县  | 邓正彪 | 壬辰(光绪十八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邓卓藩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惠州府    | 归善县  | 罗家杰 | 壬辰(光绪十八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陈鸿章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博罗县  | 姚朝英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李国标 | 庚寅(光绪十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潮州府    | 潮阳县  | 郑炳高 | 丁丑(光绪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 马鸿飞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嘉应直隶州  | 惠来县  | 陈浩  | 壬辰(光绪十八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房殿魁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高州府    | 嘉应州  | 梁廷一 | 壬辰(光绪十八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茂名县  | 邹荣标 |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雷州府    | 信宜县  | 吴国栋 | 癸未(光绪九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 海康县  | 金乃烈 | 庚辰(光绪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阳江直隶州  | 遂溪县  | 陈运超 | 庚寅(光绪十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阳江州  | 唐国璋 | 丙戌(光绪十二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广西 | 桂林府    | 临桂县  | 程葵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灵川县  | 周瑞森 | 丙戌(光绪十二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南宁府    | 宣化县  | 黎瑞纲 | 己丑(光绪十五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周钦元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韦文蔚 | 庚寅(光绪十六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思恩府    | 思州   | 周熊飞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梧州府    | 滕县   | 秦永年 | 丁丑(光绪三年)   | 二甲            | 花翎侍卫 |
|    | 郁林直隶州  | 博白县  | 刘汝梅 | 甲午(光绪二十年)  | 三甲            | 蓝翎侍卫 |
|    |        |      |     |            |               |      |

代前期到中期,宫廷侍卫来源,形成了两条途径:一是满族大员子弟五年一挑,这是主要渠道;一是兼从武进士中择优拣选少数,作为补充部分。

但到了清朝后期,情况起了变化。当初进关时,确乎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经过一二百年的养尊处优,越来越变成纨绔子弟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对挑选皇家侍卫的旧规开始作出更改:“嗣后如遇挑取侍卫年分,所有大员子弟,著毋庸挑列”。十年之后,咸丰元年(1851年)的上谕,说得更明白:“惟思该大员子弟内,或身体软弱,马上平常,或自幼读书,未能及时学习骑射,此辈即使挑为侍卫,又焉望其得力耶?自应量为通融办理。嗣后,情愿挑取者仍照从前呈报汇奏;倘有身弱残疾,抑或骑射平常,不能挑取侍卫,著据实呈明,听其自便”。

所以道光、咸丰以后,原本着重在满大臣子弟中挑取侍卫的制度,趋向衰微;而原先属次要途径的武科举,逐渐变成皇家侍卫来源的主要渠道,汉员的人数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大。当然,清宫侍卫处的领导班子(主管的领侍卫内大臣,协管的内大臣、散秩大臣等),以及最贴身的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等关键岗位,还是只能由满族亲贵来担任。

武科举,与文科举一样,除了恩科,一般也是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十月,中式者为武举人;会试在次年九月,考中的为武进士。每科考中的武进士少则百余名,多则数百名,从中只拣选至多约30名为皇家侍卫(武状元授头等侍卫;武榜眼、武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武进士中,一般拣选10名为花翎侍卫;三甲武进士中,一般拣选16名为蓝翎侍卫)。

而要考武进士,先要考上武举人。不过,各省武乡试的中举名额,却有多有少,并不一律。根据《清史稿》等史料:

表3 清咸丰同治时期各省武乡试中举名额

| 试区   | 顺天  | 汉军 | 奉天 | 江南 | 福建 | 浙江 | 四川 | 陕西 | 河南 | 江西 |
|------|-----|----|----|----|----|----|----|----|----|----|
| 中举名额 | 110 | 40 | 3  | 81 | 63 | 60 | 60 | 59 | 55 | 54 |
| 试区   | 广东  | 甘肃 | 山西 | 山东 | 云南 | 广西 | 湖北 | 湖南 | 贵州 |    |
| 中举名额 | 54  | 54 | 50 | 48 | 42 | 36 | 35 | 34 | 25 |    |

广东(54名)、广西(36名)的武举人的名额,在全国各省区中,只居列中下。然而,尽管岭南武乡试的中举名额并不多,却在从武进士里优选出来的皇家侍卫中,岭南籍的占到17.07%的最高比例,多过其他省籍而跃居首位。

## 二、广东“虾仔”:悠久广泛的尚武习俗

清宫的侍卫,满族语的发音,称之为“虾”。清代的吴士鉴撰有《清宫词》数十首,其中“中使传宣急召虾,乾清宫畔月笼纱”句,有自注说:“满洲语,侍卫曰‘虾’。”

满语里的“虾”(皇家侍卫),与“巴图鲁”(“拜唐阿”;勇士、英雄),是相提并举的。入选为“虾”或是“巴图鲁”,是满族人的一种崇高荣誉。只有忠诚勇敢而且武艺高强,才能获得此项殊荣与褒奖的称号。

粤方言,称小孩子,叫“虾仔”。笔者颇疑“虾仔”这称辞,极可能与满洲话里的“虾”有关系。既借取满语的“虾”的佳义,来祝福孩子,又传达出了岭南崇尚武术的风俗习惯。

广东“虾仔”的辞源,自不妨容另商榷,岭南尚武的习俗,则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越绝书》所述的“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还属于百越族(南越是其中一个分支)的普遍“常性”;那么,早如《汉书》,即已明确记载着专指岭南地区的“粤人相攻击之俗”。

再往前追溯,广东(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先秦青铜文化,遗址及墓葬以数百计,出土各类青铜器物近千件,其中即颇多青铜的斧、钺、剑、刀、匕首、矛、戈、箭镞等武器。从它们的铸造,既可以看出有大量的接受中原文化、楚文化影响的痕迹;又可以发见不少岭南的地区特点,如越式匕首、靴形钺、扁茎剑等,体积较薄,或比较小型。这都反映出当时岭南的武器制作,既是古代中国物质文明整体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与我国的其他地区频繁不断地进行着工艺技术的交流与融合,又在交融中逐渐发展起自己的薄小轻巧的地方特色。同时,也透露出,自古广东的武术演变,既与中华武术历史发展长河始终源流交融,密不可分,又在自己的区域时空的具体奔流中,也已开始形成

灵动劲捷的地方风格。

中国的武术器械,所谓“十八般武艺”,其中最看重的就是剑,剑甚至被推崇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高尚的象征:“古之君子,以剑自卫”(《孔子家语》);“君子国民,衣冠带剑”(《山海经》)。而无论剑的铸造,还是剑的技击,武术史家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首先褒扬古代百越族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若数先秦铸剑名匠,天下顶尖的三位:干将、莫邪、欧冶子,都是越国人。倘论先秦剑术名家,稳够资格能坐上伊古剑侠第一把交椅的,也是百越族的越女。

越王勾践向越女请问:“夫剑之道,则如之何?”越女回答:“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按,应指:天门、地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剑法上升为剑道,击技深化以哲理。先秦时代的越女说剑,已经系统地进入到阴阳内外、精气神、形意道的理论高度,对于中华武术的历史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经由范蠡推荐、越王勾践聘请,越女教授越国兵士武艺,迅速提高了他们的实战能力。“越(越国、越族)以取强”(后汉士孙瑞《剑铭》),崛起成为春秋末期威震神州的诸侯霸主之一。

越女当然是越族,或者说是百越族人。但笔者的愚见,更以为越女很可能还是百越族的南方部族,即南越族。兹试举出四个理由来说明。

理由之一。史载越女“出于南林”,“生于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不达诸侯”(《吴越春秋》)。当她接受越王勾践聘请之后,“北见王”(《吴越春秋》)。即是从南方出发,向北走,到会稽(越国当时的都城)去见越王勾践。然则她的家乡“南林”,至少是在会稽以南,而且是在迄至当时尚未入诸侯版图的地区。因此很可能属于百越族的南方部族,如闽粤一带的瓯、骆等南方越族。

理由之二。传说越女北上去见勾践的途中,道逢老人,自称袁公。彼此折竹代剑,比试剑术于竹林内。越女三次攻入袁公的剑阵,最后击中袁公,袁公飞身上树,化为白猿而去。透露出越女的剑法,与猿猴有关,很可能是汲取猿猴灵动劲捷的形

意。

理由之三。从汉代的画像石“越女出南林”图上,可以看到越女在为越王勾践演示剑术时的飒爽英姿,画像石展示出她的剑法的灵动劲捷的风格,同时亦可看出她所使用的剑的形制甚短小。剑身长度,仅与其小臂长度相差无几;剑尖的刃角,且甚锐削。说是剑,实在不如说更像一把长匕首。

理由之四。对照前文述及的越式匕首等先秦文物,这类明显带有南越族特色的、薄小轻巧的武器在广东出土多,而其他省区却很少见到。又联系到至今岭南地区的武术,如拳法,久传盛行的是“南拳”,而“南拳”套路多有模拟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形象,借形取意为主,风格也重在灵动而劲捷。

至于近代以来,如佛山黄飞鸿,开设“宝芝林”药铺,擅长“无影脚”奇功;又如“广东十虎”,各有绝艺;甚至“乞丐武状元”苏灿、荔湾卖肉铺的“猪肉荣”、广州的精武会……武林高手,侠义故事,或真真假假,有真有假;或虚虚实实,亦虚亦实。(如黄飞鸿确有其人,但关于他的故事则未必皆能考证。)然而口碑不绝,久久流播,老少妇孺,无不耳熟能详。这些都反映了岭南崇尚武术的深厚且广泛的习俗,并且形成广东民间传说与民间文学的一个显著内容与重要特色。

### 三、珠三角效应: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

武术,不仅是体育,不仅是技击,也是文化。中华武术文化,流传数千年,始终没断过根。

但是,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则不妨说,实在是20世纪后几十年以来的事。

所以称之为“当代复兴”,一是因为它的被认同、被欢迎,范围之广,程度之热,持续之久,事实上已不仅遍及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而且风靡东南亚、进而扩及全球各地的华侨、华人、华裔,更越来越引起世界上众多其他民族、国家的专家学者与各界人士的文化欣赏与学术关注。二是因为它的文化内涵,在继承、发扬中华武术传统精神的同时,又不再仅仅墨守家法,而开始尝试广泛吸收异域文化,力图融入新的时代内容。这二者,都在中华武术文化史上,分明地开辟出了崭新的发展篇章。

而说到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则不能不提到



“珠三角”。正是在这里，首先开始了中华武术文化当代复兴的壮阔进程。

珠三角历来是岭南地区人文资源最集中、最发达的所在。而数千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岭南武术旺盛发展的客观历史与悠久广泛的尚武习俗为中华武术文化在这里的当代复兴，已经准备好了丰腴宽厚的肥土沃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当然，原因还不止于此。中华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之所以没有在别的地方肇起，却历史地选择在珠三角而蓬勃发端，还由于有着其他客观条件与现实因素的机缘凑合。

岭南诸水穿山透壑，汇聚于珠江三角洲而奔腾入海。珠三角以香港为外港，以广州为内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流历史，铺垫下了深厚的地理优势；祖国内地摆脱“文革”浩劫而转入改革开放，开创了千载难逢的盛世天时，珠三角更被赋以先行一步、特区政策的优先机会；港澳回归，一洗百年国耻，从酝酿到实现，令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热血沸腾，人心所向，隆兴成空前浓烈的爱国人和。

珠三角正是独擅天时、地利、人和的格外优厚，从而为中华武术文化当代复兴的在此崛起、由此突破，并从此而以燎原之势既席卷内地又风靡全球，提供了绝佳的地域背景与充足的现实机遇。

中华武术文化的当代复兴，由香港的新武打影视与新武侠小说担当了发轫的先声。

如果说，在新武打影视中，龙的传人武艺超群的角色形象，逐渐增多地已在穿上现代服装而卷入当代事务的情节；那么，新武侠小说里的众多人物，却基本上仍被安排其生活于中国古代的文史环境中，尽管他们的情感、言行、乃至理义观念，都已经愈益深刻地被打上现代、当代的明显烙印。

只是，不论这些新武打影视或新武侠小说怎样不断地在“创新”，它们所展现的功夫招数与人物风采，则始终渗透着与发扬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尤其是中华武术文化的深厚内涵。从而，它们的形象，始终与罗宾汉、达达尼尔、佐罗、007、阿兰德隆、施瓦辛格等等有着显而易见的文化区别。它们始终是“中国”功夫，是“中华”武侠。

新武打影视、新武侠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力求创新的尝试，尤其它们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本质，便是这样。

从李小龙到成龙、李连杰，以他们高超非凡的武术功底和一身正气的银幕形象，令亿万华夏同胞为之自豪和骄傲，更在世界影坛上“拔戟异军成特起”，使“中国功夫”迅速蜚声寰宇。

以金庸为首的新武侠小说，同样，不仅广阔地吸引了全球华人阅读观赏的注意力，获享着“有华人处即有金庸作品”的美誉；而且，名牌高校邀请讲学，讲到英国牛津；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开到阿美利加。

新武打影视、新武侠小说，在它们的创作与传播方面，也与珠三角结下了紧密不解的缘份。

就创作方面而印证：

其影视制作与小说写作队伍，不管原本籍贯是岭南的或是外地的，大多长期生活、工作于珠三角，深刻受到过珠三角文化氛围的影响，包括浓烈的岭南武术传统、尚武习俗的感染。如祖籍广东的李小龙的家世，有着粤剧红船戏班的浓郁熏陶。又如并非粤籍、却久居香江的金庸，其《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行侠惩恶、大闹佛山镇时，借取佛山祖庙“血印石”的传说，并特加按语，郑重声明：“吃螺误为吃鹅，祖庙破儿腹明冤，乃确有其事，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今日佛山祖庙之中，北帝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尚有隐隐血迹，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作者曾亲眼见到。读者如赴佛山，可往参观。唯此事之年代及人物姓名，年久失传。作者当时向佛山镇上文化界人士详加打听，无人知悉，因此文中人名及其他故事均属虚构。”而佛山，又正是黄飞鸿与“黄飞鸿传说”的故乡；佛山祖庙之中，近日且已专门建有“黄飞鸿博物馆”。我们从金庸自述的“亲眼见到”、“详加打听”，这八个字中，已可充分体会到他对珠三角、对岭南文化包括武术文化传统所采取的态度，是何等的积极与认真，而其了解与掌握，又是何等的仔细与深入。

从香港银幕上反复出场的“黄飞鸿”、“苏乞儿”、“猪肉荣”、“广东十虎”、“精武会”、“霍东阁”（霍东阁确在广州精武会教过武术）等等，以及从金庸作品中连续展现的先秦的越女

(《越女剑》)、东莞的袁承志(《碧血剑》)、南海之中的侠客岛(《侠客行》)、广东天地会领袖吴六奇(《鹿鼎记》)等等。我们又可以觉察到岭南地区的武术传统与尚武习俗,如何为新武打影视与新武侠小说,提供了人物和情节创作素材的丰盈源泉。

即如作品中的场景布置,乃至道具细节,也多取用岭南风格,特别是珠三角如广州、香港的近代背景,这在新武打影视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再三出现的舞狮场景,而舞的都是“南狮”(又称“醒狮”),正是岭南武术的一种派生形态。即使拍摄的像《霍元甲》一类的非粤籍人物题材的影片,而服饰、语言、布景(如骑楼、西关屋)、道具(岭南家具)等等,仍然处处展露着岭南的,尤其是珠三角的文化(包括武术文化)色彩。

以上是从创作方面来说。创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构思,乃至时空背景、文化底色,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的、由岭南尤其是珠三角的文化土壤所供给的丰富营养。

再就传播方面加以印证:

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50年代已经萌发生长的香港新武打影视与新武侠小说,曾中隔有数十年的时间,没能进入内地放映与出版。直至80年代初,才开始向祖国内地地区的流传。1980年,正是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首次在内陆正式公开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从此以后,“金大侠”的各种作品,才迅速跃入内地销售量最高的出版物行列。新武打影视,最早如电视剧《霍元甲》等,也是先经由珠三角,而后转向其他省市广泛播放的。“万里长城永不倒……”(《霍元甲》主题歌),同样先从珠水两岸唱起,一时唱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真可谓中华武术文化当代复兴的一次大普及、大动员。而在这个意义重大的传播过程中,珠三角尤其是它的内口广州,充分发挥了其“南风窗”的特殊功能。这是对内的传播。

对外,则更多地通过珠三角的外口即香港为主要窗口,以“中国功夫”、“中华武侠”的文艺形象,向全球的华侨、华人、华裔同胞,并向世界其他国家、各民族,传播着中华武术文化,激起了广

泛热烈的而且持续的回响。

#### 四、世纪前瞻:发扬传统与改革奋进

回顾既往,足以令岭南人引为自豪,并且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弘扬岭南武术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岭南的武术文化,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也必须予以正视,予以重视,予以改革,才能保证我们而今以后对岭南武术文化的发扬光大,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奋进。

从历史上来看。

中华武术发展几千年,进入到近代,曾经遭遇空前未有的挑战。

1836年8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编、出版于广州的英文期刊《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今译《中国文库》)第五卷第四期上,便登载有一篇由洋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技巧和能力的描述”的通讯报导。

这位洋作者,首先列举了西方“近日蒸气机的进步和它在战争中的应用,如大气船、用蒸气弹力发射的炮,及托普斯先生所发明的迫击炮”,炮膛平滑的“欧洲大炮”,“名符其实的海军大炮”,等等先进器械;并取与当时中国只有古老的火炮、劣质火药、笨重木舰等落后装备进行对照。而他对中国的种种描述,实际的观察地点就是广东与广州。

接着,这位洋作者写道:“中国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火绳枪、剑和矛”。

“中国的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火枪、卡宾枪、手枪和其他的火器都不用。

“弓……箭制作优良……这无疑是他们武器中最有效的一种。像他们告诉马戛尔尼那样,是‘具有高度评价的’。

“剑有两种:一种是直的、重的、两刃的(像罗马剑),大约两英尺长;另一种比较长些,弯曲像军刀。两种剑的柄都简朴,无护手。

“我们所见到的一般都是重武器,用普通金属制成,粗糙无光,比外国人所用的差得多。短剑与小刀似乎不用于战斗,但各种矛和枪却常用。枪矛

的柄用竹或硬木制，长十至十四英尺。还有一种好像戟或洛克伯斧的东西，以及安嵌在竹干末端半月形的镰刀，刀身弯出或弯入，刀口磨得很锋利。这些枪与矛刀大都作为保卫家乡的武器，而很少使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所谓双剑有时也被使用；它的长度不比一把大短刀长；一面平滑，使两者能合拢放进鞘里。剑柄阔，而逐渐向剑下端逐渐狭窄。作战时兵士拔剑出鞘两手各握一把挥舞着。”

这位洋作者于是断言：“中国人，这个民族是孤芳自赏、愤世疾俗、目空一切的幻想中养育而成的，他们把其他在文化、艺术、资源、勇气及武事上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民族都看作比他们不如，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常；这使我们不免要注意到它的长期顽固性。一旦这些‘蛮夷之邦’擦亮眼睛，就会清楚地看见，许多年来在罔然不知中向它屈膝的这个强国，它的实力比暗处中的阴影还不如哩。”

这位洋作者更狂妄地预言：“有一点我们是确信无疑的，即在一个外国强有力的直接的一击之下，它将往下倒塌”。

当然，那位洋作者的狂妄预言早已落空，我们的祖国没有“倒塌”，也永远不会“倒塌”。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历史教训。只有改革，才能重振我们民族的雄风。而这改革的内容，自然也应包括对武术的改革。

改革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1896年，清政府的“御前侍卫”、“大内高手”们，他们的“科举出身”，从武秀才考到武举人、再考到武进士，一场场考试选拔的主要内容，还是马步箭弓刀石，依然无甚变化。

不过，紧接着，情形便有大变了。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897至1898年），光绪皇帝先是据荣禄、高燮曾、胡燏芬等奏折，下诏宣布，决定今后武科不再考马步箭弓刀石这些内容，一律改试枪炮。继有张之洞、何镇圭、杨福臻等建议上谕飭令兵部汇总妥议，起草制订新的武科章程。

然而“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夺权执政，推翻新政，包括“武科改试枪炮”的改革。悍然下令，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马步

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然而，改革大势，毕竟趋向已成，迫使慈禧在搞武科复旧的同时，也不得不摆出点调和的姿态，作一些补充规定：各省营用武进士及投标武举，悉令练习枪炮；武进士被选中录用为宫廷侍卫的，则咨送去神机营，习练枪炮；所有未经入伍的武举、武生，都就近挑入各省武备学堂，学习格致舆地等学及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

形势比人强。慈禧搞武科复旧，终究顶不住历史潮流的奔腾发展。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还是只得发布诏书，称：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所有武举人、武进士，均令投标学习；其精壮之武生及向经应试之武童，均应募入伍；俟各省遍立武备学堂后，再行酌定挑选考试章程，以储将材。肇始于唐代，详密于明、清，历经千余年的武科举制度，至此遂告彻底废止。

重温了武科举的这段历史，回过头再来看本文第一章所述的《大清摺绅全书》的《御前侍卫》章。其版本时间，之所以特意择取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就因为那正是千年武科举终于不得不面临着根本改革的历史转折关头。

处在这历史转折关头的那363名从武进士中又优选出来的武艺高强的清宫“大内高手”们，而岭南籍者又在其中占着最高比例。的确，他们把千年武科举的荣耀，也把数千年来封建专制下武术的社会功能、社会地位，推上了最后的顶峰。在这里，武术已经远逾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等正常功能的范围，而被跃升为人材政治的仕宦显途，被奢望成军事战争的致胜长技，被厚托以拱护皇权、保卫社稷的异常重任。然而，此时却又无可回避地已被置于近代科技突飞猛进，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资本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面侵略咄咄逼人的世界新背景之下，这种封建末世的峰顶辉煌，于是只能被证明其实是夕阳残照。

随着武科举的旋即迅告终结，武术在封建制度下曾经拥有的或强加的社会功能、社会地位，也不得不相伴着被急剧变化与调整。历史已在严厉要

求,中华武术此时已经刻不容缓地,必须以改革的步伐走出古代,走进近代,走向现代。光绪丙申(1896年)夏季《大清摺绅全书》所记载的那363名宫廷侍卫,包括其中超过总数1/6的62名岭南籍“大内高手”,因此不再仅仅是千年武科举的最后一批金榜题名之中又优选出来的头戴最荣耀桂冠者,而且又成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最先目击与亲历中华武术近代改革的历史见证人。

再从现实来看。

建国5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武术作为体育运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飞速发展与丰伟业绩。追思往昔20世纪初的“广州精武会”,惨淡经营,教习武术,孜孜以求强种强国,欲洗雪“东亚病夫”国耻的赤诚愿望。如今,这愿望早已成为现实。今天的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中华武术正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体坛。由我国发起成立的国际武联,已有83个会员,并已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紧接着的目标就是武术作为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而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仍应看到,无论武术运动的普及还是提高,以及管理体制、训练方法、竞赛规则等方面,遵照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比照进军奥运会的目标,自觉以高标准严要求,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例如随着中国武术在全球的影响日益扩大,参与者日益增多,包括非华人的数量剧增,各国武术选手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在某些项目上甚至已超过了中国选手。又如为争取列入奥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武术的竞赛规则也必须要与国际体育常规尽早完成全面接轨。这些情况,都在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已有的改革成果,必须继续坚持改革精神,加大改革力度。

在文化的层面上,在充分肯定“武术文化热”的宣传中华人文精神、促增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积极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仍应清醒地看到其目前状况中,也犹有不少未满意之处。例如武打影视、武侠小说中往往尚杂有若干“商业化”、“无厘头”等等倾向,倘然放任其流,则将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也都须予以注意,予以引导,予以改进,使它们既扬其良益之长,又去其消极之短。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武术文化在21世纪中,以不断改革的踏实步伐,争取更加辉煌的振兴与发展。

**附注:** 本文援引及《(光绪丙申夏季)大清摺绅全书·御前侍卫》史料,为行文方便,是以文中亦屡用“御前侍卫”字样。查该《大清摺绅全书》,于京师职官,系以衙署分别载录,而其中将“御前侍卫”列为衙署,则是沿用俗称,实非确切。按,清宫管领警卫之官署,正式名称为“领侍卫府”,或称“领侍卫处”,也称“侍卫处”;设有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侍卫班领、侍卫什长、一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亲军校、主事、笔帖式等官职(其侍卫之员额,亦远不止该《大清摺绅全书》所载之363名。此363名,乃为其中之正途即武科举出身者);至于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等,乃属委派差使(工作任务)。特此说明,庶免误解,敬祈读者鉴之。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唐代佛教密宗入粤及文物考述

陈泽泓

(广州市方志馆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91)

[摘要] 盛唐时期, 佛教密宗(纯密)传入广东, 在岭南佛教界得以与禅宗争一席位, 值得岭南佛教史、思想史的研究者所注意。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沿革著述对密宗唐代入粤及有关文物较少述及, 本文因此略作勾沉稽考, 以为补充。将密宗传入唐地的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中, 就有金刚智及不空等二人来过广州, 他们在广州都有传播密宗的佛事活动, 反映了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入唐的重要口岸。今存于广州光孝寺及潮州开元寺的唐代陀罗尼经幢, 是密宗在粤地佛事活动的重要文物。不仅可以作为密教传入粤地之物证, 还可以作为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路线之重要线索。前者年代确切, 后者建造时间已有方家考证, 本文有所商榷。

[关键词] 佛教 密宗 传教活动 文物 陀罗尼经幢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105-04

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朝代, 是佛教中国教派纷纷创立的朝代, 佛教密宗也在此时传入广东。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沿革的著述对此较少述及。本文对唐代密宗入粤及有关文物略作勾沉, 以为补充。

## 一、密宗入粤

密宗又称瑜伽密宗, 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印度的佛教在其发展后期渐与传统的印度宗派——婆罗门教相结合, 形成了密教流派。密教的特征是主张身密(手结契印)、口密(口诵真言咒语)、意密(心作观想佛尊)等三密相应而行, 可以即身成佛, 求得世间的果报。他们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不能见诸文字、广泛流传, 只能对受过灌顶礼的弟子密传。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的特征, 由此与信奉佛教诸部经典的显宗相区别。我国和日本传统把印度初期佛教经典特别是巴利文律藏中所传的密咒、仪轨等等称为杂密; 把7世纪中叶以后相继成立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的教义和实践称为纯密。唐以前传入中国的密宗是杂密, 唐代起传入中国的密宗是体系性的纯密。

密宗传入广东之途径, 有间接的, 也有直接的。间接的传入是朝廷的推广和崇信密宗的官员入

粤所带动。大历十一年, 唐代宗曾诏令全国僧尼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背诵精熟《尊胜陀罗尼经》, 日诵21遍, 每年至正月一日具陈所诵遍数进上。由此尊胜陀罗尼便传遍寺刹, 密宗之风至盛, 必然波及广东。至于密宗传入广东的直接途径, 其影响也不能忽视。体系性的纯密是在开元年间由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传入中国的, 这三位高僧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 他们来华后直接翻译、弘传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的纯密, 一方面以其宣传正法护国思想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唐玄宗复兴王室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融汇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和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术等迎合了当时的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 因而得到急剧发展。值得指出的是, 开元三大士之后二者都在广州留下了传教的足迹。

中印度僧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由印度经陆上丝绸之路进玉门关抵长安, 受到唐玄宗礼遇, 被尊为国师, 设内道场, 为皇族灌顶授法, 主持译经。三年后, 开元七年(719), 开元三大士的另一位高僧金刚智泛海而来, 在广州上岸入中国。

金刚智, 南印度人。少年时在那烂陀寺求学。授《金刚顶经》密法, 又诣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

《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他自海上泛舶而来，遍历南海 20 余国，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sup>①</sup>然后赴长安“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金刚智在广州的活动未见详述，《宋高僧传》记载他“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自开元七年(719)，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戒，建曼拏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推论其在入华首站之番禺，当有于名刹建法场立坛灌顶之佛事。又据《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所载：金刚智“以开元七年至广州，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拔度四众，帝闻。迎入京师，敕住大慈恩寺。”<sup>②</sup>但未知典出自何处。又据《唐会要》，金刚智抵广州时，节度使(按，此官衔有误。岭南节度使首置于至德二年(757)，此时岭南的最高长官应为岭南五府经略使)派了两三千人分乘数百条小船，远迎海上。<sup>③</sup>此也可作为金刚智在广州必有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佐证。

不空是金刚智的弟子，北印度人，幼随叔父来华，15 岁时为金刚智弟子，敏通佛经，颇受金刚智赏识，“常令共译”佛经。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示寂之后，不空奉其遗旨，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等国求梵法。不空此行，是从番禺(广州)出发赴海上，因而在广州有一番佛事活动。“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邻’为‘鳞’误)<sup>④</sup>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诸番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智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sup>⑤</sup>于此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岭南信奉密教者之众，上自经略使，下至数以百万计之大众；二是不空在广州法性寺大摆道场，影响甚大；三是不空从广州下南海求法乘的是番人商舶，这条航线应是当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不空于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带回密教经典 200 卷，共译出重要经典 111 部，143 卷，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不空在内道场中为玄宗、肃宗、代宗灌顶受法，成为三代国师。先后被加封为鸿胪寺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赐食邑三千户，辞而不受。不空从天竺回中国的途径未见其详。天宝八年(749)诏许其回印度，

“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sup>⑥</sup>显然，不空赴印来往是取道海路，其于天宝五年返华当经广州。以不空在朝廷之地位，其途经广州必然在岭南推动崇信密宗之热潮。他在返华三年之后，竟被诏令“许其回国”，实际上是被下了驱逐令，其中原委，有关传记讳莫如深，但事出有因。《旧唐书》载这年五月，“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sup>⑦</sup>不空由广州出海取经，正是这位刘巨鳞为他大摆道场，在岭南掀起信密热潮。大概是刘巨鳞贪赃枉法，自知有亏天理，对奉佛也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狂热。他不但带头接受不空灌顶，还发动郡人欢送不空下师子国，并为其一路平安亲自出面作了安排。可以想见，不空的传教活动是得到了刘巨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刘巨鳞坐赃决死与不空同时被遣返回国，必有关联。不空最终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在岭南停留下来。他入粤北，便托病滞留不前。据撰编于同时代的《贞元录》所载，不空“发自京都，路次染疾，不能前进，寄止韶州”，显然得到王公权贵的支持，而终于获敕令且住。在岭南一住，居然长达四年，“日夜精勤，卷不释手，扶疾翻译，为国为家。”<sup>⑧</sup>其后又得以东山再起，重返京中，至于事业之极盛。不空在粤这四年的活动及译著，不见于后来的译著目录。但由此已可见其在岭南之影响非同小可。

密宗番僧从海路由广州入华，不止于金刚智、不空。北印度高僧智慧，曾在那烂陀寺学佛，发誓东传佛教，修船泛海，遍历南海诸国。德宗建中初年(780)到达广州，直至贞元二年(786)始届京华，迎入西明寺译经。<sup>⑨</sup>在广州逗留长达数年。

综上所述，唐代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的一个重要口岸。一些重要的密宗高僧在广州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对密宗入粤有重大影响。

被奉为禅宗南宗创始人的禅宗六祖慧能，圆寂于先天二年(713)。当时禅宗在岭南佛教界可谓至尊之教派，而密宗仍能在粤地引起如此强烈之反响，除了密宗在朝内受到青睐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密宗注重咒术、以法事祈雨攘灾、经文有神秘感而无显宗诸经穷尽佛理之深奥。凡此种种，于岭南人之观念易于接受。在密宗式微已久的 20 世纪 20 年代，在岭南仍有东渡日本学法、又在广东复兴密教



之风气。佛教诸宗派中，净土宗、密宗得以与禅宗在岭南争一席之地，值得研究岭南佛教史、思想史者所注意。

## 二、陀罗尼经幢

唐代密宗在粤佛事活动，遗留至今的特色鲜明的文物，是陀罗尼经幢。

陀罗尼为梵文音译，意译为总持、能持、闻持、能遮等。从词源学上分析，其最早是一个关于记忆方法的名称，原意为忆持不忘。古印度未有文字时，所有的宗教经典及世俗文献全部依靠祭司的记忆口耳相传，创造了文字之后，仍然十分重视记忆方法与记忆能力。在原始佛教中，陀罗尼最初含义仅仅限于对佛陀教法的语言文句的正确听闻和牢固记忆。到了佛教分流派时期，准确记忆对于正确理解显得十分重要，后来的经典中往往解释说：“陀罗尼者，于佛法总持不忘。”陀罗尼后来被逐渐神秘化，原有的记忆功能逐渐被淘汰，成了类似咒语一样的东西。陀罗尼在初期大乘佛教中已广泛流行，并从闻持一种扩大到多种，发展为大乘佛教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所谓方便法门)，具有很高的地位，与戒、定、慧三学并齐，成为大乘佛学的四大内容之一，并演变和直接导致了原始密教——陀罗尼密教的形成。陀罗尼在原始密教中处于中心地位。密教传入中国以后，迎合中国的传统宗教与民间宗教背景，陀罗尼经咒风行一时，建陀罗尼经幢成为密宗传教活动的一种特色标志。广州光孝寺与潮州开元寺内，现存有唐代陀罗尼经幢。

广州光孝寺大殿前庭院置大悲心陀罗尼经幢。青石刻制，通高2.02米。幢身平面八角，高1.05米，上为八角盂顶，下为莲花方座，基座四侧刻力士像。幢身各面宽0.14米，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章句内容为“大悲咒”两咒，每咒各占四面，一咒为20字，另一咒为175字。字迹多已漫漶残缺。北面款识两行，内容为：“同经略使副使将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府医博士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守康州司马宥选造此大悲陀罗尼幢”；东面一行为：“宝历二年(826)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闻人”。<sup>⑨</sup>

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月台前东边有尊胜陀罗尼

经幢。花岗岩刻制，高约4.15米，座基周径约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基座刻有佛像、护法神、蟠龙等浮雕。因日久漫漶模糊，但雄健壮美之唐风仍依稀可辨。此幢第一面首行为：“加句灵验尊胜陀罗尼 三藏法师 不空奉 诏译”。据此，所刻之陀罗尼经为不空译本。此幢经文不著明日期，光绪《海阳县志》称，“据陇州开元寺经幢，末系开元十六年，而经文同此，益足证为唐物。”<sup>⑩</sup>而据饶宗颐称：“余遍检秦陇金石书，未见有开元十六年不空咒者，未知何所据而云然也。”<sup>⑪</sup>另据潮州开元寺已故住持释慧原所考，称彼查阅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唐代陀罗尼经咒共有九种译本，不空所译只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惟一有加句灵验字样的，是金刚智译本，且两咒对校，基本相同，“故知同一译本也。复查《大正藏》中不空之译本，与石幢所刻咒文相差甚大。由是推知石幢之咒非不空所译而是出于金刚智之译本。”<sup>⑫</sup>然则慧原所列九种唐代陀罗尼经并未尽揽。笔者复查大正新修《大藏经》，见有未为慧原引列的不空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注义》、《佛说一切诸如来心兴明加持普贤菩萨延命金刚最胜陀罗尼经》、《金刚顶瑜伽最胜秘密成佛随求得神变加持成就陀罗尼仪轨》等。《大藏经·密教部》收入陀罗尼经咒有100篇，其中不空所译为34篇，占1/3，可证不空翻译陀罗尼经咒之多。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经文与金刚智所译《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两相对照既然未尽相同，窃以为不能即断其与金刚智所译为同一经文。不空既师从金刚智，常令共与译经，或者此幢为不空所译之佚文也未可定。开元寺大殿前西边与尊胜陀罗尼幢相峙有一型制相似的石经幢，1918年2月13日潮汕大地震被损，1924年重修，今幢幢座为旧物，而幢盖、幢身已换新石。幢身八面，第一面铭文为：“唐三藏大广智不空奉敕译”，第二面为：“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此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二十。经文相同。今石幢梵文为民国年间密宗教徒王弘愿所书，但未知是依原石刻重书，还是王氏按经文所书。见于《大藏经》，翻译《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同一经文的就有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等数篇译文，此或可以为《加句灵验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非仅金刚智一人所译之佐证。

关于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的建成年代,及不空译文之传入潮地,饶宗颐曾考其与常袞贬潮有关。广德二年(746),常袞与大兴善寺不空及鱼朝恩等新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供养法》一卷,(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由此,饶氏提出:“潮州开元寺内有尊胜佛顶陀罗尼经幢,为广东唐时唯一的密宗石幢,题曰不空和尚译。然唐代各地经幢一般都用波利译本,如福建泉州即据波利本镌刻,独潮州乃用不空译者,盖常袞于大历间与鱼朝恩及大兴善寺不空等奉诏译陀罗尼念诵轨仪,开元寺之有不空译加句本,可能由彼谪潮州时携来的。”<sup>④</sup>然则广东境内已知还有光孝寺唐代陀罗尼经幢,故潮州开元寺陀罗尼幢并非广东唯一者。光孝寺幢经题对照《大藏经》,有金刚智译《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为此经咒,亦非采用波利译本。常袞与不空、鱼朝恩奉诏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供养法》,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入之《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有“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字样,当为此本。但其题与开元寺陀罗尼幢之经幢题目不同,且内容不一样,断非此加句本。故也不能断定加句本是常袞谪潮时所携来的。元和十四年(819)朝议大夫兼御史武彻在《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中说到:

“昔仪凤中,佛陀波利所传之本,遍天下幡刹,持诵有多矣。”那么,早在仪凤年间,尊胜陀罗尼经咒已遍传全国寺院。不空在开元、天宝年间三度到岭南,第三次入粤,逗留时间长达四年,其活动又得到地方官府的出面支持,不仅其影响大,而且在佛教史籍上这段时间的佛事活动(包括所至之寺院)及译著一概阙如,这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也留下了补充的余地。潮州开元寺为粤东大寺,也有可能是其弟子来过之处。以不空最后一次在粤活动时间计,也要早于常袞入粤30年。不空译加句本流传入潮,早于常袞谪潮完全是

有可能的。

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型体大于广州光孝寺幢,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其造型之复杂、比例轮廓之优美以及雕刻之精致。古建筑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唐幢形制简素,仅顶部多些装饰。此后石幢益多形制也愈繁多。”<sup>⑤</sup>其实,从现存的唐幢看,其时也存在形制较为繁复的另一类型。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的上海松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建于大中八年(854)的福建泉州尊胜陀罗尼经幢,其型制与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都是一样的。潮州开元寺幢型与沪、闽唐幢型相同而与广州唐幢相异,其建造年代为开元年间之说倘若属实,那么,其建造时间比松江、泉州的陀罗尼幢要早上百余年。这还可以作为密教较早传入粤地的一个物证,并可以从建筑的型制演变,探索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的路线。

①赞宁:《宋高僧传》卷1,《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

②比丘明复编《中国佛教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237页。

③《唐会要》卷78。

④据《旧唐书·玄宗本纪》、《唐大和尚东征传》均作“刘巨鳞”。

⑤⑥赞宁:《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

⑦《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

⑧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⑨赞宁:《宋高僧传》卷2,《唐洛京智慧传》。

⑩顾光修,民国二十二年重刊《光孝寺志》卷3。

⑪光绪《海阳县志》卷30,“金石略一”。

⑫饶宗颐:《潮州开元志序》,潮州开元寺1992年出版《潮州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

⑬《潮州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第494页。

⑭饶宗颐:《潮人文化的传统与发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6页。

⑮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岭南民间文化的沉迷与开掘

——《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评介

唐孝祥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41)

罗雨林先生是一位地道的岭南人,他对岭南文化之情可谓至炽至热,至深至切。自20世纪60年代始。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对岭南文化研究孜孜以求,孜孜不倦,特别在岭南民间文化研究领域,更是辛勤耕耘,不断开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最近捧读他的新著《罗雨林文博研究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下文简称《论集》),更是收益良多而倍感欣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持续高温的文化热。人们虽然在文化层面划分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主要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面,但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侧重于精英文化的研究,而作为“源头活水”的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则相对贫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文化认识的偏见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势必影响到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鉴此,罗先生着眼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凭借大量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以独具一格的岭南民间工艺美术为切入点,“运用民俗学、民族学、建筑学、美学、工艺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论集》第135页),对岭南民间文化进行由博返约的研究。

从文化活动主体的视角看,岭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不乏引领潮流的文化精英,创造出著称于世的精英文化,但岭南文化的文化个性和风格特征更广泛,更大量、更直观地是通过民间文化来表现的。用罗先生的话说,即“历史不仅仅是由几个‘举大旗’的人书写的,还应不要忘记有一大批群星闪耀的人物的功劳”(《论集》第520页)。如果局限于精英文化的研究,不仅难以反映岭南文化的全貌,而且由于忽视民间文化这个“源头活水”使

得精英文化研究也无法真正深入。长期以来,只注目精英文化而漠视民间文化造成了文化认识上的偏见和学术视野上的局限。这种偏见和局限使得岭南文化研究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说法。比如,认为包括广东、海南在内的岭南地区是历史上的蛮荒之地,没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有的都是后来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岭南先民就有辉煌的文化创造,“细石器文化”、“石峡文化”、“沙坑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不仅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共同风格,而且具有鲜明的岭南地方特色。”(《论集》第137页)罗先生依据大量的出土文物,结合认真的史料考证,从岭南民间美术的角度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图文并茂,视野开阔,令人信服,给人启发。不仅如此,他在分析和研究了大量散布在民间的历代民间美术实物珍品后,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清代至近代不仅没有走入死胡同,而且还是生气勃勃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的观点。这是对民间文化的历史地位的正视和肯定,也是对以精英文化取代传统文化的文化偏见的驳斥和纠正。

有了对待岭南民间文化的正确态度,更激发了他研究岭南民间文化的热情。罗先生正是以高度的热情 and 责任感,胸怀“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正名和定位”(《论集》第228页)的抱负和目标,进行大量的调查和广泛的考证,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到岭南民间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关于岭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用力尤著,论述更详。

然而,面对品类繁多的岭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任务和目标不在于现象的简单罗列,亦不能就

事论事，而在于揭示其文化内涵。因此，“只有把民间工艺美术作为一个有机的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待，运用历史尺度和历史观念去研究，并结合相关的工艺美术思想史和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历史、人文等联系起来思考”（《论集》第135页）方能奏效。岭南民间文化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这项研究工作的展开既是对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学识素养的考量，又是对研究者的学风和学术精神的检阅。罗先生对此有了明确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自觉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因为他知道，只有运用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美学、工艺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方能解读出它的深刻内涵，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论集》中“广州西村窑陶瓷的艺术特色”和“广州陈氏书院及其建筑艺术”是富于创见的关于岭南民间文化研究的两个精彩篇章。前篇紧紧围绕“民间”“外销”四个字进行纵横论述，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它揭示了广州西村窑陶瓷纯朴无华的民间情调、娴熟流畅的艺术技巧、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分析了它的艺术特色的主要形成原因在于岭南民间文化那立足现实、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文化精神。后篇则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古建筑知识和很高的民间艺术审美水平。广州陈氏书院集岭南传统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是近代岭南建筑的典范，是岭南民间艺术文化的“博物馆”，是享誉全球的岭南文化瑰宝。罗先生紧扣重点，对最富特色、成就最高的陈氏书院装饰艺术作了细微入里的论析，阐述了陈氏书院中木雕、砖

雕、石雕、陶塑、灰塑、铸造、壁画及书法对联的审美文化意义，从而认为“陈氏书院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优良传统，而且吸取了岭南地区民间建筑的精华，在装饰技法、形式和题材内容，以及建筑布局、结构等方面，体现出南方建筑的鲜明特色，散发着浓郁的岭南地区的乡土文化气息”（《论集》第263页）。

此外，尚须指出的是，罗先生的《论集》有相当的篇幅是对包括岭南陶瓷在内的中国古陶瓷艺术的研究，既有关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任务、方法和内容的宏观论述，又有关于宋代陶瓷艺术风格和岭南陶瓷艺术特色（如佛山石湾陶瓷艺术的风格特色）的微观探讨，分析深刻，很有见地。尤须注意的是，罗先生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研究是从陶瓷美学的高度来进行的，对于陶瓷美学的研究者们很有启发意义。中国陶瓷之所以不同于外国陶瓷，其根本在于独特民族特征和文化精神。有如我国著名美术史家邓白先生所言：“我国不少古代名窑产品，价值连城，蜚声寰宇，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表现着东方艺术特有的魅力，体现了传统陶瓷美学的渊源。离开民族特征，想探寻中国陶瓷美的本质，犹“缘木求鱼”，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邓白美术文集》第179页）罗先生对岭南陶瓷艺术的地方特色和中国陶瓷艺术的民族特征的论述实质上正是关于中国陶瓷美学中最关键、最重要问题所发表的真知灼见，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责任编辑：童 轩

# 关于《诗经》 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天津 300191)

[摘要] 《诗经》祭祀诗中以祭祀祖先的诗歌为多, 而在祭祀祖先的诗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诗歌为多。这是因为, 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初, 祖先崇拜在维系内部团结, 强化本族统治, 排斥和贬抑殷人方面起到巨大作用; 文王、武王作为周代商的实践者也是天命的体现者和执行者, 祭祀他们就是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 也就是肯定和强化变化了的现实。祭祀文王、武王的这种现实意义是祭祀其他列祖列宗所不具备的。

[关键词] 诗经 祭祀诗 祭祀对象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111-04

《诗经》中的祭祀诗是指那些在祭祀活动中咏唱的赞颂神灵、祖先, 祈福禳灾的诗歌。这些诗歌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鲜明的思想特征、浓郁的宗教气息和丰富的文化价值自成一类, 在“三百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中的祭祀诗共有17篇, 在数量上, 固然比不上怨刺诗和爱情、婚俗诗, 但却远比农事诗、史诗和宴饮诗为多, 说它是《诗经》中的一个大类是丝毫不为夸张的。

祭祀诗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 是祭祀活动的副产品, 因此研究祭祀诗不能脱离开祭祀活动以及相关的宗教观念和祭祀制度。祭祀总是以一定的宗教观念为基础, 受着宗教观念的支配。不同的祭祀对象反映着不同的宗教观念, 它们之间在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 祭祀日月是以日月崇拜为基础, 祭祀山川风雨是以自然崇拜为基础, 祭祀祖先的亡灵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 祭祀天(非自然之天)或上帝是以上帝崇拜为基础……这些宗教观念形式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在时间上有先后, 较早的产生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会, 较晚的产生于奴隶制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延续性, 这些宗教观念形式在《诗经》时代都还继续存在, 有的还相当盛行。

除了宗教观念之外, 祭祀制度对于我们把握祭祀诗也非常重要。由于祭祀的特殊重要性, 祭祀礼仪的繁杂和祭祀活动的频繁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用以规范和制约人们的祭祀行为。“夫祀, 国之大节也; 而节, 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 以为国典。”(《国语·鲁语上》)国典即国家的正式法规。可见, 祭祀制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从古代的几部礼学经典可以知道, 祭祀制度对祭祀的对象、等级、规格、主祭者、参与者、时间、次数、地点、供品、祭器乃至主祭者与参与者的表情、动作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无疑为我们理解祭祀诗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参考。不充分掌握这些制度, 很难透彻理解祭祀诗, 更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 包括祭祀制度在内的礼仪制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周初开始,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 至西汉才完备起来, 并整理记录成书, 成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三礼”。显然, “三礼”的内容有很多是《诗经》时代以后的东西, 不过, 它的核心成分却还保留着开始阶段的痕迹。

如前所说, 祭祀对象最能反映宗教观念的本质特征, 下面我们就从祭祀对象入手来把握祭祀诗的

思想内容,揭示其本来面貌。

《诗经》17篇祭祀诗的祭祀对象如下:

《清庙》:“祀文王也。”(《诗序》)或兼祀文王、武王。

《维天之命》:“此亦祭文王之诗。”(《诗集传》)

《维清》:“此亦祀文王之诗。”(《诗集传》)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诗序》)成王即政主祭,祭祀对象包括文王、武王在内的先公先王。

《天作》:明清以后各家多主祀岐山之诗。<sup>①</sup>

《昊天有成命》:“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诗集传》)

《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诗序》)

《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之之歌也……柴祭昊天,望祭山川……”(《诗序》)后世多主祭山川之诗。

《执竞》:“祀武王也。”(《诗序》)<sup>②</sup>

《思文》:“后稷配天也。”(《诗序》)即祭祀后稷与上帝。

《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诗序》)即大奏诸乐合祭历代祖先。

《潜》:以鱼献祭于宗庙,各家无异议。

《雍》:“此武王祭文王之诗。”(《诗集传》)

《载见》:“成王即政,诸侯来朝,于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庙。”(《孔疏》)是成王率诸侯祀武王。

《丝衣》:绎祭之诗,祭之明日又祭为绎。但所祭何神,向无定说,又无确证,今姑存疑。

《賁》:“此武王初克商,归祀文王庙,大告诸侯所以得天下之意也。”(姚际恒《诗经通论》)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诗序》)

在这17首祭祀诗中,除《丝衣》不知所祀何神外,其他16首均有明确的祭祀对象。这些祭祀对象所采用的说法均为学术界所公认。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上帝(天)、祖先和山河。三类的数量分别如下:

祭祀上帝(天)1首;祭祀祖先13首;祭祀山河3首。<sup>③</sup>

在祭祀祖先的13首诗歌,情况如下:

祭祀后稷1首;祭祀文王6首;祭祀武王3首;祭祀成王1首;祭祀历代祖先3首。

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以下两个问题:

1. 在各类祭祀对象中,以祭祀祖先为最多,约

占76%。

2. 在祭祀祖先的诗歌中,以祭祀文王、武王为最多,二者合计共9首,约占69%。

这种情况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原因。搞清这两个问题,揭示祭祀诗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祭祀诗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文化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 一、《诗经》中的祭祀诗为什么以祭祀祖先的诗歌为最多?

祭祀祖先的诗歌多,归根结底是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着适合它生存的文化土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祖先崇拜的高度发展及其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祖先崇拜是对祖先亡灵的崇拜,祖先的亡灵也就是鬼魂,只不过这个鬼魂不是一般的鬼魂,而与生者有血缘关系,所以,祖先崇拜实际是鬼魂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我国的祖先崇拜产生于原始时代,在奴隶制社会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重要的宗教观念。这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结构特点有直接关系。我国的奴隶制与古希腊的奴隶制不同:在古希腊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广泛存在于原始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被彻底破坏,而形成按地域组织结合的城邦奴隶制。我国的奴隶制属于宗法奴隶制,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进入奴隶制时代以后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个社会仍然是建立在以亲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集群和宗法制度上。社会组织结构的一致性决定了思想观念发展的一致性。祖先崇拜因此也就跨越时代,在新的社会找到了自己的土壤。所不同的是,在奴隶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部族祖先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祖先,家族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政治力量的介入,使祖先崇拜更加强化。

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古代以祖先崇拜高度发展著称于世。外国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我们不能不把对双亲和祖宗的崇拜看成是中国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核心的核心。”<sup>④</sup>著名哲学家恩·卡西尔也指出:“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一切特殊含



义。”<sup>⑥</sup>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前边所提出的问题。

有了充分发展和高度强化的祖先崇拜，才会有反映这个观念形态的祭祀诗创作的繁荣。除了思想观念的原因之处，西周初期祭祀祖先诗歌较多，还有现实的政治原因。

周王朝是以姬姓为首的周部族推翻商王朝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是以子姓为首的商部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他们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同时也是两个不同种姓部族之间的斗争。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周王朝统治者对于被赶下台的殷商贵族给以种种抚慰和安置，如把他们迁往宋地继续奉殷祀。但这些并不足以弥补丧失统治权和种种特权所带来的失落，他们的不满和抵触时有发生。如何预防殷商贵族的反抗，巩固新的政权就成为摆在周朝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除了采取政治、军事措施之外，还利用宗教来保护自己，而强化祖先崇拜，高度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正是其表现之一。

与其他宗教崇拜形式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相比，祖先崇拜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尤其是对于统治集团来讲更是如此。首先，由于具有血缘联系，祖先成为子孙后代的最直接、最亲近的保护神；而对于没有血缘联系的不同种姓来说，祖先崇拜具有最为强烈的排他性。加惠本族，排斥他姓是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从而使周朝统治集团得到了双重满足。其次，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全民族的共同始祖和祖先，祖先作为部族的代表，也是全部族的精神核心和象征。因此，祖先崇拜在加强家庭、部族成员的凝聚力，强化家族、部族观念，维系各成员之间的团结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对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统治秩序尤其显得重要。

## 二、为什么在祭祀祖先的诗歌中，以祭祀文王、武王的诗歌为最多？

在诸多列祖列宗中，单单重点祭祀文王、武王是很值得注意的。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与有关的祭祀制度相抵牾时，就更值得研究了。《礼记·祭法》云：

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

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有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曰鬼。

这是祭祖制度对天子祭祀列祖辈分、次数、规模、地点的规定。按这个制度规定，周天子共有七庙，即要祭祀七世祖，其中五世祖即父、祖父、曾祖父、太祖父、太太祖父要每月祭祀一次。再往上的二世祖即太太祖父的父亲和祖父为祧，不是每月一次，而只有四时之祭。再往上则无庙，只在坛墠上祭祀，祭祀的时间和次数也不固定。据此，如是成王祭祀，他的五世祖先分别应为武王、文王、季历、古公亶父（太王）、公叔祖类；如是武王祭祀，那么还应上推一辈，加上亚圉。如是祧祭，还应有始祖后稷和远祖公刘等。

除了按辈分远近亲疏祭祀之外，祭祀制度中还有按祖先在部族发展历史中所做的贡献及地位决定是否祭祀的规定。那些功绩显赫，贡献巨大的祖先自然被列入祭祀范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以这个标准着，即使是最严格的掌握，那么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也应名列其中。后稷作为周民族的始祖自不必说，公刘是周部族早期历史上的杰出首领，《史记·周本纪》说他“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古公亶父是周部族建国前不久的杰出首领，他象公刘一样，“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廓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史记·周本纪》）可以看出，公刘和古公亶父都是周部族发展历史上做出巨大贡献，产生重要影响，并深受族人拥戴的祖先，是子孙后代心目中的英雄。按照有关祭祀规定，他们被列入祭祀对象，歆享子孙的祭祀香火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无论按辈分亲疏远近，还是看功劳贡献大小都符合入祀条件的一些英雄祖先，却未被祭祀，有关他们的祭祀诗竟一首也没有。除公刘、古

公邠父之外,周部族历史上还有很多贡献巨大的祖先,如庆节、季历等,然而,他们也未被专祭,有关他们的祭祀诗也是一首也没有。相比之下关于文王、武王的祭祀诗竟达9首之多。这种情况也绝非偶然:

一、正是文王和武王的巨大功绩,使周部族实现了其发展史上的根本性转折:从一个普通的殷商属国一跃而成为至尊至圣的华夏共主,他们因而成为后代子孙心目中的神圣先王和英雄。

二、有关文王、武王祭祀诗较多的更重要原因在于思想观念方面:即强化一种刚刚出现的新的宗教哲学思想——天命观念。

天命观念是商周交替之际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想,认为天即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决定着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大至王朝更迭,小至个人祸福,人间的一切皆决定于上帝。商人观念中的上帝与政治、道德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具有某种盲目特征,且事无巨细,都在他掌管的范围之内。这是天命观念的雏形,在理论上还很粗糙不完备。在周代商的历史进程中,天命观念有了重要的发展。

武王九年,与诸侯会师盟津,诸侯建议立即讨伐纣王,武王根据各种迹象没有同意: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周本纪》)

武王自以为知天命,上帝与他似乎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二年以后,再度会师盟津,武王当众历数纣王种种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武王揭露纣王正是把天命与道德联系起来。指出他道德沦丧,沉溺享乐,暴虐百姓,是“自绝于天”(《史记·周本纪》),而他则是奉上帝之命来铲除人间暴君: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

及至攻入朝歌,武王对商国百姓说,推翻纣王,他来君临天下,乃是“上天降休”!即上天赐给大家的大喜事。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尚书·大诰》)宁王指文王,是说上天嘉奖文王,使周国兴盛起来。“皇天既付中国民越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尚书·梓材》)是说周王只有行德政才不辜负上天把疆土和臣民托付给你的圣意。不难看出,天命观念在历史巨

变过程中被赋予很多新内容:

首先,强调天命转移和王权神授,这样既突出了王权的神圣性,又对王权作了某些限制:上帝可以选择他在人间的代理者即君王,当然也就可以更换君王,从而形成天命的转移。这是周人总结商代夏、周代商的历史变革所提出的新思想。还有,上帝选择君王的根据是道德,即选择盛德茂行、爱惜人民的人作他的代理者,而摒弃那些道德沦丧、享乐误国的君主。在周人观念中,上帝不但是人间善恶是非的仲裁者,同样也是人间道德的总的根源。由于将道德与天命观念联系起来,所以周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强调“进德修业”、“敬天保民”,这是周朝统治集团从殷商灭亡中总结出的深刻历史教训。

可以看出,周人的天命观念与商人的天命观念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天命观念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周代商,建立新朝的原因,特别肯定了这个王朝更迭的历史性巨变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神的意志,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因而成为周王朝统治合乎天意的证明和理论根据,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文王、武王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天命的最早体现者和勇敢实践者。祭祀他们一方面固然是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祭祀他们来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而肯定和强化天命观念也就是肯定变化了的现实,强化新王朝的统治。祭祀文王、武王的这种迫切的现实意义是祭祀其他列祖列宗所不具备的。

正是以上政治历史背景和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决定了祭祀祖先诗歌,特别是祭祀文王、武王诗歌创作的繁荣。

①参阅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二十六《周颂·天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除祀武王之说外,还有以《诗集传》为代表的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说,二说各有从者。此采用《诗序》之说。二说得失,余培林《诗经正诂》,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有辨析,可参阅。

③凡一诗同祭二神的,则分别统计。下同。

④德·格鲁特:《中国人的宗教》,转印自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⑤恩·卡西尔:《人论》,同上,第109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

——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陈美兰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与五四以后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 20 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关键词] 20 世纪中国文学 “十七年文学” 新古典主义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115-06

尽管“20 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正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但在探讨“十七年文学”时我仍然愿意使用它。因为我认为问题恰恰不在这一概念本身, 而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如果仅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征来确立中国 20 世纪文学整体性的现代特征, 以西方文学思潮演进的轨迹来框囿中国 20 世纪文学演进的轨迹, 这种研究思路自然会造成一些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认识距离。但如果我们取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它在 20 世纪百年间的演进和变化, 那么, 20 世纪文学就是一个充满丰富复杂内涵的概念, 一个充满着动感的概念。我把“十七年文学”放在 20 世纪文学中来思考, 也正是为了想说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迂回性。

—

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说是 20 世纪文学的世纪性追求。中国历史进入 20 世纪, 现代化已成了历史的必然,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孕育与生成文学的现代素质; 这样说, 并非忽视外来的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和诱发, 但毕竟中国文学的现代素质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 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生成的。一位西方学者在研究了 19、20 世纪之交这

个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小说后, 说了一段相当明智的话: “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中, 外来因素的吸收也只是本身进化的补充。”<sup>①</sup>我们在谈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变化时, 首先必须注意这一点。

就我个人的理解, 现代性当然与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 但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层面上, 而现代性则是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知识理念体系发生全方位秩序转型后所形成的人的一种新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体现在文学上, 其最重要的内涵我认为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即: 理智化的精神立场, 重主观感悟、重生命体验的认知态度, 非绝对化、线性化的艺术运思, 和间接性、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主义, 也就是这种最基本的精神特征在文艺、文化领域中的一种实践性体现; 而作为一种精神特征, 现代性也同样会渗透进现实主义的创作中。

中国文学自 19、20 世纪之交, 特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建构文学的现代品格逐渐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鲁迅不仅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融入

了强烈的主观情绪从而带来了小说风格鲜明的现代色彩,更令人震撼的是他那穿透历史、穿透现实的深邃目光,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自我大胆解剖的勇气,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人精神品格。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所透露的悲凉之气,正体现了他们在反思历史和面对现实时精神的觉醒,体现了他们清醒的现代理性的精神立场。从20年代到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在不同作家的不同创造中不断得到多方面的体现和深化,30年代初以流派出现的“新感觉派”是力图在艺术的表达方式上来显示创作的现代新意,40年代在张爱玲、路翎等作家创作中,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则更深潜入作品的内质。张爱玲对人性变异、人性扭曲的深刻感悟,对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相互算计的犀利透视,可以说正是现代理性的极致,而她对现代艺术表现生活的间接性、多义性、朦胧性的审美手段的引入,又使小说在传统的笔法中透射出强烈的现代感。路翎对人非理性心态的刻意描写,也说明作家在对人的观察和认识上所站的现代高度。及至钱钟书《围城》的出现,西南现代诗人群落的出现,他们从现实的描绘中上升到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对现代人精神情绪的感受和把握,更给中国的现代文学增添了以往不多见的、浓郁的现代哲学意蕴。

可以说,在20世纪开始、特别以五四作为明显转换标志后的20-40年代中,中国文学的现代素质确实随着整个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得到不断的增强,这应该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第一,现代精神素质在不同作家身上显示的强弱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其充分程度也不完全一样;第二,现代精神特征在20-40年代中的存在也不是以单一的状态存在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体现不同精神特征、美学特征的多种文学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逐步孕育、生长的过程时,还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作为在旧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传统审美趋向,也有可能新的历史机遇中发生新的转换,从而获得新的发展。这种认识,正是我们今天探讨“十七年文学”

的一个论述起点。

## 二

“十七年文学”,已经约定俗成地是指新中国诞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的文学,这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其呈现的特征与五四以来所生长的具有我们前面所说的现代素质的文学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为了使这一认识得到比较充分的文学史依据,也为了使论述更为集中,我选择在“十七年文学”中一种最发达的创作文类——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作论证,以便探究其呈现的不同特点。

第一,面对现实的态度:理智化的退隐,理想化成为主导基调。

这个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绝大部分都触及中国农民在改变生产体制、摆脱小生产方式过程中的生活变化。走出千百年所习惯的生存方式,摆脱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生活观念,这当中的心理波澜、行为波澜,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对抗、行为对抗,它的复杂纠缠与激烈回环是客观的存在,但在文学作品面对这些客观存在所应有的理智审视往往被一种理想色彩所取代了。《三里湾》的糊涂涂顺利地“从糊涂变光荣”,个体所有的观念与集体所有制的激烈对峙也就轻易地变为欢快的顺应;

《山乡巨变》中陈先晋为“恋土”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一下子就悄悄地被平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经过区里的一次学习就私心尽除,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先锋……这些人物及其行动在理想化的支配下,较之当年的闰土、老通宝、韩素娥的沉重,显然变得相当的明朗、轻松。

第二,艺术的运思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重新得到强化,直线、单一的艺术思路排斥了艺术的多重视角和不确定性效果。

这时期的作品,在把握事物现象和归结小说矛盾时,都不约而同地按照二元对立的运思习惯归结成“一体两极”式的矛盾构架,像《创业史》以梁生宝为中心,与其对立的就有姚士杰(代表地主反动势力)、郭世富(代表富裕中农势力)、郭振山(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这几乎成了当时农村小说矛盾构架的最主要模式;而在揭示矛盾的发展和解决时,又往往采取单一的视角(基本上是政治视

角)和直线性的思路,诸如:合作化号召——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力量、打击破坏力量、团结教育大多数)——全村农民纷纷入社。尽管不少作品也有着丰富的生活故事和细节的描写,但从艺术思路来看基本上都是这种单一、直线的思路。这实际上反映出作家们的创作思维方式仍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传统的哲学意识所支配。

第三,感知方式和美感特征:重直觉而轻想象,欢乐感取代苍凉感。

这时期作家对生活的感知更强调了实实在在的深入和了解这一面,包括对一种生活过程的切实了解,对各色人等的具体了解,也就是对客观实际的实在性感知代替了主观感悟式的感知,由此,“真实美”胜于“想象美”。在美感特征上,苍凉感被轻松的欢乐感所取代,明朗、欢快、朴拙的艺术风格受到崇尚。

上述的几个方面,使“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出特有的色彩。五四以后二三十年间文学中所呈现的现代品格,在这一时期看来已经被遗忘、被遮蔽。文学的主流已明显地被置换。

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质?以往,我们习惯于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延伸或“工农兵文学”的概念以冠之,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研究思路放在辨析文学的内在素质这一角度来展开,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占据“十七年”主流的文学,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质的文学。

相对于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发展的数千年中,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了灿烂辉煌、丰厚多姿的文学硕果。尽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会使文学的特色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生长在农耕文化沃土中的文学,深深印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精神特征,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文学特质:由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天命观而形成艺术的和谐感和善于以圆满的理想来抚慰生活的缺陷和情感的缺失;由对宇宙世界阴阳两极的固有观念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极向化的艺术思维模式;由对事物认识的客观绝对性和因果关系直接性的依赖而形成的一些惯有的艺术思路,等等。这

些,我们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特有素质,而“十七年文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这种素质。

这种古典化的特有素质重新呈现于“十七年文学”中,并非是偶然的突兀的现象。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以后,文学的现代品格也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在逐步形成,但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所固有的传统文学特征并没有一下子就自然消失,相反,由于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这种带有传统特征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生存空间。为了在中国这一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不仅不可能排开、反而需要最广大农民的投入,这是特殊的“国情”。这种历史特点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学会在一段很长历史阶段保持着那种孕育于农业社会土壤中的古典色彩。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农民作为革命武装的主力走上现代历史舞台,这种文学色彩逐渐涌动为一股势头越来越强劲的文学潮流,开始与五四文学延伸下来的具有现代品格的文学潮流并存,后来则占领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空间。显然,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开始发生迂回。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带有古典化特有素质的文学,其精神特征与传统的古代文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其生存土壤和文学主体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个体农民,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有可能同人类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发生联系,更有可能逐步与小生产方式发生主动分离,这样,就使他们身上会出现过去历史上的农民所没有的一些新素质。他们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古代社会农民的特征正好相反,他们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不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sup>②</sup>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自身也获得了一种“新兴”的可能性,而其时文学所呈现的古典色彩,又因为注入了新的历史精神,从而显示了新

的素质,我们称它为新古典主义,即鉴于此。

新的历史精神的注入,使原有的古典特征获得了新的意义。像理想化的表现,由于中国历史现代进程的胜利,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自然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合理想象提供了更可靠的现实根据;而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历史,不仅使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潜移默化,而且使它的加固与强化获得了更多的实践说明,于是这种长期难以挥去的“集体无意识”就更变成了“十七年”作家们把握和表现社会生活自觉的规律意识;至于欢乐感、英雄主义基调,因它与建设“新的世界”的豪情和历史愿望紧紧相连,也就有了更加理直气壮的表现基础。这样,一种新的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又得到蓬勃生长的机会,到了“十七年”,这种文学终于发展到了成熟状态,产生了一批比较完美地自觉体现自己美学理想和艺术风貌的经典式的作家和作品。

在表现农村生活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文学成熟的显著性标志,我以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小说创作形成了完整的美学规范。就长篇小说来说,在结构上,讲求构架宏大而线索分明,首尾贯通,体现均衡、对称的美感;在情节安排上,讲求矛盾的尖锐化但不故作悬念设置,讲求波澜起伏但不故作险象环生,保持结局光明的亮色;在人物性格设置上,讲求鲜明生动、重在单面性格的突出而不重于复合性格的描绘;在语言运用上,追求乡俗语言风味,并在此语言背景下注意诗化和性格化。

其二,在同一创作潮流中,作家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面对农村的生活,赵树理重于民间形态的平实、质朴和民间情趣;周立波重于发现乡土自然风光的诗情画意,并特别珍爱它充满生机的音响与色彩;柳青追求史诗的气度,喜欢将生活矛盾纳入宏大的艺术构架;孙犁则喜欢把社会的矛盾放回到普通的人际间用淡淡的生活流程来展开。柳青的抒情议论充满政论色彩,而孙犁的抒情议论却充满着人情味和诗的韵致。这些各自的艺术个性的呈现,正是一种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

其三,这个文学潮流为文学史提供了一批体现自己独有美学价值的作品,塑造了一批具有特殊历

史意义的农民形象:从失去土地到获得土地,从告别个体小生产方式走向集体生产方式,从被奴役到做主人,这是处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农民形象。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形象并不完全是单一的:既有像赵玉林(《暴风骤雨》)、梁生宝(《创业史》)、刘雨生(《山乡巨变》)、王玉生(《三里湾》)这样一些新农村先锋式的农民,也有像梁三老汉(《创业史》)、老孙头(《暴风骤雨》)、马多寿(《三里湾》)、亭面糊(《山乡巨变》)这样一些处在新与旧两种社会力量撞击下瞻前顾后、犹豫不前的农民;有像李月辉(《山乡巨变》)这样以农民讲求实际的智慧与左倾政治思潮巧妙周旋的农村干部,还有像王二直杠(《创业史》)这样冥古不化最终无法跨进新生活门槛的守旧式农民。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不是被作为贱民,也不是作为艺术舞台的陪衬,而是作为社会的主人,被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来表现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被“他者”的眼光所表现的农民,而是以“自我”的眼光、以“亲历”的情感所表现的农民,这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种崭新的创造。

这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50、60年代,亦即“十七年”中能够走向成熟,是因为历史为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作为这个文学潮流的主体的一批作家,从20、30年代开始,他们的艺术经验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与积聚,到了50、60年代应该是结出硕果的时节,加之,作为这一阶段历史的主体力量这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确立了中心位置,自然也会为它所崇尚的审美理想的实现给予权力的保障;尤为重要的是,在“十七年”中,我国的经济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还在有力地保护着许许多多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依附在农业文明上的价值观念、致思方式以及生活情趣等等,尚未真正受到一种新的文明所冲击。当时所搞的“集体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千百年来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得以保护,得到生存的集体靠山。在建国初期的当时,为了使濒于破败的农村“欣欣向荣”,这种做法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应该看到,“十七年”中的计划经济,不能说是新的文明的产物,而仍然是在小农经济上集权化的产物。这



样的社会土壤，使新古典主义成熟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 三

“十七年文学”在 20 世纪文学进程中的存在，促使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上要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的历史进程并不是直线式，也不是简单的递进式的，它的迂回性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一种文学的精神特征与美学特征的确立，固然会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本土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科学水平、文明程度等因素所制约。正因为中国近百年在呼唤现代化过程中，在改变传统体制上的缓慢与曲折，形成了文学现代品格确立的反复与迂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与中国文学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开始的现代性的追求几乎是并行的，是一股逐渐走向强势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潮流的发展与成熟，在它的鼎盛期，甚至迫使世纪性的文学现代性梦想一度被飘失、被遗忘，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 20 余年，文学现代性的命题才重新被唤起，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得到新的张扬。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之点。所以，中国的 20 世纪文学是一段充满动感和变数的、交织着复杂内涵的文学，而我们对于“20 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恰恰应该建立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这一特点的基础上，而不应盲目按照西方文学发展的模式来扭曲我们的自身的文学进程，以牺牲我们自身进程的特点为代价、以强制性的阐释使我们的 20 世纪文学成为西方那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演变轨迹的翻版。

认识和承认中国 20 世纪文学这种自我律动的特点，对进一步确立中国文学研究的自主意识，是有关键意义的。

第二，当一种文学获得了与一定的生存土壤相适应的生长条件时，它必然会按照它自身的规律继续发展，会不断强化一定的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并将这种特征发展至完善状态，显示了它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对于这种有着生存合理性的文学存在，我们就不能因为它与今天的审美要求的不相适应而斥之于文学史之外，要么以“断裂”之名

无视它所占有的历史空间，要么人为地以当时尚处于“潜在”状态的文学篇章取代了这些当时处于“显在”位置、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文学存在，否则，历史的书写，就会变成现时意愿的书写。

其实，文学发展历史中这种迂回和变数，在西方文学史上也同样有过。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在 17 世纪的西方又出现了一股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观念相径庭的、崇尚理性的文艺潮流，一股向古代寻求文学创作典范和理性根据的创作潮流，也就是被欧洲文学史称作“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因有其历史的因由，有其社会思潮、哲学思潮的依托，使它不仅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它的经典，像高乃依、拉辛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拉封丹的寓言诗，波瓦洛的理论等等。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应该坚持一种科学的考察眼光，当一种文学潮流已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时，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认真考察它出现的原因，它存在的历史依据，它呈现的特点以及它是否在某些方面为文学史作出过贡献，而不是用一种简单化的感情态度，只因为它与新生的文学潮流不合拍，与今人的审美趣味有距离，就轻率地囫圇地随意弃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待“十七年文学”应持的一种态度。

当然，这里我们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一时期的创作所受到的“极左”政治的干扰和影响应如何估量？应该承认，每一个文学时期都不可能超脱那一时期政治的影响，由于某种政治思潮的巨大存在，它的价值观念、是非准则、情感取舍以及审美兴趣等等都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既是社会的精神产品，受到这些影响是必然的。当一定的政治思潮是代表了历史前进趋势和社会的进步渴求时，它对文学的影响自然是积极的；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使人对它产生保留性的评价，自然是因为它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受到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错误政治思潮的干扰。不过，对于这种背景下的文学仍然值得我们作仔细的分析。在“十七年文学”中大体有两类作品，一类是作错误政治“传声筒”或有意迎合错误政治需要的作品；一类则是由于其面对的现实生活恰是在某种政治思潮影响下的现实生活，它不能不按照这种生

活面貌创作的作品。这两类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起码,后一类作品有其创作的现实根基,作家尽管在把握这种生活现实时也许缺乏超前的、理智的审视眼光,但其创作毕竟有作家的主动选择和艺术上的独立追求。“十七年”中许多比较优秀的作品都属于后一种情况。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其它还有像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像描写城市生活的《上海的早晨》等等,不在此一一列举。还应该看到,这两类作品有时还会先后出现在同一位作家的创作中。像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前者的创作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这是1957年的政治风云波及农村生活的现实反映,尽管作家的思想立场也会受到波及,但作品毕竟也熔铸了作家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而后者则是作家自觉地为当时错误的政治思潮图解农村生活的产品,我们只要把它们仔细比较一下,就不难会有所分辨。诗歌创作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像贺敬之的《回延安》和《放声歌唱》与后来的《雷锋之歌》就分别属于不同类的创作。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这种复杂存在,就使我们对它的研究,应该一方面注意到从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着眼,另一方面又要与当时错误政治思潮进行剥离,从而确认真正代表这个文学时代的经典式作品。

第三,20世纪那个特指的“十七年”过去了,它所留下的那种新古典式的文学是否也彻底过去了呢?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将“文革文学”作为它的终结而将整个“十七年文学”也彻底地割掉,这恐怕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其实,到了6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错误政治思潮对文学的强力渗透和左右,将一些文学原则和美学理想按政治方式推向极端,其最终呈现的文学形态,已经和“十七年”中的新古典主义优秀代表作相距甚远;生活的汁液被挤干,理想化变成虚妄化,丰富的生活矛盾全被政治阴谋所覆盖,作家面对生活的主动精神和审美追求被彻底扼杀;实际上,“文革”时期中那种依附于阴谋政治的文学,完全是“政治符码”,它只能是“十七年文学”中负面因素恶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整个“十七年文

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成熟于“十七年”中的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并没有因为“十七年”已经过去就从此消失殆尽,作为一种曾经为中国文学发展提供过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一种,它的优秀部分,它的一些有价值的艺术经验,甚至它作为一种文学的风格和形式,仍然会在我们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占有它的生存空间。

进入新时期后,“十七年文学”曾在“拨乱反正”中被过激地声讨,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人们往往笼统地直接把它作为“文革文学”的渊藪。当中国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中真正开始踏上现代化航程的时候,文学的现代性自然又成了急切的呼唤,对于世纪初所作过的努力以及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被遗忘,当然要进行历史的反思,一种“弃旧图新”的情绪激荡在文坛。但今天如果能冷静地来考察一下,应该会看到不仅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仍然存在着这种文学形态,而且直到今天,在一些被今人称作“宏大叙事”的作品中,在一些表现昂扬的主旋律的创作中,仍然保存着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某些基因。如它的理想色彩,它的英雄主义基调,它那稍有曲折但仍是明快、笔直展开的艺术线条,以至在形式上的均衡感、对称美等,这些基因,经过了一些“现代调整”,注入了现代精神素质,完全可以为当今时代所接受,成为当今时代文学中的一种体现形式。

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它不是以“断裂”的方式来跳跃前进,也不是以“单一意愿”的方式来推移自己的脚步,它总是遵循着精神领域中上下承传的规律,在扬弃与吸取中来丰富自己、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当我们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时,我想,同样应该重视这样的原则才是科学的。

①(捷克)M. D- 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导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

## ——论废名小说的审美情怀

陈 茜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江西 南昌 330027)

[摘 要]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是废名小说一个始终贯穿的命题,这一命题蕴含着废名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参悟;爱人生是他文本中体现出的母性化的乡土情结,不留恋人生则是他而对现实的苦难产生的厌世意识;但正如废名用审美情怀对待乡土一样,他也用审美态度对待死亡,因而,“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这一矛盾命题在废名身上就表现为禅宗式的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关键词] 废名 审美情怀 童年经验 母亲意象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2)05-0121-05

### 一

废名的创作风格总是标新立异,使人捉摸不定,这也许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们理解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的视线仅仅锁定在他的某个单篇时,也许会着迷于那一幅幅恬静和谐的山水风俗画,沉浸在封闭的宗法制维系的乡村社会迷人的风情中,或是咀嚼他对现实和人生的种种思索,为他“有限的哀愁”所打动,收获一些绮丽的片断。然而,当我们环视他整个创作过程并追溯其文化背景后,却深刻感受到废名的作品中有着一个始终贯穿的命题,即:“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这是一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其实蕴含着废名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宇宙人生的参悟。它是废名的人生哲学,同时它又贯彻在废名的文学和哲学观念的层面上,呈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情怀。

废名是一个关心现实生活的人,这似乎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废名与鲁迅等乡土写实派同时代出生并有着相似文学背景和文学写作题材的乡土小说家不同,并未走上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写实主义道路,而且也不像他们那样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倾听农民们的声声血泪呻吟,写出乡土中国日趋破败衰亡的时代悲剧,并对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环境进行愤怒的

控诉和严正抗议,传达出一种凝重悒郁的时代氛围;同样关注现实,废名不是“血和泪”的倾诉者,而将“清新淡雅的自然景物和悠扬婉转的田园牧歌与温情脉脉敦厚朴素的乡村风俗人情相融合,横吹出一首宗法制乡村社会宁静幽远情韵并致的牧笛曲。”<sup>①</sup>可以说他舍弃了五四时期流行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而趋于古典浪漫主义,这正与他“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的人生取向一致。他爱人生,因而把“人民的苦难化作一种理想主义境界来进行某种间接性的情感宣泄。”<sup>②</sup>他不留恋人生,于是,“他从一种出世的角度呼唤一个理想的王国——没有剥削的压迫,没有阶级等级的朴素自然境界。”<sup>③</sup>

从文学层面来看,废名人生观中的“爱人生”可以说是他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母性化的乡土情结”。他的“爱”饱含着深厚的恋乡与恋母情结,在某一点上又将二者紧密契合。这是废名小说的独特性之一。鲁迅等乡土写实小说家同样也有着对故乡的眷恋和挚爱,但当故乡的破落、凋零、衰败已不能再作为他们失重灵魂的归宿和疲惫精神的载体时,他们对故乡进行冷静地审视和质疑,在他们的乡恋中也就渗入了诸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异质;而废名却还保留着那种传统的、单向度的、纯情的恋乡之情。在他的心目中,故乡已皈依

为他的精神家园,而且,故乡就是母亲的一种化身。在此,我们不妨先来解析一下废名童年经验中的“母亲意象”。

童庆炳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曾将与童年经验相联系的作家的先在结构分为两种: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在这里,“母亲意象”可以指生身母亲,也可以指其他代替母亲角色的给予母爱的人。童先生认为,母亲永远与爱、慈祥、温暖、感性联系在一起,母亲是爱与诗的象征。从文学要求感性、诗意和情感这个角度看,“母亲意象”对作家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一个作家的观看世界的艺术的眼睛是母亲给予的。在儿童心目中,父亲是威严的象征。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面——理性世界。作家不知不觉地会从父亲那里得到理性的启迪,使他们对社会人生有独特的深刻的思考,其作品则表现出对现实的冷峻的透视和批判。<sup>④</sup>

废名的童年生活中潜藏着后来小说中的“母亲意象”。废名在大家庭中不是长子长孙,按理来说不能得到太多的重视,然而他从小体弱多病,父母对他还是百般疼爱的。他曾这样描述过他在家的待遇:“哥哥让我,弟弟妹妹怕我,猫不好打猫,狗不好打狗。便是我性如烈火的父亲,见了我也是低声下气,且面带微笑。”<sup>⑤</sup>看来父亲也俨然慈母一般温和。他还说:“我小时候喜欢吃菜心,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母亲总是念我。”<sup>⑥</sup>由此看来,亲人们的关怀,尤其是女性的呵护,成为废名记忆中的温暖来源。他的人生观里标示着强烈的恋乡情结,他的恋乡情结中又集结为浓郁的恋母情怀。他曾用比喻描述过二者之间的联系:“一走进故乡的地界,就象小孩子看见母亲快来了,尽管身子不比受病以来任何时候舒服,心却比受病以来任何时充实了。”<sup>⑦</sup>从文化的意义上阐释,恋乡或恋母可以认为是寻找生命本根的一种情怀,在某种时候二者化合为一,如我们往往将祖国比作母亲而非父亲,可为例证。因此废名在礼赞故乡时,常常用一种面对女性的柔情描绘田园,此时的故乡也泛化出母性的温柔,在他眼里,故乡与母亲一样,“虽然充满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人的罪孽和失落至此可以得到净化和弥补。”<sup>⑧</sup>

废名对故乡的礼赞,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表

层对故乡自然景观的赞颂,而是出于血亲和宗法抽象出的泛化的美感,是由故乡景物和童年记忆凝结而成的精神氛围,是母性化无意识所渗透出的无限眷恋。如果说鲁迅等乡土写实派是以一种宗教情怀对待现实的话,那么在这里则体现了废名的审美情怀。他更多地从审美价值上来关注故乡人生,将现实中的痛感转变为审美中的快感。鲁迅会把“项带银圈、手持钢叉”,机灵能干的童年小伙伴变成一个“头带破毡帽、手象松树皮”,懦弱木讷的“陌生人”,还会把一个曾经充满生气和活力的祥林嫂沦为神智不清的木偶人,最后惨死在新年的祝福声中。鲁迅为了达到控诉封建礼教虚伪残忍的目的,干脆彻底将美撕毁给人看。而“母亲意象”给了废名一颗纯净的诗心,大千世界,无一不在他的审美观照之下。在他眼里,“地下比天上富丽得多,繁星远不如稻草的光芒切实了”,“稻场上是一首史诗,芋田的收获则是一首情歌”。<sup>⑨</sup>即使看到了同样的污浊,感受到了同样的悲哀,也不忍撕碎故乡在他心中的恬美和完满的形象。故乡就是母亲,他爱故乡,爱母亲,于是他的笔锋一触到悲苦,总是嘎然而止或转向大自然,有意识地回避悲惨贫困,提炼诗意,构建一个和谐友爱、真淳善美的人间乐园。在《柚子》中,废名着重描写了少年柚子清纯的形象以及“我”与柚子青梅竹马的情谊,来抹平“我”对爱情失意的惆怅;《竹林的故事》以三姑娘的勤敏和脱俗,淡化失去亲人的悲恸;《桃园》以王老大倾注给女儿的深厚的爱,化解着阿毛对母亲的思念;《浣衣母》尽力淡化李妈一生的悲苦,以重墨渲染她美好的心灵。“在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sup>⑩</sup>“因而我们看见它的美丽而喜悦,容易忘记它后面的悲观色彩”。<sup>⑪</sup>

## 二

废名用田园牧歌的短笛吹奏出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抒发其“爱人生”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的悲苦又使他情不自禁地诉说着对现实的不平与忧伤。从废名早期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废名也有着多重的痛苦。他从小身体孱弱,几近病死。他曾诉道:“五年的中学光阴,三年半是病,最后的春秋两季,完全住在家。”后来长大出外读书,又

染上了一种怪病：“起初于颈之右侧空然肿起如栗子那样大小，经过半年，几乎一年，由硬而软，终于破皮而流脓，然而右侧并不因先起而愈；颈部如此，两腋继续如此。”<sup>⑤</sup>在同学们的催促声和恐怖的眼光里，废名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母亲的怀抱。他说：“我从此知道我的患处实在疼痛，我的心极力想陈述我是怎样的痛苦，我的眼泪也只用压过一日中最难抵抗的疼痛。”肉体的折磨使很想寻找一条“脱路”，“跳出这无情的节节逼人的四围”；但为了“免避我的母亲因失去儿子而发狂，不能不继续生存”，所以“我要为我的母亲而延长我的生命”。<sup>⑥</sup>肉体的病痛，使他在涉世之初就比别人多一分创伤。如果说这还仅限于人生表层的痛苦，那么，废名从他的婶母、阿妹以及其他乡亲身上还体察到了生命真正的苦痛。以他的婶母为原型的浣衣母李妈，有着祥林嫂似的遭遇：丈夫“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不争气的酒鬼哥儿又在李妈不经意的诅咒下“真的死了”；天真的驼背女儿也在某天“突然死了”。浣衣母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老。《阿妹》也是以废名的妹妹为模特，他以哀婉忏悔的笔调叙述了这样一段辛酸的故事：阿妹一出生，外祖母就将她送人，在焱哥的哭闹下，阿妹勉强被留了下来，但一直受到大人们的歧视。阿妹长到六岁，不想又与焱哥同时染上了重病，专制的父亲只顾儿子不管女儿，连阿妹微弱的哭声也被他压制下去了。在经历了病痛的苦创之后，阿妹并不等候母亲在炉子上尚在煎熬的菩萨的药，“被哄哄地扛走了。”<sup>⑦</sup>还有像《竹林故事》中的三姑娘，《桃园》里的阿毛，《桥》中的琴子和小林，《火神庙的和尚》里的金喜，都是一个残破的人生，失父或丧母，“他们的身边总是围绕着悲哀的空气”。<sup>⑧</sup>更使废名痛感悲哀的是由于人生的悲苦，社会贫困和愚昧，人在不断地异化，宗法制完满的道德体系也随之瓦解：《讲究的信封》中那个叫仲凝的大学生，生性胆小懦弱，为缓解家中经济困难，希望得到同乡、众议员李先生的举荐而谋份差事，求告无门，欲启齿又畏权势，稚嫩的心灵在世态炎凉中颤抖变异；《四火》中供养寡嫂孤侄的年轻主人公，只因捉猪脚偷油而被革掉差事，成了一个游民，最后沦入酗酒、行窃之流；《柚子》表达了对爱情失

落的怅惘。柚子与焱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然而外祖母早已为焱哥缔结了婚约，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后来焱哥出外读书归来时，早先清纯的柚子由于家道中落，父兄避债他乡而挣粮糊口，已变得“成日里怨天怨地”，过早地消沉了。看来，田园的和风、乡亲的仁爱，留不住宗法制社会没落的脚步，社会群体道德的沦丧增添了废名的忧伤。当他满怀失望告别田园走向现代都市以后，都市生活又与之格格不入。他曾在一首小诗《街头》中写道：“行在街头 / 乃有汽车驰过 / 乃有邮筒寂寞 / 邮筒 PO / 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 X / 乃有阿拉伯数字的寂寞 / 汽车寂寞 / 大街寂寞 / 人类寂寞”。五个“寂寞”，传达了废名心中无数寂寞，使人孤独，使人悲哀。

面对现实的忧患与失落；表层痛苦与深层孤独的交织；传统人格与现代文明的错位；人生旅途悲剧性的体验，远非圣人的废名又产生出不留恋人生的厌世意识。他的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对“死”的达观态度上。

废名曾借莫须有的口自称是厌世派，他说：“世间是地狱，地狱是天堂，一是结缚，一是解脱”。由此可见，他把死看成是琐碎人生的解脱方式。因而在作品里塑造了一些漠视死亡的细节。如《阿妹》中的一段：

母亲有时同她谈笑：

“阿莲，算命先生说你不打不过三，六，九。”

“打不过无非是死。”

“死了你不怕吗？”

“怕什么呢。”

小小的阿妹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病痛，对死表现出异常的豁达和勇气。莫须有先生更是看透现实人生，他说：“无论世上的穷人富人，苦的乐的，甚至于我赞美的好看的女人，如果阎王爷要我抽签，要我把生活重过一遍，没有一支签中我意”。他甚至感叹：“唉！在天之父，什么时候把你的儿子平安接回去，不要罚我受苦”。<sup>⑨</sup>在废名眼里，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他不像别的作家那样直接渲染死的慷慨悲壮或无限凄凉，以掩饰对死的恐惧。他往往将死与美联系在一起，他说：“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他把少女之死描绘为“一瓣不可思议的空

白”，“一个无边色相之夜”，“一幅画得一朵空花的艺术杰作”。少男之死，是“长春”，对于“青草永远是一个青年”。孩子之死是一个“游戏，轻灵而美丽”。他把上坟头的感觉比作“比背母亲登城还觉得好玩”。<sup>⑥</sup>并极力赞赏庾信的“霜随柳白，月逐坟圆”的句子，感到中国难得的第二人这么写。废名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还写道：“我呱呱堕地以来就是如此，生而好奇于死，凡是最不足以动我厌世之感者莫过于死，盖是我最爱想象的一个境界。它令我寂寞，令我认识自己，令我思索宇宙。”由此可见，废名不是以世俗的人生态度对待死亡，而是以审美态度对待死亡。如此看来，死亡便不是一种生命在人和天堂地狱的分界线，而是生命将要往去的另一种境界。从对死亡的态度来反观废名不留恋人生的思想意识，其蕴含之深邃透彻是许多作家可望而不可及的。

### 三

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层面来看，“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是一个矛盾的命题，但又恰恰是禅宗哲学关于人生的态度。废名的故乡黄梅是禅宗五祖弘忍传法之处，他家距五祖当年密传衣钵给慧能的东山只有20余里。礼佛是这一带人的历史传统。废名小时候随父多次到过五祖寺，通往五祖寺的沙滩、石桥、水坝、竹林，还有五祖寺的小木鱼、小喇叭，都在废名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痕。可以说，这一方山水润泽，这一种人文氛围，不仅赋予了废名艺术家的情怀，而且赋予了他一种亲近佛学的宗教心态。他非常看重这独特的身世和经历。他在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这样说道：“就教育说，这个中学的教育抵得当年五祖寺具有的教育意义吗？那是宗教，是艺术，是历史，影响于此乡的莫须有先生甚巨。”莫须有先生其实就是废名自己。禅宗教义亲自然，求解脱，空物我，重顿悟。禅宗强调在刹那的顿悟中，个体精神超越一切时空、因果，从有限体验无限，从瞬间体验永恒。一切古往今来，东西南北的界限都不复存在，对人生意义的追思便变为一种无我的审美人生。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当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事业上受挫时，多是“逃而入禅”，继而濡染于禅，息心于禅。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灵哲学，何况出

身于禅宗之乡，从小对禅耳目俱染的废名。所以我认为，废名所爱的人生，是一种诗意或宗教性的人生，自然的人生，它完全超脱于尘世，是理想的幻境，是禅境。在这个境界里，自然万物成为他心境的客观投影、泛我象征，是物的“泛我”化和人的“物化”的合一。他的长篇小说《桥》就再现了他深藏于心的理想人生模式，一个美丽的梦幻，可遇而不可求。他在小说里首先建构了一系列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的表象世界。他写史家庄：

站在史家庄田畈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被水包住了。而这水并不是一样的宽阔，也并不处处是靠着坝流。每家有一个后门上坝，在这里河流最深，河坝间一带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尽是垂杨。迤西，河渐宽，草地连着沙滩，一架木桥，到王家湾、到老儿铺，史家庄的女人洗衣都在此。

废名以“史家庄三面都是坝”、“屋后是茂林”、“被水包住了”等描写首先从地理上将它封闭起来，与外界隔断，又用“竹林”、“垂杨”、“沙滩”、“木桥”、“浣衣女”等古典意象从时空上将史家庄与现代都市分离，没有现代文明的渗入，没有都市的嘈杂与喧嚣。建构了一个理想环境后，他又将人物从社会生活的表面上脱离出来，放在仅仅有他或他们几个的主观背景下，使人们只看到几个主人公而看不到人群，仅仅看到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而看不到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相契为一，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在大自然的感悟中，人的“性本”得到实现。正如废名的朋友所评论：“《桥》里面的东西都太美好，更使人觉得不象现实的。这里的儿童、老妇、庄汉、和尚、尼姑，无一不可爱，无一不是和平快乐的过日子。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林、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sup>⑦</sup>废名塑造的这个远离尘嚣的封闭空间，人物恬乐于山水田园，无拘无束，悠然自得。他一开始就把现实的苦难形态排除在外，不想与任何现实有一点牵连，现存状态只是



他审美想象超逾的对象，以此寻求适性灵魂的游戏自由。反过来说，其内核又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逃避，是文人社会理想不得实现的无可奈何的悲剧情怀，是作家排解心灵孤独和寻求心灵平衡的避难所。就象莫须有先生所说，他可以把私塾(他称为地狱或监牢)写得象一个“奇异的乐园”，因为“世界没有那样的光明，因为世界是黑暗，而黑暗对于莫须有先生是光明了，世界没有另外的光明”。<sup>①</sup>废名所塑造的这一“奇异的乐园”，显然是一个疏隔或陌生化的世界。这种疏隔或陌生化保持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一距离显露出现实的荒谬，打破了人们感觉意识的单向度性，从而起到批判现实的作用。也可以说艺术家为了创造一个世界，需要摆脱现实世界，而在根本上无法摆脱的世界中，他们时常会陷入孤立地位。另一方面，艺术家以艺术独特的原则，寻找一个新的世界时，又会自觉地追求那种孤独世界，他需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在如此幽静孤独的世界中，他能深入到精神的黑暗处，从日常的经验世界进入到另一个彼岸世界，那里由原始人格作向导，以发现现实世界的本质，以及本质的表述形式。<sup>②</sup>

废名“不留恋人生”的态度落实到行为表现上，不仅要超脱世俗人生的樊笼，也要阻断一切儒家思想的价值关怀，摆脱宋儒礼教对人的禁锢，追求一个超然的心境。他说：“做父母的送小孩上学，要小孩子受教育，其为善意是绝对的，然而他们是把自己的小孩子送到黑暗的监牢里去。”<sup>③</sup>他从禅学的角度审视儒家哲学。他认为：“儒家哲学可以救世界，但不能救中国。因为其恶业普遍于家族社会，其善业反无益于世道人心。”儒家教育是一种奴化教育，它使“百姓奴于官，汉族奴于夷狄。”<sup>④</sup>他还认为中国的外患内忧正是儒家读书人造成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代的程朱理学，是损害中华民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当鲁迅等乡土写实派站在反儒学立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废名却站在禅宗角度高歌中国百姓之神圣，他以为世俗社会里的尘埃完全是儒家思想飞扬出来的。其实废名也像古代文人一样并不希求得到彼岸世界的承诺，或者企

盼来世轮回的美业善报，而是想在“烦恼”中获得一份“菩提”，获得心灵的安适与超脱，摆脱人生沉浮带来的精神痛苦。因而他的《桥》不看重客观的真与外在于心的客观现实隔绝，只让三二个小儿女在他的心境上活蹦乱跳，欢歌笑语，在他所谓的“梦梦”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超脱。

亚里士多德说：“智者不追求快乐，只寻求烦恼与痛苦的解脱。”废名也正是通过艺术上的审美观照，从苦难的世界人生中得到暂时的解脱，达到暂时的否定意志，暂时忘我。因为艺术的审美直观就是为了实现对感性个体的生存价值的超越，从而使之有可能“自失”在观审之中而摆脱意志的桎梏。<sup>⑤</sup>

“爱人生而不留恋人生，视风景之佳而若之无睹”，这可谓为一个智者，一位哲人的人文体现和对人生的超越。

①②③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4、85页。

④童庆炳：《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⑤⑦⑧⑨废名：《病人》，《废名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⑥废名：《柚子》，《废名小说选》，同上。

⑩⑪废名：《桥》，《废名小说选》，同上。

⑫⑬⑭⑮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废名小说选》，同上。

⑯⑰周作人：《桃园·跋》，《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⑱孟实：《桥》，《冯文炳研究资料》，第212—214页。

⑲废名：《阿妹》，《废名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⑳废名：《莫须有先生传》，《废名小说选》，同上。

㉑董绶：《桥》，《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90页。

㉒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上海社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㉓赵凯：《人类与悲剧意识》，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 国内毛泽东诗词研究综述

郭思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馆员, 北京 100017)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5-0126-06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 还是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他的诗词以其深邃的意境、雄健的风格、崇高的美感而受到世人瞩目。到目前为止, 据不完全统计, 毛泽东诗词的国内版本已有 300 余种, 包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外文本、对照文本以及手迹本、字帖本、谱曲本等, 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37 首、《毛泽东诗词选》正副编 50 首, 以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正副编 67 首影响最大。毛泽东诗词各种版本的出版, 既使毛泽东诗词辉映于诗坛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又为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 一、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基本情况

据初步掌握, 国内出版的讲解、赏析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著已有 400 部之多, 发表的论文约 2300 篇, 在社会上反响较大的论著已屡屡出现。

近年来, 毛泽东诗词研究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 毛泽东诗词赏析作品的数量多、影响大, 在普及、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深化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一书, 曾多次修订并再版, 直至 1990 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讲解》, 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 由臧克家任主编、蔡清富和李捷任副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是文坛专家创作的优秀赏析作品的汇编; 公木撰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 1994 年版), 是个人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优秀赏析作品之一。其二, 毛泽东诗词研究逐步呈现出全方位态势, 特

别是对诗词美学、史学、哲理、格律等专题的研究, 把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的研究, 把毛泽东诗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的研究等, 都有影响较大的代表作或论文。这表明, 毛泽东诗词研究正在国内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已从分首研究走向综合研究, 由诠释鉴赏逐步走向多角度、多层次的专题研究, 由着重毛泽东诗词研究发展到为现实服务的研究。

## 二、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研究阶段。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是同步进行的。1945 年《新民晚报》披露了《沁园春·雪》的传抄稿后, 立即轰动了重庆山城, 毛泽东诗词研究由此拉开序幕。由于政见不同, 一些恶意中伤的和词、评论纷纷出笼。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战, 郭沫若撰文抨击反动文人的攻击, 肯定毛泽东这首词“脍炙人口”、“气魄宏大”、“前无古人”; 当时正在山东解放区的陈毅, 针对敌人的诽谤之言, 步毛泽东的咏雪词原韵, 也写下了两首和词, 赞誉毛泽东和柳亚子的两首词是“绝代风骚”, 是“革命狂飙”。这次围绕咏雪词的论争时间虽短, 但斗争激烈, 热潮空前,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 为毛泽东诗词研究揭开了序幕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二个研究阶段。1957 年 1 月, 在臧克家主编的《诗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 18 首, 以后又陆续有所披露, 到 1963 年 12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 首, 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形成热潮。从 1957 年至 1966 年初, 讲解毛泽东诗词的专著中, 当属臧克家、周振甫的讲解影响

最大。报刊上发表的评介赏析文章也越来越多,其中郭沫若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近20篇,有的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在这个研究阶段,从形式上看,偏重于分首研究;从内容上看,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析、时代背景的介绍和词语典故的解释等。不能否认,某些观点有失偏颇或缺乏艺术分析,但总的情况是形成了“注家蜂起”的局面。与此同时,歌唱毛泽东诗词也悄然兴起,作曲家李劫夫就先后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十几首诗词谱曲,一些京剧、粤剧和曲艺名家用本剧(曲)种曲调演唱毛泽东诗词,成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多种形式学习和宣传毛泽东诗词的热潮波及到了全国。

第三个研究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宣传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毛泽东诗词作为“最高指示”深入到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中间,不仅人人争诵,更加大量地谱曲、编舞、绘画、书法等广为传播。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诗词作为教材和科研项目几乎普及到了全国高等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也较普遍地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当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严重地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很难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诗词艺术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在光环映照下的诠释与颂扬。但毛泽东诗词较前又进一步地深入人心,还是应该看到的。

第四个研究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毛泽东诗词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里也开始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以来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对诗词艺术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努力,开始出现某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到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鲁歌著《毛泽东诗词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张贻玖著《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马连礼主编《毛泽东诗词史诗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蔡清富和黄辉映编著《毛泽东诗词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臧克家《重读毛主席和柳亚子诗词三首》(《人民日报》1991年12月

24日)、吴奔星《毛泽东诗词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等一批颇有研究水平的论著应运而生;另外,随着毛泽东与陈毅、叶剑英、胡乔木、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交文章的发表,中央电视台21集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的隆重推出等等,国内再次出现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热潮。

第五个研究阶段。1994年12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后,江苏、湖南、陕西、湖北、黑龙江、山东等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陆续成立,使毛泽东诗词研究由分散的个体逐步转变为有组织、有计划地群体协作。几年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先后举办了第一至第三届年会、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国元勋诗词研讨会、《毛泽东诗词集》座谈会、毛泽东诗词研讨讲习班等,同时得到了各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有力配合。通过这些活动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壮大了以研究会会员为主体的研究队伍,诗词探讨由介绍性转向研究性,研究方法由单一性趋于综合性,研究层次明显上升。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一辑、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高峰 奇葩 旗帜——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学术论文集》、黑龙江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编《毛泽东诗词世界》,以及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陈东林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马连礼等著《毛泽东诗词纵横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的问世,陈晋《毛泽东晚年诗作评析》(上、下)(《党的文献》1997年第3、4期)、吴正裕和孙东升《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倾向》(《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等,反映了这一情况。总而言之,毛泽东诗词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稳步发展的时期。

### 三、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的研究

毛泽东诗词影响之大尽人皆知,但长期以来论者对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多为简短的评价,有人说是“震古铄今”的“绝代诗章”;有人说是“跃上了中华诗词的巅峰”;有人说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有人说是“不仅在当今世界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时代的杰作,是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等等。这

些都是研究过程中的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允当的。最早评价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的是“南社”诗人柳亚子,他1945年在重庆读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之后,就赞美说是“千古词人共折腰”,并在撰写的《跋》文中称为“千古绝唱”。在诗人兼评论家中,郭沫若是毛泽东诗词研究最早的,臧克家是研究时间最长的,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很多也很有权威性。郭沫若曾说,毛泽东诗词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还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的诗词都使我五体投地。”这决非自谦或违心之语。臧克家评价说,毛泽东诗词“不论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他们的看法得到了许多论者的赞同。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诗美。20世纪80年代初,有论者开始撰文比较系统地论述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个课题的研究引起了论者的密切关注,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题论文。其中,1994年12月26日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贺敬之致开幕词时阐述了毛泽东诗词之美及其作用和影响。他指出: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形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毛泽东诗词“以光复旧物、开辟新宇的磅礴气势,潜移默化的感染力量,对华夏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当代中国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培育和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96年8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强调:“毛泽东诗词真不愧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人类诗歌宝库中的东方瑰宝。它的光彩和价值,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日益显现出来。”这是对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比较全面而且具有前瞻性的评价。

(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新世纪的但丁。100多年之前,恩格斯曾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就是无产阶级新世纪的但丁。其理由

是:1.毛泽东诗词不仅是时代的光辉记录,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人们从中能认识到许多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原理,这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人生格言;同时,以诗人个体而论,为人类奉献的格言之多、鼓舞人心之大,没有超过毛泽东的。2.毛泽东诗词有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是其文艺思想的形象体现,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是开掘不尽的美学宝库。3.毛泽东诗词以其内容的博大精深和艺术的臻善完美,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受到海外朋友的热烈赞赏。胡乔木说,毛泽东诗词“将比他的文章更能传诸后世”,此话道出了毛泽东诗词的永久魅力所在。<sup>①</sup>

(三)当之无愧的“中外独步,古今绝唱”。有论者主张,仅仅局限于诗人的范畴来评价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还是不够的,应该纵观古今,横览中外,从政治家兼诗人的视角来说,指出:1.古今中外非无产阶级政治家兼诗人的诗与毛泽东诗词相比有各种差异:前者有的偶有名篇,但难称政治家兼诗人;有的虽可称政治家兼诗人,但其政绩、诗名产生影响的时间空间有限;有的诗有流传,却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有的虽堪称诗家,但政治上却很平庸甚至低能;等等。毛泽东确系古今中外罕见、文治武功兼备的政治雄才、诗坛骄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兼诗人。2.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诗词既是可歌可泣的中国现代革命诗史,也展示了一代伟人的心路历程,因而赢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爱,称之为“中外独步,古今绝唱”是当之无愧的。<sup>②</sup>

有论者称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为政治家兼诗人双重胸怀的诗雄与雄诗,做诗,只是毛泽东诸多角色中的一种。作为政治家,他是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集军事家的机敏气魄、政治家的胆识圆通、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于一身的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是诗人政治家。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角色,使他的诗词自然地兼具一般浪漫豪放诗人的洒脱拔俗、即兴随意的气派,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开国政治家的雄壮浑厚、本色凛然的威风,既文采斐

然、情思飘逸，又酣畅淋漓、咄咄逼人；集生气、神气、灵气和豪气、锐气为一体。<sup>③</sup>

#### 四、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研究

毛泽东诗词具有非常丰富的美学内涵，这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诗词美学不仅寄寓了他的美学理想，而且体现了他的美学个性，既营造了绚烂多彩的美的园地，又具有了多种多样的美学特征。对此，由于论者的切入点不同，提炼的概念或略有差别、或稍有重复，但归纳起来已有三十几种美，如：崇高美、史诗美、哲理美、人格美、人情美、情操美、神韵美、含蓄美、心境美、意境美、境界美、典雅美、晓畅美、艺术美、力度美、整合美、浩瀚美、章法美、形象美、悲壮美、苍凉美、嘲讽美、和谐美、秀丽美、色调美、色彩美、音乐美、声韵美、意象美、山景美、绘画美、自然美、生活美、女性美等等。

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研究起步较早，论著也很多，研究和探讨比较深入而且内容丰富。其中，早在1975年11月，何其芳就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文稿中提出：“毛主席的诗词，整个说来，也不是没有秀丽美的因素，但主要却是崇高美”。<sup>④</sup>这是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提出来更是难能可贵的。

各具特色的毛泽东诗词美学研究专著的出版是十分喜人的，这里列举如下几部：刘汉民著《毛泽东诗词十美》（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集中阐发毛泽东诗词的思想艺术价值和美学风格，分别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史诗美、人格美、神韵美、绘画美、含蓄美、典雅美、晓畅美、章法美和音乐美，这是国内毛泽东诗词美学研究中较有影响的第一部专著。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美学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既有总体论述，又有分类论析，集中阐释了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逐一论述了壮阔的史诗美、高洁的情操美、伟岸的形象美、深邃的哲理美、慷慨的悲壮美、诙谐的嘲讽美、隽永的意境美、辩证的和谐美、绚丽的色调美以及铿锵的声韵美等，进一步强调指出，毛泽东诗词最基本的美学特征是崇高美，而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又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美、社会美假以艺术美的一种能动反映。该书还把毛泽东诗词分为

征战诗、赠答诗、登临诗、咏物诗、悼亡诗、咏事诗、题照诗、咏史诗、寓言诗和爱情诗等，并分别论述其美学特色。李人凡著《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诗美层次说、诗美阶段说、诗美发展说、诗美“突围型”、诗美多元体等诸多方面，进一步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美学品格的特征、价值和得失。董正春著《毛泽东诗词·美学漫步》（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阐述了毛泽东的美学追求，毛泽东的诗词美学、诗词风采、诗词风韵、诗词的艺术风格及其美学思想体系等。

关于毛泽东诗词美学核心与美学体系。有论者撰文认为，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为他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定下了高昂的基调，并形成了以崇高美为核心的整体风格，崇高是毛泽东诗词美学的核心。1. 毛泽东诗词中有多处对于自然美崇高形态的描写，其中《十六字令三首》对于山的形象的描绘，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自然界的数量和力量的巨大崇高；《水调歌头·游泳》则辞采瑰丽，联想神妙，既是一幅作者的万里长江横渡图，又是一幅壮丽无比的社会主义建设宏图的构想。2. 毛泽东诗词以情言志、以志抒情，能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艰巨的斗争、宏伟的劳动、伟大的品格和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读者引起含有深刻伦理内容的情感反应，具有特别巨大的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沁园春·长沙》词中被浓缩为“谁主沉浮”的忧国忧民的思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和“浪遏飞舟”的大无畏逆流而上的气概；《念奴娇·昆仑》借绵延磅礴、矗立云霄的昆仑山的自然崇高形象，大气包举地写出了无产阶级改造山河、改造世界的宏伟志向和冲天意气；《沁园春·雪》以咏雪为题材，囊括数万里，纵贯数千年，境界阔大，气势雄伟。<sup>⑤</sup>有论者认为，从美学观点来看，毛泽东诗词是时代风云的画廊，突出地表现却是属于壮美范畴的崇高之美。其崇高美最主要的表征，恰恰是心灵美的崇高，刚柔并济，而更以刚美为主，展示人间的美好意图和凌云壮志。毛泽东诗词是“诗中有画，画中有入，入中有情，情中有意”。<sup>⑥</sup>有论者提出应该建立毛泽东诗词美学体系，认为，毛泽东诗词美学体系既有理论

指导,又有实践论证。主要内容包括:完成了“一个转化”,即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以其真实性保证了完美的艺术性;达到了“三个统一”,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是其诗词的审美标准的重点所在;运用了“两种思维”,即“形象思维辅之以逻辑思维”。<sup>⑦</sup>

### 五、毛泽东诗词的理论研究

毛泽东不仅吟作了许多诗词,而且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不少关于诗词创作与欣赏方面的卓越见解,这些见解都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理论,同样引起了毛泽东诗词爱好者与研究者的关注。

(一)关于“诗格”的理论及其研究。1945年秋,毛泽东致函柳亚子:“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所说填词即1936年2月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对所谈的“诗格”,有论者认为,即诗的品格、风格或格调。理由是,毛泽东寄词之前,曾收到柳亚子的赠诗,并当即复信赞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就为其“诗格”作了注解。陆游和陈亮,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词人,力主抗战,反对求和;所作诗词,慷慨激昂,为历来诗评家推为高格。而毛泽东则称柳亚子超过了陆游和陈亮,其诗格之高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自己的《沁园春·雪》略近于柳诗,显然是谦逊之辞,但也说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诗格”。柳亚子接读毛词后,极为激动,赞赏不已,当即次韵奉和,盛赞毛词高格,认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将豪放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这样的词坛巨擘的豪放高格,也是比毛词逊色的。在“诗格”上,柳对毛之评价,大体说来不算溢美,毛词《沁园春·雪》确是绝唱,自有词这种艺术形式以来,以《沁园春》的词牌咏雪的,还没有如此雄浑的作品,千古词人向他折腰敬服是可以想见的。“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句话确实是将慷慨高格的审美价值的精髓很集中地提炼出来了。<sup>⑧</sup>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读范仲淹词时写下这样的批语:“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同他的读诗兴趣类似,也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不少论者认为,这八个字是毛泽

东诗词的艺术风格之一,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张之一,还应该看作是毛泽东的“诗格”。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诗格”主张,应视其为诗词理的一个方面。

(二)关于“诗味”的理论及其研究。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致臧克家等同志的信中首次提出有的诗“诗味不多”;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中又提到有的诗“味同嚼蜡”。这是毛泽东十分重视诗歌理论问题的又一个方面。多数论者认为,毛泽东提出“诗味”问题,为我们揭示了诗味、特色和形象思维的辩证关系。即:“诗”要讲究“味”,要有“味”就必须讲“特色”,关键在于“形象思维”。有论者认为,“诗味”大致是指意味、韵味、品味、有余味、能回味、耐咀嚼等意。所谓“诗味不多”,就是指作品里含蕴的诗的特色不突出;所提宋诗“味同嚼蜡”,也是这个意思。怎样才能造成“诗味”呢?毛泽东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是说,诗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要造成艺术形象,就要运用形象思维,采用“比、兴”的写作方法。“比、兴”两法之所以能造成“诗味”,就是因为它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诗人不把自己的情和志直接说出来,而是把情和志寄托在景物上,使景物成为情和志的载体,随着想象的翅膀翱翔;诗人将眼前的物象酿成意象,又将意象构成意境。读者读诗,首先看到诗中描写的物象,而后体会到意象,经过思考,才发现物象、意象、意境中的层层含义,也就品出了“诗味”。<sup>⑨</sup>

(三)关于“新诗”的理论及其研究。1957年1月,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等同志的信中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在同臧克家、袁水拍的谈话中提出:“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他认为,几十年来,“新诗迄无成功”,“新诗改革最难,至少要五十年”,但“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这说明,毛泽东是很关怀新诗的。臧克家认为,毛泽东看到了新诗在前进中经过的种种曲折、回环,在寻找合适的、为广大



人民所乐意接受的路子，即：在内容上要表现时代精神，要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要为革命、为人民服务。在新诗的形式上，毛泽东意在纠正新诗的散漫——散漫到与散文分不开界限的弊病，也在纠正照搬外国诗歌，以致洋腔洋调喧宾夺主的坏倾向。<sup>⑩</sup>

联系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深刻体会他所提出的诗格、诗味、新诗等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我们也从中感悟到毛泽东诗词印证并丰富了他的诗词理论。当然，毛泽东诗词理论远不止这些，特别是从他的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美学理论、对传统诗词格律继承与发展的理论等，都值得去进一步地研究。

①蔡清富：《毛泽东——无产阶级新世纪的但丁》，《党史文汇》1996年第3期。

②纪鹏：《中外独步，古今绝唱——略论毛泽东诗词

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

③陈晋：《诗雄与雄诗——兼说诗人毛泽东对古代诗人的超越》，《民族诗魂——毛泽东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

④何其芳：《读毛主席词〈长沙〉和〈黄鹤楼〉》，《光明日报》1979年9月17日。

⑤张伯良：《崇高——毛泽东诗词的美学核心》，《民族诗魂——毛泽东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

⑥李子建：《时代风云的画廊——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同上。

⑦吴奔星：《毛泽东诗词美学体系初探》，提交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⑧⑨陈俊山：《毛泽东诗词创作与欣赏》，《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⑩臧克家：《毛泽东同志的新诗观》，《人民日报》1990年5月15日。

责任编辑：王法敏

(上接第96页)制度，以及居作制度和录囚制度等各种规定都趋于具体多样化。以录囚制为例，录囚制起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到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首先，皇帝亲录囚徒形成常行的制度。自唐祖武德元年九月“亲录囚徒”始，而后历年举行，成为不废之常典。其次，进一步完备了各级官吏录囚的制度。唐朝把录囚作为各级司法官吏和狱官的重要职责，而且规定了严格的期限。最后，扩大了录

囚的内容，把录囚作为实行宽赦的重要典制。把录囚和赦事结合，这是录囚制度的发展。

在唐朝各种狱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囚徒贵贱，男女异狱”（《新唐书·百官志·狱丞》）分居分房制的实行，其改变了唐代以前一直实行的不分男女老幼的混羁杂居制，无疑是狱制上的重大进步。

责任编辑：郭秀文

# 与时俱进论特区

##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特区的走向问题”会议综述

中国入世后，经济特区何去何从，又一度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点。综合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任务，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在国民待遇条件下，该是宣告结束的时候了，不宜再提“经济特区”。一种观点认为特区应在前 20 年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平等竞争中推进经济的发展。一种观点认为特区应继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列，率先向自由贸易区转变，成为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围绕如上观点，4 月 2 日，近 20 位专家学者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特区的走向问题”座谈会上展开热烈讨论，阐述他们的看法与主张。该座谈会是由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特区经济研究会联合组织召开的。现将会议讨论成果综述如下。

与会者一个共同观点是：中国的经济特区不但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得更好，更有内容，更有特色。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 2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在充分肯定了我国建立经济特区 20 年来的重大贡献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全过程。”与会者重温这一讲话精神，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至今远未完成，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探路，争当“排头兵”和“示范地区”的使命也就不是结束，而是尚需努力，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使特区办得更好，更有内容，更有特色。再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预示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越来越接近，然而中国的对外开放毕竟是从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度中艰难起步的，历史的包袱相当沉重，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接轨有一个过程，尚需一段时间，这就需要特区为这种接轨探索，开路，以尽快地、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也有学者联系日

本、韩国等设立经济特区的趋势来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说，最近日本经济产业省决定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着手研究在日本设立“经济特区”的可行性，并设想在 2003 年财政年度预算或要求进行税制改革时提出并力争于当年实施，这一实例为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继续办好特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脚注。他们认为，特区的特殊政策与 WTO 体制下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是可以在 WTO 下办出中国特区的新内容、新特色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特区还需继续办下去的基本依据。

有学者给特区的发展概括出三句话：一是与时俱进看特区，要看到特区创建 20 多年来的巨大跃迁与变化，今天的特区显然不是 20 多年前的特区可比，但也不应是明天的特区的框框；一是与时俱进建特区，新形势下的特区，要走出以往主要靠向中央要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方面、关税方面、外汇留成方面等）发展的模式，而在 WTO 框架下通过创新，继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路，在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方面再“先走一步”，做中外体制接轨的“排头兵”和“示范地区”；一是与时俱进论特区，把握一个与时俱进的特区须有与时俱进的特区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好特区的现实发展。特区的发展正随着中国加入 WTO 而面临着一个更加开阔、更具多变性也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问题，这就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才能驾驭复杂的外部环境，更好地推进特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谈到特区发展理论研究的意义，一些与会者深有感触：特区创办 20 多年来，特区本身的巨大发展和特区外的示范效应，都是不容低估，但为什么时至今日舆论、学术界仍然陷在要不要办特区的纠缠中，而不是着力于如何办好特区这篇大文章上？这值得我们深思。达成 WTO 下特区发展的理论共识，显然是决定特区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

围绕 WTO 框架下中国经济特区走向,与会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1) WTO 下的特区发展仍需要政府给予特殊政策。一些专家强调指出,特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政策就无所谓特区了。(2) 特区的定位问题。深圳在 20 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取得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港”因素,今后特区的发展仍需重温和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再造几个‘香港’”(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2 页、第 297 页)的讲话精神,把握好 WTO 下的特区发展定位问题。(3) 产业发展上要尤其突出在 WTO 有关服务业方面的协议和规定。(4) 6 大特区(包括上海浦东)不应是

同一个模式,而应根据特区功能和自身优势特点,划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区别地加快其发展。另对特区今后的发展,是否要向“自由贸易区”模式转变的议论,会上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事实上,经济特区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要比“自由贸易区”宽得多,现仍提向“自由贸易区”转变,只会局限特区今后的发展。

张汉青、曾牧野、黄家驹、梁渭雄、宋子和、汤在新、雷强、许隆、封小云、李惠武、周运源、刘品安、黄兰淮、李开云、梁育民等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韦 前)

## 广东省社科界文艺界举行 《张汉青文集》首发座谈会

2002年5月10日,广东省社科界、文艺界近60位代表聚首羊城,热烈座谈《张汉青文集》(下简称《文集》)出版。

这次座谈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联合发起。座谈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林森权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陈中秋主持。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小敏到会宣读了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致《文集》作者的热情洋溢的贺信。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张磊对《文集》的主体特色作了高度评价。与会的社科界、文艺界代表就《文集》有关领域的成果作了充分的肯定。

蔡运桂(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我认为《绿叶赋》是汉青散文珍品中的珍品,他的文学才能与精神境界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文章纵横捭阖、谈古论今,从大自然的荣枯、绿化与沙漠化、文明与野蛮等等关系阐述绿叶与森林对人类社会的至关重要。引用了古今中外诗人、学者、伟人,对象征生命、希望与纯洁的绿色的歌颂。甚至从飘零的黄叶中也寄以新希冀。他说:“落叶是值得骄傲的。它那黄金般的、醉酒般的容颜,在秋阳中闪光、飞舞、欢笑,它是完全无愧的……啊,对了,落叶纷纷扬扬,东飘西舞,它是在无限深情地最后一次亲吻、拥抱自己的儿子,给那些幼小的种子送来嘱咐,祝愿它们在来年春天,把根扎进沃土中去,并迎着灿烂的阳光,伸出第一片娇嫩的绿叶。”像这类富有人生哲理和饱含诗意的描述在文章中比比皆是。通过一片片的黄叶,表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永恒规律,没有历代多数文人那种落叶悲秋,人生苦短的慨叹。落叶正催着新生,这段描写,典型地表现了作者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境界。读这样的散文是获得一种富

有精神养分的审美享受。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青同志的诗歌风格,和他的作风一样:平易、亲切、流畅乐观。我特别喜欢他在参予群众活动时所写的诗如《莞城龙舟竞渡》、《广州家庭音乐演唱大赛》、《狗年石马赏桃并访农舍》。这些作品,和人民群众的心情贴近,显示出爽朗向上的情怀,它正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大众精神面貌的反映。这些诗作,谈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并非没有仔细的经营,像“半入江风半入云”,便是从唐诗中借用过来,而又恰到好处。以真情写诗,这是汉青同志诗作能够写得成功的原因。他那些写和群众相处的诗,怀念领导战友以及亲人的诗,都洋溢着真情,使人感到亲切。至于回忆“文革”经历和退居二线的许多感怀之作,同样显示出坦诚的胸怀。汉青同志是以格律体的诗,来表现现代人的真情的,而且表现得相当细腻,说明旧体诗词完全有可能用于表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只要勤于写作,以真实的感情平实地把心里话写出来,李白所称许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也并非不可能企及。

范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文集》里面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既就事论事,又不局限于此,思想的闪光和理论的火花随时都能让人有所启迪,有所借鉴和有所裨益。例如作者向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或者说是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文集》第1215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年代背景下,于1994年初就提出建设“珠江文明”的概念(《文集》第1225页);在领导广州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活动中,深刻地意识到要用学科体系的思想来指导,才能更为全面、深刻、有效。因此,他早在1990年3月就提出要写“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学”(《文集》第1005页)的倡议,这个倡议在1991年6月便变成了现实——他主编出版了广州地区一批理论工作者集体写作的《精神文明学》论著,并从1993年致力于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的创建,其后一直担任该会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广东的精神文明学研究之所以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之中,精神文明学已被实践着的广大群众逐步认同,均与张汉青会长的身体力行密不可分。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著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创新的学术性特色。

黄伟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青同志的散文始终保持并发展着现实性、审美性、科学性、多彩性的综合特点,在清雅中炽热、平淡中深刻、冷静中雄辩、亲切中稳重是其特有的风格。他所写的题材,是极其广阔多样的,但莫不是他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的,而且是从他在深入生活实际的步步脚印中提取的,这就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的散文或杂文,都无不是“歌颂新生,鞭挞陈腐”,有鲜明的褒贬爱憎,但都是主人公的切肤感情,而不是“员外郎”式的横挑鼻子竖瞪眼;他着意于歌颂美好的事物和以审美的尺度评析事物,因而从所写的事物和形象莫不具有深厚的美感;他所写的事物和问题,有的在发表当时有超前性,有的在后来似乎已经过时,有的问题复杂尖锐,很容易有片面性,但在他的笔下却始终把握着前沿性、后发性、辩证性,从而不仅在问世时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而且具有科学性、持久性;他的散文不仅题材、主题、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手法也多姿多彩,有议论性杂文、抒情性散文,有游记、回忆录、序跋、书信等等。他是岭南散文大家中的一家。

饶芃子(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青同志的散文,无论是抒怀、状物、记事、写人,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的激情。是他理想与心光的投射。读他的这些散文,人们首先感觉到的是作者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并在这一很高的起点上,不断地领略、体味生命的价值。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抒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他对自己所追求和献身的事业的体悟。每篇文章,都有他面对现实时的冥思,这,在他的散文中形成一种思想的张力,激发人们去向着真善美。他的散文淳朴平实,但不乏

味,不板滞,因为处处有作者的真情蕴于其中。他在文中,总是以至诚的态度,表现自己发自内心的情愫,所以他的文章是“有我”之文,他文中的这个“我”,虽是“小我”,却与“大我”是相通、重叠的。我们透过他笔下描写的景物和人物,常常可以看到他那和大众相通的心。他的《绿叶赋》,写自己对绿色“怀有一种特殊的喜悦心情”,绿色在他的少年时期就悄悄地闯进他的心灵,他喜欢碧绿的灌木,翠绿的竹子,墨绿的古榕,苍翠欲滴的浓荫……这既是他个人审美的倾向,但也与“绿色”的造福人类密切相关,他把它视为生命的颜色,生命的象征,从他对这一颜色的赞美、热爱,确实可窥见他心灵的一角。

余少波(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所教授) 我个人认为《文集》在理论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国内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核心目标是提高人(市民)的综合素质(现代文明素质),并对它的内涵作了比较深刻、比较系统的阐发。第二,创造性地提出,提高人的素质是广州市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结合点、转换点,并对如何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途径和方法以及具体措施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第三,从世界现代化和我国国情出发,强调说明,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质,实质上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科学地论述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其主体——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说明如何做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交两份合格的答卷。第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理论上比较全面阐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性,强调要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机制,要建设有时代特征和广东特色的“珠江文明”。张汉青同志这些理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明论”增添了光彩,是他“心系南粤百姓,情钟民族振兴”的丰硕成果!

张绰(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文集》专门谈社会科学的文章不多,但从两个文明建设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任务的,却是占了很大的篇幅。作者首先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说明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实践经验和表现形式,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了思想动力、精神和智力支持。在认清这两个文明的关系上,明确提出社会科学要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者在肯定这些年来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取得的成绩后,也指出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理论研究还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队伍的素质也有待提高。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要努力回答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同时也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开辟新学科的研究。为了要实现这些任务,需要改革社会科学的科研体制和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社会科学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另外,在谈到繁荣和发展广州社会科学事业的几个问题时,还明确提出要加强在治理整顿中优化产业结构的研究,建立经济体制模式的研究,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研究,和广州市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战略的后续研究等。这些文章都是写于十二、三年前,现在读起来还是感到那样亲切,这说明文章有生命力,也反映了我们在发展社会科学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最近江泽民总书记一再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章明(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作家) 张汉青同志的杂文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鲜明的平民意识。其一,鲜明的民间立场。作者时时不忘自己是普通群众的一员,尊重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劳动人民),学习劳动人民。不但不打官腔,而且承认自己知识不够,有局限性。《船夫的教诲》、《老铜锣匠的故事》、《十年辛苦不平常》等篇都是好例证。特别是两篇关于东来顺发家的文章,时在1962年,他就提出要向懂得“生意经”的资本家学习经商。这是有超前意识的,虽然还不能说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市场经济的气息了,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远见卓识,难能可贵!其二,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作者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断深入基层,细致观察,指出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提出便民的办法。《乡行小札》、《走马

偶拾》、《话说回家卖红薯》、《也说几句关于夏时制的话》等篇章,都是很好的例子。其三,毫不留情地抨击时弊。作者的杂文大多是委婉平和、娓娓道来的,但也并不缺少“金刚怒目”式的文章,譬如《欺世者鄙》、《开会不要开死人》、《用笔杀人的黑标本》、《历史是人民写的》等等都是的。“开会不要开死人”一语虽然不是张汉青首创的,却是由于他的这篇文章而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一句“名言”的。现在,不仅开会开死人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出现了干部敬酒敬死了人、学生读书读死了人的新问题。吁请作者奋起挥笔,再续新篇!

马中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作者非常注意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即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法制纪律和科学教育的强调和阐发,但尤其注意对表现、传播、推动、发展这些内容的形式的搜寻、利用和整合。作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能够而且应该在各种形式中表现出来抱有坚定的信心,他细心搜寻、采集、洗练、推介各种新的或旧的精神文明发展形式。他介绍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音乐绘画艺术、诗词创作、推广普通话、体育事业、龙舟比赛、羊城景观、家庭教育、报纸刊物等传统的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式;他还把群众中创造的新精神文明建设形式,发掘出来加以肯定、推介,如军警民共建,评选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十件大事”,“改革开放十大成就”,评选“好家长”、“好孩子”,开设“心声”热线电话、儿童少年“童声”热线电话,普遍开展“美的家庭文化”、创建精神文明建设单位、制定宣传贯彻《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推广“微笑在广州”、“友爱在车箱”、“诚暖顾客心”、“礼貌在街坊”、“羊城新风传万家”,开展“广州市风”、“广州人精神”的讨论。这些丰富多采的精神文明建设形式,成为培养“四有”新人目标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桥梁。

(金文)





座谈会主席台（左起）：陈中秋、林森权、张汉青、刘小敏、张磊、刘斯奋



与会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发言

# 学术研究

月刊 2002 年第 5 期(总第 210 期) 出版日期: 5 月 20 日

社长: 梁渭雄

主编: 刘斯翰

常务副主编: 郑英隆

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叶金宝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 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 编: 510050 电话: 020- 83846163

排 印: 广州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刊 号: ISSN 1000- 7326  
CN 44- 1070

网 址: [www.xsyj.com](http://www.xsyj.com)

电子邮箱: [xsyj@xsyj.com](mailto:xsyj@xsyj.com)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 64

国外代号: M 268 (北京 399 信箱)

每月 20 日出版

定价: 4.00 元